RDEC-RES-100-024(政策建議書)

「我國外語政策之檢討與展望」政策建議書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本報告內容及建議，純屬研究小組意見，不代表本會意見)

RDEC-RES-100-024(政策建議書)

「我國外語政策之檢討與展望」政策建議書

受委託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研究主持人：戴教授浩一　國立中正大學講座教授
協同主持人：林副教授麗菊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中心主任
研究助理：　李佳家、王立仁、許潔心、陳怡甄、王恬恬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本報告內容及建議，純屬研究小組意見，不代表本會意見)

提　要

關鍵字：外語政策；英語教育；本土語言；多元語言環境

一、研究緣起

在今日政經網絡密切相繫的全球化社會中，如何制定符合國際溝通語言能力需求之外語政策，以提升臺灣之國際交流競爭力，已是當務之急。而不可否認地，在所有的外語中，英語能力已長期被視爲國際溝通最重要且必備的工具。然而，目前我國因過度分工、缺乏橫向整合、及無統一外語政策專責部門，造成我國整體的外語政策不夠明確及比較缺乏一貫性。本研究從歷史背景及沿革以及現今各部會分別推動之不同英語政策項目作爲研究問題起點及背景，探討我國之外語政策定位，進而提出未來可能推動該項政策之建議。

本研究主要涵蓋六大研究議題：(1) 因應今日國際化激烈競爭的環境需求，我國國家外語政策應有之核心價值與政策主張；(2) 我國成立國家級外語政策及教育的學院或中心的定位與可行性，以統籌外語政策擬訂、外語策略執行、外語專業人才培育、外語研究發展等重要事務；(3) 英語在外語政策之定位，應視爲官方國際語言，或是比照新加坡、香港等地視英語爲第二官方語言；(4) 其他外國語言在我國所扮演之角色；(5) 外語教育與我國多語言社會的關係；(6) 英語爲國際語在我國外語教育之定位(EIL ,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二、研究方法及流程

本研究所採行的研究方法主要爲質化方法，先進行美國、歐盟及亞洲各國之外語政策及推動策略文獻分析，進而廣邀全國十五位專家學者進行團體焦點訪談，總計舉辦兩場座談會，就本研究六大研究議題進行重點探討。座談會後，亦以此六大研究議題爲主題進行分類及解碼，以獲取專家共同意見與國外經驗的交集，透過以上研究方法，提出適當的政策建議。

三、重要發現

研究結果顯示，多數專家學者對於我國現階段外語政策的不夠明確都提出懇切務實的思考觀點，整合意見後，研究結果共六項：(1) 主張我國外語政策之核心價值應具備長久性及實質性的意義，釐清發展重點、營造以語言功能爲主之學習環境，並進而省思本土語言與外語文化平衡兼顧的學習機制，以啓動國民深層之多元文化學習及成長力；(2) 建議建立位階高、且跨部會之外語政策推動專責單位或國立外國語大學，將專業師資及外語政策研究發展視爲發展重點，以制訂更明確、更具前瞻性及全球化觀點的外語政策；(3) 在思索英語於我國外語政策之定位上，應考量我國本身情境不同於新加坡、香港等因素，深入考察後另行審慎評估；(4) 在外語政策之推動上，除了强調英語的地位及重要性外，在我國整體經貿外交及國際政治現實上，應推動多元外語政策，重視其他外語教學新場域，並善用我國新住民所引入之豐沛外語資源；(5) 在重視本土語言文化同時，鼓勵多語言社會容納多元文化與價值，才能達到外語學習深度文化層次；(6) 面對英語爲國際語的全球化趨勢，如何在我國教育政策或外語政策上思索教學及學習轉型，將是現階段之一大挑戰。

四、主要建議事項

本次研究之外語政策重要建議包含以下五面向：

(1) 釐清我國外語教育之核心價值，以核心價值爲本，方得以推動明確及一貫性之外語政策。

(2) 建立位階高、跨部會之外語政策推動專責單位，以落實我國外語教育發展重點與核心價值、重視各級專業師資養成、及外語政策研究發展。並分普羅教育的外語教育及菁英教育的高階專業外語教育。

(3) 以語言功能面強調營造英語學習情境的重要性，務實面上包括成立共用的外語電視台，成立共享平台以分享各校教學典範等等。

(4) 重視本土語言及外國語言文化之多層次學習，善用新住民語言資

源，以兼顧國內多元語言的發展。

(5) 重視亞洲鄰國的經貿、外交及民間關係所需之外語。

五、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研究期程限制，專家座談會與文獻回顧內容皆以外語教育政策爲核心，較無就其他面向論述更多國際上在外語政策與外交政策、科技產業發展計畫、經濟、政治聯接關係等議題。同時，鑑於國際教育白皮書或愛台十二項建設，僅於規劃及執行初階，或因政策之延續性議題，尚未見具體實踐或有成果報告，因此，不宜融入本研究報告。

建議研考會在本研究報告的基礎上，接續研究有關產業、外交、政治及經濟之全球化趨勢所需要的英語或其他外語的全盤政策。

Abstract

Keywords: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Global English; World Englishes; pluralism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incessant global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of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has created a formidable challenge for every country's eco-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a country to have a well-thought policy 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t is obvious that English as the world's dominant language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 will play an even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before i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spheres. It i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lization of a country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enhance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No doubt there are more issues, globally and locally in Taiwan, which would need to be addressed to account for what would constitute sound and viable foreign language policies, particularly, regarding English language. This project attempts to describe foreign language policies in Taiwan fo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new phenomenon of Global English, to compare English educational policie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a nation-wide institution for fostering a foreign-language competent society with global competitiveness.

This study presents a set of key issu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regarding policy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for a sound and viable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for Taiwan. The questions concern issues such as the core value of language policies in Taiwan, the feasibility of a nation-wide institution for promoting foreign-language competences, the role of English language in Taiwan's language policy, the role of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in Taiwa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aiwan's multilingual society, and the impact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on Taiwan'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y focus group interviews and literature review of language polic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world, the study reveals the following results: create a content-based and communic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with a coherent and well-articulated framework of value, foster leadership of a high-tier nation-wide institution to promote the practice foreign language policies, researche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ake the advantage of the rich sociolinguistic context to develop competences of foreig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heritage languag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for the benefits of learners, the communities, and the society as a whole, and refine language instruction methods for the trend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The following implications for Taiwan's foreign language policies are drawn from the study results: build up a nation-wide institution for promoting a foreign-language competent society, centraliz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ors, create an environment for functional users of English by providing foreign-language TV networks and platforms for sharing effective pedagogical innovations, and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heritage languag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as a whole for supporting the linguistically diverse society in Taiwan.

我國外語政策之檢討與展望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4

第三節 章節安排 6

第二章 我國的外語教育沿革 7

第一節 我國英語教育的政策沿革 7

第二節 我國第二外語教育的政策沿革 12

第三章 全球各國外語教育之推動 17

第一節 各國推動外語政策之核心價值與政策主張 17

第二節 全球各國重要外語教育政策 26

第三節 美國外語政策之執行單位 35

第四節 英語爲國際語言及英語爲共通語言的衝擊 44

第五節 各國外語政策推動經驗總結 47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51

第一節 我國推動外語政策之核心價值與政策主張 51

第二節 我國外語政策推動的專責單位與其定位 70

第三節 英語在我國外語政策之定位 86

第四節 其他外國語言之角色.....89
第五節 外語教育與多語言社會的關係.....93
第六節 英語爲國際語之定位.....95
第五章 外語政策重要建議 103
第六章 結論 107
參考書目 109
附錄一 學者專家座談會紀錄..... 133
附錄二 審查意見修正對照表..... 181

表　　次

表 2-1 我國高等教育外語學院成立時間及科系表…….. 13

表 2-2 北區大學外文中心開設實體課程語種…… 14

表 3-1 各國推動外語政策之核心價值與政策主張簡表 …… 24

表 3-2 各國外語教授語言類別及學齡 …… 28

表 3-3 美國外語政策之執行單位簡介…… 35

表 3-4 各國外語政策推動比較 …… 47

表 5-1 我國外語政策建議彙整 …… 105

圖 次

圖 1-1 我國英語政策重要時間表…… **8**

圖 5-1 外語政策立即可行建議：國家教育研究院之組織架構…… **85**

圖 5-2 外語政策中長期建議：國家外語政策委員會組織架構…… **8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一、研究緣起

在今日國際化激烈競爭的環境裡，外語能力是一個極其重要、不可或缺的素養。而以我國在全球化經濟體中的活躍程度，國民的外語能力更為重要。而諸多的外語中，英語當然是國際語言能力中最重要而且必備的國際化溝通工具。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如 WTO, WHO, OECD, APEC, etc.)及國際活動(如奧運、世運、世博等)都以英語為官方語言。更重要的是國際媒體(CNN, NBC, CBS, BBC, NHK, etc.)及資訊管道(Google, Yahoo, Youtube, Facebook, etc.)也都以英語為主要的傳播工具。

因此，在我國外語政策推動中，應以英語能力之推動為首要重點。綜觀英語能力此一核心外語之政策，我國英語教育雖已實施數十年，惟在英語溝通與運用上，根據調查，在亞洲國家中仍屬偏低。比較IELTS和TOEFL成績發現，台灣人英語能力不盡理想，似落後其他亞洲國家。如何藉由英語能力之提升，以英語力增進國際企業文化品質，及提升臺灣城市之國際交流競爭力，以強化整合國際化之交流平台，已是當務之急。然各部會之推動並未整合，且缺乏一個國家級推動及整合整體外語政策之單位。舉例來說，目前各部會推動中的方案包括：內政部的全國通譯人才資料庫、教育部的社教博識網暨全民學習英語列車、僑委會的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行政院經建會的吸引全球外籍優秀人才來台方案、行政院於2008年提出的「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等，皆是各部會獨立推動，而非整合跨部會進行。

除了提升全民英語能力，強化國家國際競爭力，英語是否能成為台灣的官方國際語言或第二官方語，進而以英語專業人才之培育為重

點也是我們可考慮推動之英語政策。另外，不論是加強英語能力的建構，厚植人力資本，或建構友善國際化環境，都必須檢討過去的英語教育政策及歷史沿革，進而展望未來可行的英語政策實施方向。同時，我們也需要一個國家級的單位，以制高點的觀點，來統整及推動英語競爭力的各項政策，以厚植我國在國際經貿關係或外交政策所需的外語政策或專業人才培養。

二、問題分析與探討重點

(一) 問題分析

本研究需從歷史背景及沿革，亦即現今各部會分別推動之不同英語政策項目加以釐清後，方能清楚定位研究重點。目前我國政府各部門之英語政策各有分工，如外語教育政策及中小學英外語推動實務，由教育部之相關部門負責(如，教育部國際文教處主導之國際教育白皮書)；全國各地方之英語力提升及國際友善環境之營造計畫則由行政院研考會負責；另外，外交部及僑委會亦有部分業務涉及到外語能力推動或政策執行。此一過度分工或因無整合的外語政策部門，導致我國整體的外語政策缺乏統整性、一貫性、及永續化。

本計畫的問題分析亦需更深入探討亞洲各國英語能力之政策及全球其他國家的外語政策，以進而協助瞭解我國如何規劃明確的外語政策，以提升國際化優勢。面對英語爲主要國際交流語言時，國家之英語政策，不僅是教育議題，且是國家安全議題，因此，外語政策議題有迫切之必要性，需提升其定位至能統籌各部會之政策擬訂、研究或策略推動之國家級高度的單位。

本計畫另一亟待釐清的議題則是何謂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外語學習可定義爲 “knowing how, when, and why to say what to whom.” 在過去的教育體制中，外語學習定義爲”learn about foreign languages”即已足夠。然面對全球化溝通的機會與日遽增，外語能力或其指標必須能彰顯運用外語能力於溝通情境中的關聯性(language performance assumes an immediate relevance for learners)。而此一強調「外語表達能力」或「能力導向的外語學習」亦對於英語課程典範造成極大的衝

擊(a major paradigm shift in foreign language curriculum)。相較於以往的英語學習，面對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趨勢及網路無距離的溝通互動，英語學習目標與成效指標將不得不與現實的溝通功能緊緊結合，亦即必須達到以功能導向的外語學習爲目標。

而在我國現有外語學習情境中，與外語學習息息相關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面對全球化的影響與國際交流，英語的定位爲何？明顯地，獨厚英語爲單一外語政策已不能滿足國家安全、經濟、科技產業及外交等對多語種人才的需求。但隨著政治與經濟環境之丕變，如全球經濟發展、亞洲各國之經濟共同體、ECFA 之簽訂、外勞政策或移民政策，皆必需將其他歐洲各國主要語言、亞洲各國語言、東南亞語言等外語列入問題探討。上述外語都在經濟、科技、技術產業、歷史、文化交流及醫療，與台灣有著密不可分之關係。對於這些外語定位及其專業人才培育政策，亦將建議提出國家級外語政策單位之簡要架構，但本計畫將不具體探討其他外語的定位與重要性。

前台灣師範大學文學院長張武昌教授於「台灣的英語教育：現況與省思」一文中，針對國內各階段英語教育的困境深入探討，曾建議政府「成立一個專責的機構，研擬從小學到高教一體連貫的英語教育政策，審慎規劃師資需求、訂定嚴格檢核機制，並研發有效的教學法與優質的教材及教學媒體」。針對此一專責單位的定位與期許，本計畫將一併探討其重要性與迫切性。

在英語隨著全球化及英語爲國際共同語言(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EIL)之趨勢下，英語已然掌握「國際溝通語言」的地位，對於國家整體的外語規劃及未來發展，我們現在能努力的方向爲何？知名語言學家 Graddol(2006) 曾提出「英語變成世界語言之後，就好比一匹脫韁的野馬，大家已無法駕馭它」。因此，當我們思考全球化時代英語的未來時，又如何能與我國本地之文化、經濟、教育元素相輔相成，進而形成面面俱到的我國外語政策。

(二) 探討重點

基於上述所言，本計畫期間僅短短四個月，因此焦點將在提出以

國家級之高度，成立外語政策及教育相關學院或中心之定位可行性，以整合過往過度分工的各部門業務及上述提及之議題。本計畫以外語政策專責的學院或中心之成立爲核心，探討一些可能性。

以上述爲背景架構下，本計畫冀望能提出可供政府部門參考之永續規劃及推動國家外語政策的務實方向，例如成立國家級外語學院或中心來推動及研擬外語政策。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一、研究方法整體規劃

本研究以質化研究中的團體焦點訪談爲主，舉辦兩場專家學者座談會，以蒐集專家學者之意見加以分析。資料分析前先進行文獻探究及分析，針對座談議題爲主的六個研究問題，進行重點探討。而在座談會後，亦以此六個問題爲主題進行分類及解碼，以獲取專家共同意見的交集。

此六項研究議題如下：

(一) 因應今日國際化激烈競爭的環境需求，我國國家外語政策應有之核心價值與政策主張。

(二) 我國成立外語政策及教育的相關學院或中心的定位與可行性，以統籌外語政策擬訂、外語策略執行、外語專業人才培育、與外語研究發展等。

(三) 英語在外語政策之定位，應視爲官方國際語言，或是比照新加坡、香港等地視英語爲第二官方語言。

(四) 其他外國語言在我國所扮演之角色。

(五) 外語教育與我國多語言社會的關係。

(六) 英語爲國際語(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在我國外語教育之定位。

爲使探討議題及觀點更爲國際化，座談亦邀請國際人士參與，如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衛友賢教授、本國專家學者亦考慮到非英語系的第二外語教學專家，如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黃孟蘭院長、國立政治大學外語學院于乃明院長、以及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日語教學專家葉淑華教授。

本研究的座談會分爲兩場舉辦，一場於七月七日於台北舉辦，分別邀請以下專家學者參與：李振清(前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現任世新大學英語學系教授)、于乃明(國立政治大學外語學院院長)、曹逢甫(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衛友賢(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黃美金(前台師大英語系系主任，現任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教授)、李文瑞(前文藻外語學院校長，現任文藻外語學院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賴俊雄(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黃孟蘭(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共八位專家學者與會。

另一場座談會於七月二十八日假國立中正大學舉辦，邀請專家學者參與座談，參與名單如下：曾守得(前彰化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兼教務長，現任靜宜大學外語學院院長)、王儀君(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葉淑華(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教授) 、沈添鉦(前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主任，現任南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系主任)、劉慶剛(國立臺北大學語言中心主任)、蔡素娟(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院長)、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系主任)，共七位專家學者。

二、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針對「外語政策」的議題進行相關議題探討。然而「外語政策」一詞所指涉的範圍十分廣泛。因爲以台灣多語言的情境，所謂的「外語」，其界定範圍十分模糊。究竟有哪些外語可列入此一外語的研究範疇？進而能定義所謂的外語政策？這些都是可能遇到的爭議或極難建立共識的問題。因此，本研究的外語範圍主要指的是目前國內大學院校外語學系所開設的外語以及這幾年因應經濟發展政策而積極推廣的東南亞各國語系。然而在探討外語政策之前，本研究亦必

須兼顧到本國多語言的社會環境，其中亦會關照外國語與本國多語環境的關係。

本研究因研究期程限制，專家座談會與文獻回顧內容皆以外語教育政策爲核心，尚無就其他面向更深入論述各國外語政策計畫或執行面。建議爲來相關計畫能持續發展，以建立更整合性及更全面化的我國外語政策及外語教育論述。

第三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報告的章節安排與考量如下：

第一章爲「緒論」，主要說明本研究的背景、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問題。第二章針對外語政策議題進行相關文獻探討，以提供資料蒐集的依據及資料分析的架構，特別是針對美國、東南亞、東北亞、歐盟各國的外語或語言政策進行分析。第三章則在座談資料分析後提出相關論點。第四章則提出本研究的整體結論，並提出我國外語政策或實施策略的建議，以提供我國未來施政時的遠景規劃或政策擬定的參考。第五章則是整理專家學者建議後，提出我國的外語政策的建議。第六章則爲本外語政策的總結。

第二章　我國的外語教育沿革

回顧台灣迄今的外語政策，並沒有明確政策面的脈絡可循，只可從教育制度的施行中整理出政策的概況。我國語言政策的發展，從1945年至今大約爲六十多年的歷史。然而，這僅針對抗戰勝利初期的國語推行政策及台灣本土語言的發展而論。關於外語教育政策的全面性或完整的調查則少見於文獻之中。在1945年以後，開始推行第二外語教育單位僅出現於高等教育的外語系、*技職體系的外語科及少數的民間補習機構。

文獻探討中，真正出現明確的外語(此指英語之外的其他第二外語)推行政策是從19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之後開始。整體而言，台灣的外語政策主要是以英語爲主，1983年後才有第二外語的推動(見圖2-1)。本章將從台灣自1945年之後英語及第二外語的推動政策做一簡要的整理，試圖從中描繪出我國以往的外語政策圖像，並作爲本計畫關於我國外語政策的參考依據。

第一節　我國英語教育的政策沿革

我國的英語政策沿革主要分爲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爲「國語推行運動時期」之英語選修年代，第二階段爲1968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英語爲初中必修時代，第三階段爲1999年九年一貫新課程綱要，採用一綱多本時代，第四階段爲2002年行政院『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時代至今(圖1-1：台灣英語政策重要時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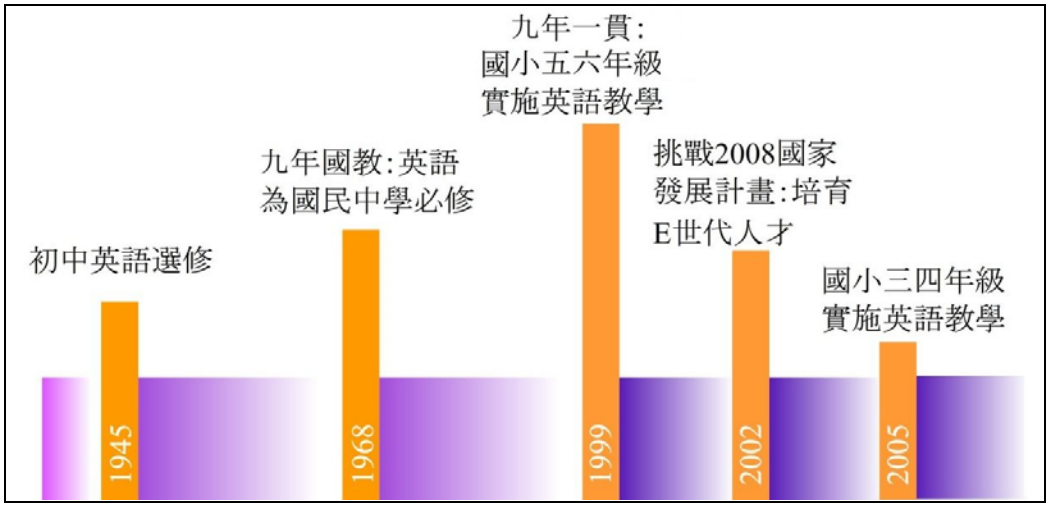

圖 1-1：台灣英語政策重要時間表

資料來源：戴浩一、林麗菊彙編

學者指出，與大英帝國的語言霸權相比，美國霸權下的英語霸權爲一種軟實力的語言霸權，亦即人們主動接納美國英語所代表的尖端科技與文化。語言是一個重要的政治領域，任何語言政策的執行與擬定，皆深刻反映出政治角力與權力較勁(黃宣範，1993；吳錫德，2002)，而台灣的外語政策正反應出這個現象。在國民政府播遷至台灣後，美國冷戰時期的戰略政策影響，台灣接受美援及駐軍，所造成的影響是政府高層派遣精英人士至美國留學，回國後這些菁英份子進入政府單位或學術單位服務，自然仍以英語爲精英教育的首要語言。在此歷史背景影響之下，台灣自光復之後的英語教育政策，初期受到此政治力的影響，而以英語爲主要的外語學習語言。

除了政治力之外，台灣在 1970 年代起，由於經濟的發展及九年國民教育的實施，英語往下扎根自國一正式開始以部編本實施教學，後來的九年一貫更將英語教學提早至國小五、六年級，後期甚至提早至國小三、四年級，教科書也由部編本開放爲一綱多本。而至近代資訊網路的興起，地球村的概念影響英語語言政策的修訂，同時列入政府的正式施政項目，因而於行政院挑戰 2008 國家發展計畫中明定全面推動英語學習。

依據以上的簡要說明，台灣的英語政策沿革可分爲四個時期：

一、初中教育時代：英語爲選修課程

1945 年之後，延續國民政府在大陸地區的英語政策，英語於初中改爲選修，高中英語爲必修。由於當時正處於日據時代結束時期，許多知識份子仍以日語爲主要的溝通語言。因此，當時台灣最高行政長官宣稱要在四年內完成國語(漢語)推行。然而，在 1949 年之後來自中國大陸的大量移入人口帶入十分多元的南腔北調，甚至與當地人民溝通時都還需要翻譯人員，此一政令當時推行頗爲不易。也因此造成當時歷史背景的政府，在此一時期以推行國語爲優先，無法考慮到其他外語，英語在此時也無明確的政策(曹逢甫，2008)。

直至 1950 年代，韓戰爆發之後，鑑於美援計畫下赴美人員之英語能力普遍不足，爲了提供美援計畫赴美受訓人員密集的英語訓練，在 1951 年由我國美援運用委員與美援機構成立「英語訓練中心」。1965 年，由於赴美人員減少，該中心直接隸屬台灣大學。而此一時期，政府考慮提供經費派員赴國外受訓時，應增派至歐、日等國家，因而將「英語訓練中心」改名爲「語言中心」，並增加日、法、德、西語之訓練課程與測驗項目，隨著時代演進，後來改名爲「語言訓練中心」並於 2002 年開辦語言訓練課程,由官方資助後再轉型爲財團法人的語言訓練中心，爲我國培育了不少外語人才。儘管後來因應時代變遷，演變爲專責的語言測驗辦理及訓練課程機構，但仍是台灣英語教育於正式課堂教學外之重要英語及外語訓練機構，也是目前外語教育研究與推動的重要單位。

二、國民義務教育實施：英語爲初中必修

爲提高國民教育水準，適應國家建設需要，1968 年起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在此時，我國的英語教育轉變成國民中學一年級正式課程，每個國民自國中階段即接受至少三年的英語教育。此一決策是外語政策的重大改變。

三、九年一貫新課程綱要：英語提早到小學教育

1990 年代之後，我國在實施了二十多年的英語教育後，英語的學習成果受到更多國人的關心。隨著資訊科技時代來臨，也讓各國政府當局開始警覺英文即將成爲網路世代吸收知識的關鍵能力，因爲英語能力將決定下一代使用網路進而擷取新知的主要模式。也因此英語教育向下延伸是非英語系國家共同的新政策。

地球村的概念使得英語的重要性更受重視，同時配合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國際化的政策，我國政府於九年一貫國民教育新課綱中增加語言學習領域(英語)的項目，並自 1999 年將英語提早至國小五、六年級全面開始教授。也就是英語教育政策由原先的國民義務教育三年向下延伸共爲期五年。此一時期的英語課程旨在奠定國人英語溝通能力的基礎、提昇英語學習的動機與興趣、培養國際觀及跨國文化素養、擷取科學或全球新知，以期未來能增進國人對國際化的敏銳度及理解能力，增加國家競爭力。

然而推動近三十年的英語教育政策，整體英語學習成效卻不如預期。台灣的托福成績在全球一百二十個國家中的排名普遍不理想，甚至只超過極少數的亞洲地區國家。此外，根據學者的研究指出，大部分國人學了多年英語仍無法以英語與國外人士進行簡單的口語溝通(張武昌，2006)。

四、「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時代至今

2002 年政府推動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其中與英語政策直接相關的是 E 世代人才培育中的營造國際化生活環境，提昇全民英語能力，其中又分爲五個方向：(一)營造英語生活環境(二)推動英語與國際文化學習(三)提高公務員英語能力(四)大專院校教學國際化(五)平衡城鄉英語教育資源。

在營造英語生活環境方面主要目標是將公共標示文字雙語化，加強雙語環境整合。其次，推動英語與國際文化學習則是以推動全民外語學習方案，提供教學資源給特殊族群及各行業人員，培養國人國際觀及瞭解外國文化。同樣地，爲了能提昇政府公務人員普遍的英語能力，增加政府效能及國家競爭力，也施行了二階段的方案，希望能強

化公務人員整體的英語能力。而教育上，首先是鼓勵大專院校教學國際化，除了鼓勵大專教師以英語授課之外，也鼓勵國際學生至台灣就讀。最後一項是平衡城鄉英語教育資源，例如鼓勵優良外籍老師下鄉服務、號召英語程度良好之大學生下鄉做英語課輔或暑期英語營隊、以及老師暑期在職進修等措施。延續此一國家發展計畫，教育部陸續於 2003 年推動了引進外籍教師四百名，以期能協助提昇英語教學品質。2005 年教育部國教司將英語教學年度延伸爲國民小學三年級開始，同年配合此項政策明定國小及國中英語師資國家標準。上述都是近年來較爲重要的外語政策。

五、其他相關外語政策計劃

在挑戰2008國家發展計畫中，英語政策的推動主要有兩項重點：一個是設置英語村，另一是鼓勵全國各大學建立大學生的英語門檻。茲就這兩項計畫做檢視及簡要說明。

(一) 英語村學習計畫的推動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英語作爲國際共通語言(lingua franca)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如何培養國民良好的英語能力，增加國家的競爭力，便成爲我國政府近十年來的施政重點。因此在2002年行政院訂定挑戰2008國家發展計畫中的第一項就是要培育具有活力與國際對話能力的新世代。

近十年來，韓國推出國際英語村的概念，乃是透過情境的營造及引進外籍人士製造沉浸式的英語學習概念，這個概念引起了台灣各縣市政府及英語學者的重視，並配合提昇國人英語能力建設計畫推行類似的英語村學習。因此，從2007年到2009年不少縣市政府，陸續補助小學成立英語村。而教育部進一步委託學界進行了執行成效的調查，報告中明確指出其效益仍待檢驗(張武昌，2009；張玉山，2010；陳超明，2010)。多數學者指出，從英語村回到普通上課環境之後，在英語學習的態度及學業成果上並無明顯改變。因此，研考會副主委魏國彥表示，未來英語學習情境建置及推動將以活用目的爲主，希望民眾能從日常生活中學習，將英語情境拉出校園外，「沒有圍牆、沒有界線」。

(二) 大學英檢門檻之推動

在挑戰2008國家發展計畫之前，國內已有數所大學將英檢列入畢業門檻，大學生不論主修科系，都需在畢業前通過相關的英語能力檢定測驗標準才能符合畢業資格。以中正大學爲例，於2002年率先推動學士班英語能力畢業資格規定。台大則是從2003年的新生起實施。教育部亦從2006年要求各大學訂定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並明定列爲外語科系評鑑指標之一，同時並要求教學卓越計畫的執行大學都必須填報相關數據。然因應政府政策實施結合國家發展計畫，對於大學生的實質英語能力是否有明顯的提昇，以及執行率是否達成預期目標，還需要做進一步探討與研究。

第二節　我國第二外語教育的政策沿革

我國的第二外語政策沿革可分爲兩個部份，第一是高等教育系統的外語教育政策，第二部份是中等教育的外語教育政策。我國的外語教育除了在高等教育階段負責培育人才之外，自從1980年代經濟起飛之後，爲了因應對外的經貿、政治政策推動，世界地球村的趨勢，及培養我國公民恢宏的世界觀，教育部於1983年起將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的第二外國語正式納入選修課程，以向下紮根政策培育我國第二外語人才。以下將簡述我國高等教育培育第二外語人才的簡史及高級中學第二外語的歷史沿革及成果。

一、高等教育的外語課程

我國高等教育培育第二外語人才除了大學之外語學系外，另外因應各個大學發展特色而有外語學院。茲以輔仁大學、文化大學、東吳大學、政治大學、靜宜大學成立的年代及成立的學系或學院做一整理(表 2-1)。

表 2-1：我國高等教育外語學院成立時間及科系表

外語學院	成立時間	學科系
輔仁大學	1980 年	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等學系及碩博士班
文化大學	1980 年	日本、韓國、俄國、英國、法國、德國及語言教學中心
東吳大學	1984 年	英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德國文化學系及語言教學中心
政治大學	1989 年	英文、日文、阿拉伯語、斯拉夫語、韓語、土耳其語等
淡江大學	1992 年	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俄文、西班牙文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997 年	應用英文、應用日文、應用德文
文藻外語學院	1999 年	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應用華語文、華語文教育 *1966 年初期校名爲「文藻女子外國語文專科學校」，1980 年更名爲「文藻外國語文專科學校」
靜宜大學	2004 年	英文、日文、西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及兒童文學學程、法文學程

資料來源：戴浩一、林麗菊彙編

從表 2-1 可以得知我國成立外語學院的大專院校，包含其成立的時間與成立的學系。整體而言，大學成立外語學院的時間可分爲兩個時期：一個是 1980 年代台灣經濟起飛時期，需要大量外語人才階段，第二個時期則是 1990 年代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國立大學成立外語學院的時間均較私立大學晚(政

治大學 1989 年，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997 年)，而且數量上也是私立大學較多。值得注意的是外語學院的學科系均是以與我國有貿易需求的語言爲主，例如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俄文、義大利文等，其他與我國現今新移民相關的語言或其他語言卻付之闕如，例如越南語、泰語、土耳其語等。從表中可以發現在我國高等教育的正式課程並沒有擴展其他語言人才培育的規劃。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正式課程內沒有其他語言，但是在 2005 年，政治大學、輔仁大學、靜宜大學及文藻外語學院受教育部的委託成立大學外文中心後，外語學習有了新的面貌，大學外文中心是以培育多樣性外語人才爲目標，結合四所大學的教學資源及配合語言遠距課程，建立一個虛擬的外國語文大學，是培育台灣外語人才的長期計畫，目前的成果已可看出初步的成果，外語學習逐步符合現今社會所需。例如北區大學外文中心的政治大學在 2009 年教育部的調查報告中，開設的實體課程語種一共有 22 種外語(如表 2-2)。而後數年，爲因應經貿發展，亦增加數種東南亞語系的課程。

表 2-2：北區大學外文中心開設實體課程語種

北區大學外文中心開設實體課程語種				
英語	日語	德語	法語	西班牙語
俄語	土耳其語	阿拉伯語	韓語	越南語
馬來語	泰語	捷克語	葡萄牙語	拉丁語
義大利語	蒙語	希伯來語	波斯語	維吾爾語
滿文	藏文			

資料來源：2009 年教育部電子報(戴浩一、林麗菊彙編)

從表 2-2 中可以發現除了正式課程常見的語言之外，例如英語、日語、德語、法語等，其他與台灣有密切關係甚至是有可能會促進經貿往來的國家語言及新住民的語言都可在外文中心學習，例如阿拉伯語、捷克語、滿文、藏文、越南語、泰語等。台灣的外語教學除了要從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紮根之外，更需要像外文中心能提供進一步的

高等外語人才培育的場所及環境，這才是國家未來外語政策所需。

二、高級中學第二外語課程

教育部於 1983 年開始於我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將第二外國語正式納入選修課程，並於 1996 年起開始辦理爲期 3 年之「推動高級中學選修第二外語課程實驗計畫」，1999 年 6 月 23 日頒布「推動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 5 年計畫」，2005 年實施「推動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第 2 期 5 年計畫」，以鼓勵高中開設第二外語課程、提升第二外語教學品質及營造第二外語學習環境。爲有效推動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第 2 期五年計畫，教育部於 2005 年 8 月成立「推動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推動工作小組」，分爲課程與教學組、教學資源組及行政整備組，並於同年 11 月增設實驗性質之日語學科中心。

進而爲整合各項資源並順利推動工作，自 2008 年起委託輔仁大學成立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學科中心，並成立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學科中心網站，期望能藉由課程、教學、師資培育、教學環境與辦理交流活動等全面性的措施，持續提升高中第二外語教育的成效。而爲延續高中第二外語教育辦理成果，教育部於 2010 年繼續實施「推動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第 3 期 5 年計畫」，以更進一步提升我國第二外語之教育環境與學習風氣。目前實施成果依據 2010 年的統計資料，計有 228 所學校開設 1,331 班，共 4 萬 2,752 名學生修讀第二外語課程，語種包含日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韓語、俄語、拉丁文、越南語及印尼語(教育部，2011)。

另外，爲提供第二外語學習能力優秀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適性發展機會，教育部於 2008 年 9 月發布「高級中學學生預修大學第二外語課程試辦計畫」，並於同年 11 月發布「教育部補助大學試辦高級中學學生預修大學第二外語課程作業原則」，鼓勵設有多種第二外語學系且辦學績優之大學校院，爲高級中學學生開設第二外語預修課程，並推動參與此計畫之大學校院學系及其他大學校院相關學系或大學通識課程，承認學生修讀「高級中學學生預修大學第二外語課程」所取得之學分，得作爲大學甄選入學加分之參考或入學後學分免修之依據，以

期透過此計畫讓學生學習選擇機會更多元，以厚植我國國際交流之能量。

然在教育部的推廣高級中學第二外語的歷程中，政策立意良好，但卻缺乏完善的配套措施，只著重在數字的呈現，而忽略了外語人才的培育需要一致性與連貫性。多數學校由於專任師資員額的限制及課程列爲選修而有實際授課的困難，亦無法使外語的教學有連貫性。

三、結語

從我國的外語政策沿革可以發現不論是在那個時空背景，都是以英語爲主要的外語學習語言，第二外語除了高等教育外，在 1980 年代才開始向下紮根於中等教育階段。然而在缺乏完整的課程配套機制及行政資源下，外語人才的培育仍嫌不足以因應我國在國際化趨勢下，整體國家政策所需的外語人才需求。

我國的外語政策問題主要是沒有提出前瞻性的思維與核心價值觀，亦無法進一步提供質優且多樣性的多語言學習機會。以英語爲主的外語政策雖然至 1980 年代開始在中等教育階段努力推行，但是缺乏國家整體的宏觀規劃面，以致於長期執行仍無法達到預期的學習成效，多數國人學了十年英語可能還沒辦法適當的以英語表達自己，這是我們在外語政策推動時必須深思的議題。所以未來在制定語言教育政策時，不論是英語或是其他外語都應該全面檢視國家整體的政策制訂與執行計畫，必須清楚定位官方語言、高階人才的語言、生活溝通語言、以及國家必須投注資源的前瞻性語言，並且要有完整的執行與監督專責單位，以進行整體國家政策面的橫向溝通與銜接，才能達到事半功倍之成效。

第三章　全球各國外語教育之推動

第一節　各國推動外語政策之核心價值與政策主張

近年各國因應全球交流頻繁，強力推動外語相關政策或機制，以提昇與世界接軌、溝通之能力。雖然因歷史文化背景而有不同之核心價值與政策主張，分析結果顯示各國外語政策肯定外語學習的價值，提倡外語學習多元面向及層次的理念及需求，主要之重點主張包含一、培育專業外語人才以從事高階外語溝通需求；二、提倡外語應用層次的訓練，以提昇國家於全球之經濟競爭實力；三、著重基本外語之應用能力及外國文化觀培育，提升國民外交素養；四、尊重多元外語發展，保存多元族裔語言與文化：五、建立語言學習指標及語言能力基準評核機制；六、提昇學術研究能力，培育高等教育各領域之學者專家，以傳承及轉譯多元領域之外語資源工作。

一、我國外語政策

我國目前尚未明定全國外語政策，然各部會爲提昇整體外語能力，陸續推動相關計畫，詳述如下：

(一)「社教博識網暨全民學習英語列車」：2001 年教育部建置該網頁專區，提供全民實用英語及會話教材。

(二)「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 至 2007 年)：面對全球化趨勢，行政院將「營造國際化生活環境，提昇全民英語能力」列爲施政重點，具體成果包含設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開辦外語替代役、推動公共標示雙語化及網站雙語化、建置「外國人在台生活諮詢服務網站」及「外國人在台生活服務熱線」、定期辦理外籍人士對我國英語環境滿意度調查。

(三)「行政院營造國際生活環境推動小組」：2008 年行政院正式成立「行政院營造國際生活環境推動小組」，以「策略規劃」、「中文譯

音」、「居留服務」、「旅遊服務」、「投資就業服務」五大面向，整合跨部會業務權責及資源，推動各項措施。

(四)「全國通譯人才資料庫」：2009 年內政部建置「全國通譯人才資料庫」，目前資料庫已建置 391 名通譯人才，熟諳語言包含了越南語、印尼語、英語、泰國語、柬埔寨語、菲律賓語、緬甸語、日語及其他語言(馬來西亞語、德語、法語及阿拉伯語等)，改善在臺外籍人士本地語言溝通及生活品質(行政院，2009)。

(五)「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計畫」：以英語爲主軸，2009 年行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推動「厚植英語力專業人才、建置英語情境學用場域、運用英語力提升城市競爭力、運用英語力增進國際服務品質、強化整合支援國際化推動機制」等 5 項實施策略，總計 35 項具體措施。各項執行策略主要涵蓋二大主軸：一爲提升國人英語能力素質，強化國際語言人才培育工作、英語情境學用的創新作法，以養成得以與全球對話交流的新國民；二爲營造友善之國際環境，增進生活環境品質，延攬外資外才，提升我國全球競爭力(行政院，2009)。

二、日本的外語政策

日本外語政策最大的特色爲「English Only」，亦即「外語」教育等於「英語」教育之外語政策(古賀範理，2002)。2010 年文部科學省中央審議會提出「提昇英語作爲國際語能力之五大提議及具體措施」：具體把握及檢核學生的英語能力，提升英語學習的動機，增加學生英語使用的機會，強化英語教師的英語能力，以及修改大學入學測驗內容，如強調國家與學校應重視 TOEFL、TOEIC 等外部檢定測驗之結果，並將之納入一般入學考試之評量項目中，以具體掌握學生英語能力。

日本之外語政策整體爲瞭解外語結構及其文化、培養積極以外語溝通的態度、養成聽說讀寫等整合的語言技巧。並重視透過學校與企業間的合作，讓學生能夠到實際使用英語的工作現場見習，提升英語使用動機。

三、新加坡的外語政策

新加坡是由華人、馬來人及印度人等三大種族所組成的多文化、多民族國家，共有四種「官方語言」，分別是華語、馬來語、淡米耳語及過去殖民時代統治階層使用的英語。1996 年起，新加坡的雙語政策主要以英語爲第一語言，其他三種官方語言對各種族而言被視爲第二或是母語，重視英語及母語能力之培養。在 2001 年公告之課程綱要(English Language Syllabus, 2001)中提到「英語是新加坡四個官方語言之一。身爲行政、教育、商業、科學甚至是全球共通語言的英語，是全體新加坡人從世界中汲取資訊的重要語言。」「對全體學習英語的學生來說，英語的說、寫技巧，是職場上不可獲缺的技能」。

在其外語政策爲 Preparing Students for a Global Future 及 Language Learning for a Global City 的核心價值下，新加坡在教育部下成立國家級的語言教學中心(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nguage Centre, MOELC)，以在教育體制內提供集中式的外語增進學習機會。國立新加坡大學亦於 2001 年成立語言學習中心(The Centre for Language Studies)。新加坡幾乎是傾注國家之力，爲積極培養國民外語能力的最佳典範。

四、美國的外語政策

21 世紀經濟活動之全球化與重視國家安全考量促使美國思索如何培育公民國際語言及文化素養。美國整體外語政策重視五大目標，包含提昇國家安全與外交能力，提昇國際經貿發展，提升公民參與國際事務和經濟活動的能力，提倡外語多元性，保存多元族裔語言與文化，及提昇學術研究能力(Jackson & Malone, 2009)。

首先，就提昇國家安全與外交能力而言，美國政府重視高等外語專業人才培育，以從事國防及外交事務。50 年來，美國政策制定者已提倡徵召多元外語人才的重要性，外語能力對於國家安全是具關鍵影響力的，重點語言包含阿拉伯語、華語、印度語、日語、俄語、韓語、波斯語、土耳其語及其他中亞地區語言(Jackson & Malone, 2009)。2001 年 911 事件後，美國聯邦政府部門，立即動員聘用多國外語人才，包

含阿拉伯語、波斯語、及韓語等外國語。且這些高階外語專業人才需具備口筆譯技巧、熟悉網路溝通模式及語言、代表國家參與國際論壇，並對外語文化及語言應用能力有高度的掌握能力。此外，2005 年，美國國防部也在重視國家安全之下，發佈語言轉換防禦路線圖(Defense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Roadmap)，所有軍官均需習得一外語，即使是最小的工作單位，均需配有至少一位軍人，對於文化及應用語言能力有所瞭解(Jackson & Malone, 2009)。美國對高級外語人才之期許爲，得以和多國人士溝通，建立友好工作情誼、闡述解說概念想法、進行深度的價值觀溝通。

其次，外語政策的第二目標爲提昇國際經貿發展。政府單位與學者專家一致認同習得外語有助提高美國之商務競爭優勢(Carreira & Armengol, 2001; Helliwell, 1999; Lena & Moll，2000)，在多國外語中，美國審計總署(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更是肯定八大語言，即華語、阿拉伯語、日語、俄語、印度語、韓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對於公務機關及民間機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2002)。2007 年發佈之 Testimony on national language needs to the senat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to government management 中，美國商政關係聯盟(Business and Government Relations) 與美國經濟發展委員會(Committe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均表示在 21 世紀美國經濟國家穩定發展乃有賴於新一代學子的外語能力及文化認知，21 世紀的美國高等教育人才應具備三種條件：習得至少一種外語，具備對其他國家的廣泛知識，並關注全球議題(Petro, 2007)。

外語政策的第三項目標爲提升公民參與國際事務和經濟活動的能力。全球溝通已不再受限於政府機關與跨國企業之交流，如同 The World is flat 作者 Thomas Friedman 所言 (Friedman, 2005)，全球化趨勢淡化了原本各國的界線，就業的立足點放眼全球之下，也開創了無限商機的世界，而且，這個世代轉變的速度遠超過預期，人民生活週遭需以外語溝通交流的需求已大增。無論中小企業或當地商店的人員均需具備基本外語能力，以增強與不同文化間的良善互動。因此，基本外語之應用能力及文化素養也應該受到重視。

第四項目標爲提倡外語多元性及保存多元族裔語言與文化。隨著美國新移民所帶來的文化進駐，語言的使用亦日趨多元，根據美國2005 人口普查(MLA Language Map, 2010) 目前已有 19.39 %美國居民以英語以外的語言，作爲日常溝通工具。語言之多元性，也促使美國重視新移民英語學習的機制及保存文化傳承母語的必要性，如此才能強化整體國家雙語或多語文化之豐富及多元性。

美國外語政策的第五項目標爲提昇學術研究能力。此一目標主要在培育高等教育各領域之學者專家，以傳承及轉譯科學、科技、經濟、歷史、語言學等多元領域之外語文獻及資源，增強國家智識實力。英語雖然多年來爲最重要的國際語，不可否認，許多豐富的文獻資料以其他外語書寫，需仰賴具外語能力之學者收集、理解、及詮釋資料。近年來，許多美國大學的資深外語專家學者已陸續退休，多數專家大多由 1958 年國防教育條款(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 與國防外語研究獎學金(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Language Fellowships)補助其在外語專業領域的研究計畫。然而，目前卻無人接續這些專業領域的相關研究。另外，具備一定語言、文化、智識能力以從事深度研究之研究生也大量縮減，導致在政治學、歷史、公共衛生、社區發展、工程學、文學、電腦科學、語言學領域研究成果*衰滅*，影響美國的學術成果及智識傳遞的主導地位。Jackson & Malone (2009)呼籲應正視培育高等教育外語人才，以轉譯多元領域資料、提昇學術成果之重要性。

另外，爲了外語教育的改革，美國政府制訂了國家級課程標準(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1996 年初版，1999 年再版，建立語言學習指標及語言能力基準評核機制。此一標準將美國外語學習指標歸納爲五大核心(NSFLEP, 1999)，即：溝通能力(Communication)、文化理解(Cultures)、跨領域學習(Connections)、語文素養(Comparisons) 和社群參與(Communities)，上述五大核心並非自成體系，而是環環相扣，體現美國二十一世紀外語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方向。

(一)溝通能力(Communication)：培育學生能以目的語進行人際溝通、

能詮釋以目的語傳達的溝通內涵、並能以適宜方式呈現以目的語溝通的訊息。

(二)文化理解(Cultures)：能以目的語瞭解不同的文化傳統、文化觀點、文化創作、及文化內涵。

(三)跨領域學習(Connections)：外語學習應與其他學科相結合，以獲得相關資訊和知識。學生能經由目的語之語言文化學習其他領域的專業知識、汲取學術內涵。

(四)語文素養(Comparisons)：培養對多元語言和文化本質的分析及觀察能力。通過比較目的語與本國語言，理解語言的本質、文化的概念與內涵，更經由此一文化素養訓練，瞭解自身之母語文化。

(五)社群參與(Communities)：能用外語參與國內外、校內外的多文化活動。例如，能在課室之外的真實情境中運用目的語、能使用目的語作爲終身學習的主要媒介、能重視以目的語參與國際社群經驗。

五、英國的外語政策

英國教育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於 2002 年出版 Languages for All: Languages for Life，清楚勾勒英國政府對於國家外語政策之主張，提倡外語教育應不僅落實於中小學正規教育，更應鼓勵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及在職訓練重視外語學習，英國國家外語政策主要包含三大重點目標(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02)：提昇語言教學及學習品質、建立全國認同的語言學習指標及評核機制：得以鼓勵多元外語發展、協助學習者鑑定外語學習成就、及推動外語學習風氣。而建立的語言指標共有三種：The Key Stage 2 Framework for Languages，Framework for Teaching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及 The Languages Ladder。

六、澳洲的外語政策

澳洲認爲國家語言政策和國家經濟與建設具有高度關聯性，因此，澳洲參議院於 1984 年提出國家語言政策應具備四大原則(Lo

Bianco, 1990)：具備英語溝通能力、保存並發展外語、提供外語學習相關機制與服務、推動學習第二語言之機會。以此爲基礎，澳洲國家語言政策將社會目標列入考量，包含四項主題。

(一)平等(Equality)：重視社經不均與語言間的關聯，相關議題包含因不識英語所引起的弱勢、對於多元語言的負面態度(認爲某些主導語言優於其他少數語言者)，英語雖視爲全國共通語言，亦鼓勵社區原住民語言的使用。

(二)經濟(Economics)：提倡雙語教育、第二外語學習應用層次、英語爲第二外語或外語教學之經濟效益，重視語言議題，因爲語言能力與經貿發展、澳洲未來國家方向有長足的相關性。

(三)強化(Enrichment)：強調全國第二語言學習，支持第二語言學習對文化及知識之助益，此外，重視澳洲其他外語之保存發展。

(四)定位(External)，重視澳洲與其他國家多邊間的交流，包含跨國支援、技術移轉等。

七、歐洲聯盟的外語政策

歐洲委員會的活動旨在推動歐洲文化公約第二條中有關促進語言多樣性和語言學習領域的教育活動，以促進締約國之間相互語言教學與學習。歐洲委員會在該地區的語文教育政策，已順利發展了五十年，推動語言多元化、語言使用權，並加深各成員國的相互瞭解，鞏固和維持民主的公民社會的凝聚力。歐洲聯盟語言教育政策提倡以下五面向 (Council of Europe, 2011)。

(一)多語文化(Plurilingualism)：依據多元語言與不同語言能力之需求，培養終生語言溝通的能力。

(二)語言多樣性(Linguistic Diversity)：堅信歐洲各語言應受平等之對待，所有的語言均爲其所屬文化溝通和表達的象徵，保障每種語言都有其使用及學習權。

(三)相互理解(Mutual Understanding)：有機會學習其他語言不同文化間的溝通及接受文化差異是一個必要條件。

(四)公民素養(Democratic Citizenship)：個人具備多語言能力，得以參與多元語言社會之民主和人際交流。

(五)社會凝聚力(Social Cohesion)：平等的機會、個人發展、教育、就業、流動性、獲取資訊和文化修養取決於終生的學習語言。

表 3-1：各國推動外語政策之核心價值與政策主張簡表

國家	外語政策之核心價值與政策主張
我國	尚未明定全國性外語政策，過往計畫著重於以下面向 1. 厚植英語力專業人才 2. 建置英語情境學用場域 3. 運用英語力增進國際服務品質 4. 營造國際生活環境
日本	1. 具體把握及檢核學生的英語能力 2. 提升英語學習的動機 3. 增加學生英語使用的機會 4. 強化英語教師的英語能力 5. 修改大學入學測驗內容
新加坡	1. 主要以英語爲第一語言，其他三種官方語言對各種族而言被視爲第二語言或是母語 2. 視英語爲全體新加坡人從世界中汲取資訊的重要語言，是職場上不可獲缺的技能
美國	1. 提昇國家安全與外交能力 2. 提昇國際經貿發展 3. 提升公民參與國際事務和經濟活動的能力

	4. 提倡外語多元性，保存多元族裔語言與文化 5. 提昇學術研究能力，以傳承及轉譯多元領域之外語文獻 6. 建立語言學習指標及語言能力基準評核機制
英國	1. 提昇語言教學及學習品質：促進中小學外語教育、外語師資培訓、語言專門學院發展、多元族裔語言課程、資訊溝通科技運用 2. 建立全國認同的語言學習指標及評核機制 3. 推動外語學習風氣：推動大學院校、推廣教育機構、及在職訓練、公司行號機構重視外語學習
澳洲	1. 平等(equality)：重視社經不均與語言間的關聯，鼓勵社區原住民語言的使用 2. 經濟(Economics)：提倡雙語教育、第二外語學習應用層次、英語爲第二外語或外語教學之經濟效益，重視語言能力與經貿發展 3. 強化(Enrichment)：強調全國第二語言學習，重視其他外語保存發展 4. 定位(External)：重視與其他國家多邊間的交流
歐洲聯盟	1. 多語文化(Plurilingualism)：依據多元語言與不同語言能力之需求，培養終生語言溝通的能力 2. 語言多樣性(Linguistic Diversity)：堅信歐洲各語言應受平等之對待，保障每種語言都有其使用及學習權 3. 相互理解(Mutual Understanding)：有機會學習其他語言不同文化間的溝通及接受文化差異是一個必要條件 4. 公民素養(Democratic Citizenship)：個人具備多語言能

	力，得以參與多元語言社會之民主和人際交流 5. 社會凝聚力(Social Cohesion)：平等的機會，個人發展，教育，就業，流動性，獲取資訊和文化修養取決於終生的學習語言

資料來源：戴浩一、林麗菊彙編

從各國外語政策之歸納可發現，各國之核心價值與政策主張重視外語學習在各場域的應用實力，以能整體提昇公民參與國際事務和經濟活動的能力。為提倡外語學習多元面向及層次的理念及需求，培育外語師資、建立語言學習指標及語言能力基準評核機制、提倡外語多元性，保存多元族裔語言與文化均為重點發展工作。

第二節　全球各國重要外語教育政策

因應全球賽局，各國近十年來已提出重要外語教育政策以因應社會多元語言文化之需求。根據 David Graddol (2006)在 English Next 中所言，1960 至 2000 年間，全球移民人數已雙倍成長，總計 1.75 億人口，占全球人數 3%。以倫敦市為例，2000 年倫敦各學校學生總計來自 300 種不同之語言背景。這項數據顯示現代語言之溝通已不再是單一語言為主，而是多元語言及文化並存交流之全球化社會。外語教育的成效關鍵影響各國社會語言文化之蓬勃發展與國家於全球之視野。

Pufahl, Rhodes, & Christian 在 2000 年就各國外語政策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小型研究：“Foreign Language Policy: What the U.S. Can Learn From Other Countries”，該研究由美國應用語言學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CAL)主持，美國教育部教育研究改善局補助相關經費，訪問 19 個國家的語言教育專家，總計 22 名，議題主軸涵蓋外語政策與教學理念、各國語言相關機構值得參考之現行執行策略、多數及少數使用外語之教學實務、課程設計、研究、教師聘任、師資培訓。研究結果顯示成功的外語政策仰賴國家級理念及資源之統籌，進行長遠深耕從上到下的整體制度規畫，以下統整該研究發現並佐以其

他相關文獻，顯示成功之外語政策具備九大特質：一、採用強而有力的外語政策；二、建立自小學起步之外語教育制度；三、重視鄰近國家語言之學習；四、建立完善之外語學習共同參考架構；五、建立嚴格之外語師資培育制度；六、推動科技輔助外語教學；七、運用有效之外語教學策略；八、實施外語學習評量與測驗；九、保存多元族裔之原生語言文化。

一、採用強而有力的外語政策

政策是語言教育執行成效的關鍵因素，強而有力的外語政策有賴於國家高度單位的大力推動。以澳洲國家外語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Languages)爲例，其對外語教育影響甚遠，在該政策的推動下，澳洲各區進行執行策略之擬定與發展、大力落實外語教育至小學階段、鼓勵多元族裔語言文化之保存發展、並成立相關語言教育推動單位。例如，Language Australia (National Languages and Literacy Institute of Australia)推動了應用語言學及跨文化相關研究、專業訓練、語言相關議題之宣導工作。1987-1990 年間，澳洲聯邦政府投資近二千二百萬澳幣(Lo Biano, 1987)發展澳洲第二語言學習計劃 (Australia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Program，ASLLP)，正面培植當地教育理念、方針、與創新之教學方案。另外，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in Australian Schools Strategies (NALSAS) 根據澳洲經貿往來地區，選定漢語、日語、印尼語、韓語爲發展語言，爲澳洲學生在學習歐洲語言外，開拓了亞洲語言學習機會，充份引發外語學習意識及興趣 (Pufahl, Rhodes, & Christian, 2000)。

以色列在 1996 年改革語言政策，簡稱 “three plus”，意即，猶太裔、阿拉伯裔之學生必須學習三種語言 (希伯來語、英語、阿拉伯語)，另外，從以下三大類中選擇一種語言：文化傳承母語(如，意第緒語或拉迪諾*語*)、社區語言(如俄語、阿姆哈拉語、西班牙語)、或其他外語(如日語、漢語、德語等等) (Pufahl, Rhodes, & Christian, 2000)。國家之語言政策推動，提昇了國民參與國際文化交流之能量與素養。

由此可證，國家若能制定長遠的外語教育，提供各級學校大格局

方針，將有助於整體外語教育規畫及資源的整合及執行，如芬蘭學者 Takala (1998)贊同，國家長期及系統化大規則的語言規畫是外語教育成功的前奏曲。

二、建立自小學起步之外語教育制度

全球多國爲提昇國民外語能力，極力推動小學及學齡前外語教育。歐盟考量歐洲國家整合、文化與族群融合及國際競爭力，提出「mother tongue +2」的概念 (European Parliament, 2006)，意即要求人民除自身母語外，學習兩種外語，並將此概念作爲國家整體政策的思維，落實到中小學教育。泰國肯定外語在提昇國際競爭力之重要性，自 1996 年起，將英語列入小學一年級必修學科。南韓亦因國際貿易需求，自 1997 年起，將英語列入初等教育的授課範疇，實施從小學三年級至高中一年級一貫的英語教育制度、及全國高中皆百分之百實施之第二外語教育。新加坡從小學一年級起，將英語列入必修課程。小學一至四年級爲基礎課程(foundation stage)，五至六年級進入定向課程階段(orientation stage)。奧地利在 1998-1999 學年度已有 80-90%的小學在一年級納入外語教學，大部份學校採英語爲第一外語，一至二年級，英語納入與其他科目教學，三至四年級，英語成爲一個獨立的教學科目，每週授課一小時 (Pufahl, Rhodes, & Christian, 2000)。

綜觀 Pufahl, Rhodes, & Christian (2000) 的研究成果，在受訪之 19 個國家裡，15 國將學習外語列入國民義務教育科目，並在小學甚至學齡前即開始學習外語，其中 14 國視英語爲第一外國語，並鼓勵第二外國語的習得，在第二外國語的選擇上，集中於歐洲語系，甚少接觸亞洲語系，或許與其鄰近國家及地理位置有關。相較於受訪之 19 國，美國外語學習起步較晚，Pufahl, Rhodes, & Christian (2000)因而也建議美國應參酌受訪國家的外語學習學齡(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各國外語教授語言類別及學齡

國家	第一外語	學齡	列入義務教育	其他外語

			與否	
澳洲	法語	6	否	德語、希臘語、義大利語、日語
奧地利	英語	6	是	法語、義大利語
巴西	英語	11 或 12	是	西班牙語、法語、德語
加拿大	法語	10	是	德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日語、漢語、旁遮普語
智利	英語	<12	未知	法語、德語、義大利語
捷克	英語、德語	9	是	法語、俄語、西班牙語
丹麥	英語	10	是	德語、法語、西班牙語
芬蘭	英語或其他	9	是	瑞典語、芬蘭語、德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
德國	英語或其他	8	是	法語、西班牙語、俄語、義大利語、土耳其語
以色列	英語	10	是	希伯來語、法語、阿拉伯語
義大利	英語	8	是	法語、德語、西班牙語、俄語
哈薩克	英語	10	是	德語、法語
盧森堡	德語、法語	6 和 7	是	英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
摩洛哥	法語	7	是	英語、西班牙語、德語
荷蘭	英語	10 或 11	是	德語、法語

紐西蘭	法語	<12	否	日語、毛利語、德語、西班牙語
秘魯	英語	<12	未知	法語、德語
西班牙	英語	8	是	法語、德語、義大利語、葡萄牙語
泰國	英語	6	是	法語、德語、漢語、日語、阿拉伯語
美國	西班牙語	14	否	法語、德語、日語

資料來源：Pufahl, I., Rhodes, N. C., Christian, D. (2000, 戴浩一、林麗菊彙編)

三、重視鄰近地區語言之學習

雖然多國視英語爲第一外語學習科目，地理位置亦列入參酌外語科目之重要依據，以德國爲例，在邊界地區，外語視鄰近地區語言而有所不同，例如北部地區第一外語爲丹麥語，西北部地區第一外語爲荷蘭語，東部地區第一外語爲波蘭語，鄰近法國地區，第一外語則爲法語，這些地區則視英語爲第二外語(Pufahl, Rhodes, & Christian, 2000)。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非以法語爲母語的學生自小學四年級起開始修習法語課程，法語爲一獨立學習科目，每年修習時數至少 600 小時。近年已紛紛有學者呼應，在國際語教學中，應重視與鄰近國家的交流，以彼此的語言進行溝通。以日本爲例，從地理關係來看，日本與南韓、北韓相鄰。雖然得以使用英語爲媒介語(interlingua)進行溝通，但這仍與使用兩國其中一個國家的語言進行交流、對話在本質上有極大的不同，應鼓勵學習鄰近國家語言，並提供相關機會。

四、建立完善之外語學習共同參考架構

多國語言教育學者倡導建立外語學習共同參考指標架構的重要性。有效的架構制度可以協助教師與學生擬定外語學習的時間點、評估教學及學習要素，並鑑定不同時期之語言程度，以整體提昇外語學習技巧 (Pufahl, Rhodes, & Christian, 2000；Christian, Pufahl, & Rhodes, 2005)。

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The Framework of Reference: Language, Teaching, Assessment)，爲目前全球執行上頗具績效的外語學習參考架構，其主要目的是讓歐洲各國語言的教學和評量具有透明度, 使各國採用的標準可以互相採認，此一架構已建立至少 18 種外語初階、中階、中高階指標(Christian, Pufahl, & Rhodes, 2005)。目前已成爲國際上將近四十幾個重要國家聯盟使用的外語分級重要參考，對於學習目標、教學、評量具相當大的正面迴響，甚而成爲各國進行課程規畫設計、擬定外語檢定、編撰外語教材、與師資培育之重要指標依據，廣爲歐洲國家以外，甚至爲其他地區國家採用之語言測驗的分級標準，各國業界也採用該參考架構認定新進人員之外國語言程度(Christian, Pufahl, & Rhodes, 2005)。

澳洲 the Australia Language Levels Project (ALL)是另一項成功的指標依據，整體系統化整合外語學習面向，提昇澳州外語學習規畫、中學外語能力門檻與分級評量、與專業教師培育，尤其對於提昇漢語、印尼語、韓語、及日語學習之發展，具相當影響力(Christian, Pufahl, & Rhodes, 2005)。

五、建立嚴格之外語師資培育制度

外語師資的培育深切影響外語教育品質。各國成功案例顯示對於外語師資培育之重視與嚴格訓練。Pufahl, Rhodes, & Christian (2000) 研究顯示，成功的外語師資培育要素包含整合學科知識、教學知能、以及現場教學實務能力之培養。培訓分爲師資職前教育與在職教育。

(一) 師資職前教育

在摩洛哥，英語教師受過嚴格之語言訓練，需具備英語系所大學學歷(包含一年文學或語言學的專業訓練)，大學畢業後，另接受教育學院爲期一年之語言教學法及教學實務特訓。摩洛哥大部份大學院校英語教師均已取得英美國大學之博士或碩士學位。

在德國，外語師資培訓分爲二階段。第一階段爲需具備大學學歷(相當於歐美學制中之雙主修碩士)，語言主修者，於修業期間，一半之課程爲修習專業學科，另一半之課程爲修習應用語言學或教學法相

關課程，此外，學生需針對每個主修課目參與爲期 6 星期的實習課程。第二階段爲長達一年半的實習生涯，學生將受指派到各校實習，並由專屬輔導老師進行指導，每週亦需參加教學法研習，實習結業前需通過 Second State Exam，嚴格的考驗包含二大主修科目之試教、應用研究相關之論文寫作、及 2 小時之口試。

在丹麥，中小學師資需修習四種專業科目，其中二種爲丹麥語及數學，另亦修習教學法總論、特定學科教學法、語言習得相關理論，並參與實習生涯。

另外，歐洲國家師資培育之一項顯著成果爲將外語師資培育引進大學院校。例如，德國提供專業語言學位課程(specialist language degree programs)，將師資培育納入各系所，以培育專業外語師資(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for specific purposes)，許多專業語言學位畢業生在學校的鼓勵下，均有海外經驗，以英國爲例，多數專業語言學位課程將海外求學或工作列入一般生修業要求。

(二) 師資在職教育

除了職前教育，在職進修也爲外語師資培育成功的要素之一。自 1990 年起，西班牙要求所有小學教師取得語言專業資格(language specialists)，未取得資格者需接受額外集訓以保有教職，未接受集訓者，需重新申請職級爲非語言專業教師(non-specialist teachers)。芬蘭、德國、泰國則大力推動教師研習，德國提供外語教師十分周全之研習課程，每位教師每年得有一週參與公費之在職研習。

六、推動科技輔助外語教學

隨著科技日異月新，各國興起善用媒體、網路等資源輔助外語學習的潮流。英國教育政策長年推動 ICT 資訊溝通科技外語教育之整合，以建教合作模式推動 Curriculum Online 計畫，提供線上多媒體教學及教材，並由中央政府發放 eLCs 點數(Electronic Learning Credits)給各地區教育局，支助各學校多媒體外語學習資源的建立(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05a)

各國也建立全國性之廣播平臺支持外語學習環境之營造。英國廣播公司 BBC (http://www.bbc.co.uk/languages/)提供語言學習專區網頁，全額免費提供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希臘語、葡萄牙語、漢語、及其他語言之學習課程、教學資源，從學習者的角度出發，網站內容與時下全球關注議題結合，提供 12 週初學者課程、外語文化簡介、外語學習技巧、多元外語電視廣播節目連結等學習資源。另更進一步建立外語教師專區，提供教學策略、新觀點與議題之資源。西班牙教育部製作 Leer.es 學生閱讀學習網站 (http://estudiantes.leer.es/)，提供簡短文章閱讀及相關資源。法國設立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http://www.rfi.fr/lffr/statiques/accueil_apprendre.asp)，團隊由傳播及法語教學專業人才組成，電台提供法語課程、簡明法語版之時事新聞廣播、針對學習者設計的 journal en français facile，並附有講稿及音檔。

除了外語學習本身，個人外語學習經驗也愈受全球重視。歐盟重視語言學習經驗分享的獨特性，建立了 European Language Portfolio 語言學習分享平臺以及 Autobiography of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跨文化經驗分享平臺，並推動 European Day of Languages 多元外語學習資源網站，經由網際網路之媒介，學習者不僅可以記錄個人外語學習歷程，也得到一個全球管道進行外語學習及文化經驗之交流。

七、運用有效之外語教學策略

歸納上述提及各國之有效教學策略，主分爲六大類。一、整合語言與內容導向學習，Graddol (2006)在English Next一書中表示，歐洲已有多校採用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CLIL)理念進行教學，此模式多在中學實施，學生在小學建立目的語之基礎後，進入中學時即以目的語爲媒介學習不同學科內容，如地理、歷史、音樂、體育、或甚至是技職科目，加拿大的外語學習制度亦提供學生沉浸式雙語教育的選擇(Immersion Education)，沉浸式雙語教學模式是加拿大首創，被譽爲在加拿大語言教學改革上一大成就，在沉浸式雙語教育機制之下，教師使用外語教授語言本身及學科內容，小學學生每年以法語學習語言及學科總計至少3,800小時，另外沉浸式雙語教育的其一

變革(Extended French)，則採部份課程以英語教授，另外約每年1260小時課程以法語教授(Pufahl, Rhodes, & Christian, 2000)；二、重視溝通式教學，丹麥、德國、荷蘭、紐西蘭、秘魯、與西班牙均提倡溝通及跨文化學習，這不僅有助教學目標、教學原理、課程設計、及教材之發展，更有助於學生口說寫作能力之養成；三、重視語言學習策略，荷蘭教師引導學生反思個人語言學習歷程，丹麥將特定的外語教育應具備之知識及能力列入課程整體規畫，如語言習得認知、技巧學習(如增強字彙量、閱讀聽力學習策略等)；四、依能力分級授課，而非年齡或年級；五、採用專題式學習法，刺激學生整合實際情境教材及議題，解決問題並產出*學習*成品；六、將地域 多元族裔之優勢，納入課程規畫，德國許多學校已使用雙向式雙語沉浸教學模式(two-way immersion)，即利用地域多元族裔之優勢，一半學生爲修習之特定外語爲母語學生，一半爲非母語者。七、發展適合國人使用之外語教材，新加坡教科書由其教育部企畫開發局(CPDD)統一進行編輯。在教育部嚴謹的管理下，評閱修訂教材。除了教科書外，也使用大量的副教材，從小學起，即培養學生具備使用視聽語言教室、電腦輔助教材設備的能力，以整合聽說讀寫技能爲目標授課，教科書中富含新加坡多民族文化的特性。書中登場的人物，大多以新加坡人的名字出現，地名也採用新加坡實際的地名。此外情景設定、人物軼事等題材也以新加坡常見的場景或既有之故事爲主，融合各民族不同的習俗與文化。

八、實施外語學習評量與測驗

在中小學教育中，荷蘭建立了在中學外語能力之檢核機制。由荷蘭國家測驗中心(CITO) 制定中學外語畢業門檻測驗，30% 經大學先修系統(the pre-university stream, VWO)升學之荷蘭學生在十二年級參加此一測驗，測驗內容包含三種外語，即英語(包含聽說讀寫測驗)、法語(閱讀測驗)、德語(閱讀測驗)，另外 40%升學至理工學院者(MAVO)，在十年級完成後，參加中學外語畢業門檻測驗，此一測驗包含英語能力檢測、法語或德語之聽說技巧測驗，以上二者測驗成績占外語學科 50%成績，評量機制也影響了課程整體規畫內容 (Pufahl, Rhodes, & Christian, 2000)。

九、保存多元族裔之原生語言文化

全球各國因多元族裔之進駐，推動文化傳承母語之保存工作，助益國內語言資源的保存和少數族群的文化成就。加拿大及紐西蘭在推動多元文化傳承母語不遺餘力。加拿大許多省份在 1990 年代早期已宣佈提倡語言多元化的政策，阿爾比省、英屬哥倫比亞省、曼尼托巴省、安大略省、魁北克省、沙斯喀其溫省(Alberta, British Columbia, Manitoba, Ontario, Quebec, Saskatchewan) 均在正規教育中爲多元族裔設立文化傳承母語課程，多在週末或放學後由校方、社區、或宗教團體、授課；或者，採雙語沉浸教學模式，如阿爾比省、曼尼托巴省的烏克蘭社區，使用烏克蘭語教授一半課程。紐西蘭具體的做法則爲採用「語言巢」(language nest)方案，針對毛利語及太平洋島語言(如薩摩亞語和東加語)，提供學前兒童母語薰陶的幼稚園教育(Fishman, 1991)。

第三節　美國外語政策之執行單位

美國對外語政策的推動，多爲國家爲主導的政策執行。自 1960 年代起，爲提昇外語教育，陸續成立四大外語政策執行單位，分別從事不同之重點工作。其整體核心價值爲提升國民全球文化視野及智識、外語多元性、多元族裔語言與文化之保存、學術研究能力、國家安全與外交能力、以及國際經貿發展。以下分別就四大單位的作法、成果、計畫內容逐一簡要概述(參見表 3-3)。

表 3-3：美國外語政策之執行單位簡介

成立時間	單位名稱	專責角色	核心價值
1960 年	**國家語言諮詢會** National Council of	聯繫與督導各州外語政策的執行 1. 推動語言相關議題之探討	1. 提昇國民全球文化視野及智識 2. 提倡外語多

	State Supervisors for Languages (NCSSFL)	2. 與其他機構合作，推動語言教學與管理品質 3. 推動國際外語教學與學習合作 4. 明確定位國家級外語政策與執行 (state-level positions in languages)	元性，保存多元族裔語言與文化 3. 提昇學術研究能力
1986 年	**國家外語中心**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NFLC)	推動國家級的外語教育政策及計劃 1. 中央及地方層級政策制訂與推動 2. 各級學校、政府部門主管及教師之專業發展與語言課程 3. 公家與私人機構單位之語言教育訓練 4. 傳統語言教師之專業發展與培訓	1. 提昇國家安全與外交能力 2. 提昇國際經貿發展 3. 提昇國民全球文化視野及智識 4. 提倡外語多元性，保存多元族裔語言與文化 5. 提昇學術研究能力
1990 年	**國家外語資源中心** National	推動美國外語教育研究計畫 1. 外語教學與學習	1. 提昇國際經貿發展 2. 提昇國民全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NFLRC)	策略 2. 外語能力之測驗與評量 3. 外語教材發展 4. 外語教師之專業發展與培 5. 外語研究成果、教材、測驗工具推廣與分享	球文化視野及智識 3. 提倡外語多元性，保存多元族裔語言與文化 4. 提昇學術研究能力
1994 年	**國家中小學外語資源中心** National K-12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推動美國 K-12 外語教育 1. 各級學校及教師、政府部門、外語資源中心之合作 2. 外語相關部門機構主管及外語研究人才之專業發展與語言課 3. 外語研究之推廣：成果評鑑、教學法、科技整合 4. 外語研究成果與資源之推廣與分享	1. 提昇國民全球文化視野及智識 2. 提倡外語多元性 3. 提昇 學術研究能力

資料來源：戴浩一、林麗菊彙編

一、國家語言諮詢會 National Council of State Supervisors for Languages (NCSSFL)

NCSSFL 由美國國家級的教育機構 State Education Agency(SEA)組成，其成員主要任務爲聯繫與督導各州外語政策的執行，這些成員大多具有多重身分，可以是國家的監督者、專家或顧問，從事一個或多個職責。NCSSFL 在外語教育上影響各州政策，以確定外語政策的立場，並與其他組織合作以推動優質的教學和專業領導。它的作法包含推動語言相關議題之探討、與其他機構合作，推動語言教學與管理品質、推動國際外語教學與學習合作、明確定位國家級外語政策與執行(state-level positions in languages)。

NCSSFL 的主要成果分爲三項：一)建立一個全國各區對共同外語政策相關主題的論述平台(NCSSFL State Reports)，全國各州外語執行督導需定期將外語政策或相關的執行報告填寫於線上報告，並盡量提供該區詳盡的作法，此報告主要重點在於學生外語學習成果、師資相關培訓及證照、外語教育出版物、外語及傳統語言政策之執行、遠距教學或 e-learning 等相關。而全國各州可參考其他州在外語政策執行面的實際作法，以了解全國外語教育的進行；二) 匯整全國各區外語學習相關的線上資源，以宣導各州針對外語學習成立的相關機構及其主張；三) 發表外語政策相關報告及舉辦外語相關研討會，明確定位國家級外語政策與執行 (NCSSFL, 2011)。

二、 國家外語中心(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NFLC)

由 Maryland 大學在 1986 年成立的全國外語中心(NFLC)，致力於提高美國民眾在英語以外的語言能力。NFLC 一直在努力釐清國家語言能力的需求，而發展出以下功能：一) 政策規劃方面，試圖藉由提出外語教育的迫切需要，來影響公共政策，並深入到聯邦，州和地方政府及工商業；二) 課程發展方面，創立線上學習管理系統，並在各種語言和學科上，發展教材及師資培育；三) 第二語言習得方面，保證其外語學習及評估皆與認知科學和第二語言習得之理論和實證研究相符合；四) 教學系統設計、開發和實施有效的學習系統，包括線上

學習課程、遠距教學、專業培訓。

(一) 主要作法

首先於 1990 年創立「較不普遍教授之語言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NCOLCTL)，致力於增加美國公民在選擇學習較不普遍教授之語言的人數以提高跨文化交流。1996 年重新評估大學程度之語言教學和學習目標與做法。1997 年則進一步建立以網路爲基礎的資料報告與追蹤系統。1999 年成立一個可搜索且具註釋書目之語言及文化資料庫。2001 年底建立最先進的線上外語學習與維持系統 LangNet。

其次，爲解決翻譯人員在美國衛生保健領域、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極度不足，2004 年起，NFLC 開始相關外語發展計劃。因此，2005 年 LangSource Expansion 即藉由擴大現有的語言學習教材資料庫，幫助教師將有用、準確並且適當發展的資源，用於文化教學方面，教授 K-12 的學生。2006 年發展 LangNet，對象爲學習漢語的 K-12 學生。2007 年啓動 STARTALK 方案，以提高學生學習阿拉伯語和中文的人數，並提供阿拉伯語教師和漢語教師專業發展的機會。2008 年 STARTALK 持續資助暑期課程，並加入北印度語、波斯語和烏都語等外語。

(二) 重點成果

NFLC 於拓展外語能力上具以下四個重點成果。一) 針對超過 50 種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語言上，開發數千個小時的線上學習教材；二) 透過 STARTALK 計劃，推動與國家經貿發展有關的外語教學，自 2007 年以來，提供專業培訓及暑期學習給 40 多個國家的師生；三) 持續倡導文化傳承母語教育政策，在少數民族語言方面，自 1998 年起，結合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CAL)著手進行相關計劃，幫助美國的教育系統辨識和發展文化傳承母語資源，使其公民精通英語和其他語言；四) 提供援助給美國小學到高中之學校、學區及教育部門，自 2007 年以來，多經由 STARTALK 計劃執行，並效法語言教育蓬勃發展的國家，推動與 K-12 外語課程有關的政策。

(三) 主要計劃內容

NFLC 推動外語教育主要計劃爲六面向：發展多國語言測驗內容(Assessment Objects)，推動基礎的翻譯課程(Fundamentals of Translation)，建立段落聽讀評分機制(Introduction to Passage Rating)，發展多國語言運用能力(LangNet/ALL Language Objects)，開發數位外語學習教材(E-learning Materials)，及開設暑期學生及專業師資之密集學習課程(STARTALK)。

首先是發展多國語言測驗內容(Assessment Objects)，旨在幫助美國官方語言學家及其他相關人士來準備一般性的語言能力考試，特別是戰略語言中之第五代國防語言能力測試 Defen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s，它的目的是幫助學習者認識測驗題型及相關規定，並使學習者具體地了解在進行 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ILR)時，可預期到的文字及任務難度。目前爲止，在 29 種語言裡，已發展超過 900 個 Assessment Objects。

其次是推動基礎的翻譯課程(Fundamentals of Translation)課程主要目標在互動虛擬學習環境中介紹翻譯的基本原則，幫助政府的翻譯人員更有知識和系統地來處理工作，從而提高他們的翻譯成果。

第三項重點爲建立段落聽讀評分機制(Introduction to Passage Rating)，根據 ILR 建立的標準，提供超過 20 小時的遠距學習課程，闡述閱讀和聽力段落的評分方法。

第四項重點爲發展多國語言運用能力(LangNet/ALL Language Objects)，旨在幫助學習者提高語言運用能力，每個 Language Object 配合教學要素，由一個真實的閱讀或聽力段落，伴隨著輔助材料，如翻譯、聲音旁白或逐字稿、詞彙表、文化注釋所組成。迄今爲止，NFLC 已於 40 種語言上，發展了超過 7,400 個 Language Objects (LOs)。

第五項重點開發數位外語學習教材(E-learning Materials)，目前總計三個線上學習課程(Read Arabic!Read Chinese!Recognizing Dialects: Arabic)，提供 e-learning 閱讀課程給初級和美國中學生學習阿拉伯語

及漢語，這些電子教材透過一系列精心處理且有用的練習結合當代的主題，如地理歷史、生活和環境、家庭和朋友、藝術、音樂及文化，提供學習者練習基本閱讀理解，並提供文化背景說明。這些教材可用在個人學習或由教師指定，線上回饋設計增强師生互動，學生受益良多。

最後一項重點爲開設暑期學生及專業師資之密集學習課程 STARTALK 計劃，主要透過暑期課程提供學習給 K-16 學生和教師專業發展。計劃將持續到 2013 年，目標是在 50 個州建立課程。迄今，超過 5000 名學生和超過 1500 名教師參與，促進外語教育和教師專業發展之創意和經驗值，並呈現最佳例子以爲借鏡。目前，課程正在實施的有阿拉伯語、華語、Dari 達裡語、北印度文、波斯語、俄語、Swahili 斯瓦希里語、土耳其語和 Urdu 烏爾都語 (NFLC, 2011)。

三、國家外語資源中心(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NFLRC)

爲了推動美國外語教育研究計畫，1990 年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成立國家外語資源中心(NFLRC)，迄今，同性質的外語資源中心數量已有十四個。該中心之研究計畫目標涵蓋以下五項： 一) 外語教學與學習策略；二) 外語能力之測驗與評量；三) 外語教材發展；四) 外語教師之專業發展與培訓；五) 外語研究成果、教材、測驗工具推廣與分享。

(一) 主要作法

NFLRC 進行的研究計劃主要集中在較少教授的東亞、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語言。自 1993 年起迄今已進行 44 個計劃，各計劃皆含以下作法：一) 根據國家需要和資源，選擇一個或多個較少教授的語言作爲示範語言；二) 納入先進的教育技術；三) 整合研究、教材開發方案與師資培訓；四) 宣導研究成果、教材、考試；五) 置入評估要素；六) 充分利用所有計劃，建立與各機構的方案和全國協會的聯繫，以確保最大效益。

(二) 重點成果

主要成果含以下五點：推廣外語證照課程，提供外語師資的專業發展課程，主辦國際語用學與語言學習研討會並發表相關研究論文，發行三本科技及語言教育有關議題的期刊，大規模舉辦國際研討會、研習、專題討論、論壇、工作坊等。

首先建置，線上漢語、日語、韓語證照課程(Online Certificate Courses in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學生、公務和文職人員得從線上取得證照。University of Hawaii 提供美軍高階且密集的漢語課程，並推動最常用之亞洲語言日語，目前日語、漢語證照計畫已完成目標。

其次，自 1991 年以來，提供師資培訓和專業發展給 K-16 語言教育工作者，且於 2010 年到 2014 年間，規劃的主題涵蓋網路學習社區(Online Learning Communities)、外語學習成果評估(Assessing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Outcomes)、社區大學外語(Foreign Languages at Communities Colleges)、評估外語教育(Evalu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而參加者爲來自東南亞，太平洋群島和東亞的語言教育人員。主題中的網路學習社區，開發極具特色之線上語言咖啡廳 online language café，提供討論平台作爲社交活動、語言學習及跨文化交流，進而把這些虛擬社區的實踐與探究式的學習，整合爲傳統面對面的教學。

第三項成果是在 2002 到 2006 年間進行的第二語言習得相關的研究計畫中，將會話分析用在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SLA)研究上，包括主辦國際語用學與語言學習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nd Language Learning(IPLL)會議、出版 2005 年 IPLL 的會議論文集和 2007 年的會議論文集、啓動 Pragmatics & Interaction 的專題論文研究。

第四項成果爲發行三本科技及語言教育有關議題的線上期刊，如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LL&T)偏重於語言教學與科技之領域，而 Language Documentation & Conservation(LD&C)則主要發表與語言保存有關的論文題目，同時也包含書評、硬體和軟體的評論及該領域的紀錄。第三本獻上期刊 Read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則探討外

國語言的閱讀及讀寫能力之議題。

最後一項重大成果則是舉辦大規模的國際研討會、研習、專題討論、論壇、或工作坊等等，讓外語教育工作者齊聚一堂並共享資源，進而獲得相關領域發展的實踐經驗。例如在 2011 年 7 月，NFLRC 結合 STARTALK 計劃，舉辦 Chinese Language Camp & Chinese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e，邀請 24 位學習中文不超過一年經驗的中學學生參加為期三週並提供住宿的營隊,同時有 15 位對觀察及教學感興趣的中文教師(無論有無經驗)，觀察和參與所有活動及各種教學方法 (NFLRC, 2011)。

四、國家中小學外語資源中心(National K-12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National K-12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是由 Iowa State University、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CAL) 及全國各地的外語教育工作者於 1994 年九月在 Iowa State University 成立，主要目標在建立小學和中學穩固基礎，以提高國家的外語教學。其工作重點在於各級學校(包含中小學至大學)及教師、政府部門、外語資源中心之合作方案，外語相關部門機構主管及外語研究人才之專業發展與語言課程管理，外語研究之推廣，如成果評鑑、教學法、科技整合，以提昇學生及在職教師學習成效，外語研究成果與資源之推廣與分享。但該中心卻在 2010 年 8 月，由於缺乏資金而被迫關閉。

(一) 主要作法

National K-12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特別將重點放在透過 K-12 外語教師的專業發展，來改善幼稚園到十二年級(K-12)的外語教育。其主要作法有四個：一) 整合外語教師、組織、大學、語言資源中心、國家資源中心之間的合作、宣導 K-12 外語政策；二) 透過專業培訓和發展，提出語言的知識和技能，建立領導能力及專業合作關係；三) 研究創新的教學方法及先進的教學科技，提高 K-12 的語言學習成效；四) 發展和宣導教學資源。

(二) 重點成果

National K-12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分別於 2002 年到 2006 年及 2006 年到 2010 年兩階段有兩項重要成果。首先是在 2002 年到 2006 年的計劃中，發展成果評估、有效的教學策略、外語課堂中的新科技。實際作法爲建立小學西班牙語聽力和閱讀評估及測試項目、更新 K-12 外語評估的線上指南、制定 CAL K-8 語言評估的培訓手冊。特別是在成果評估方面，目的是提高 K-12 外語教師評估學生的能力，進而使評估的實際面與外語標準一致。相關活動包含針對學生的漢語口說流利能力評核 Student Oral Proficiency Assessment(SOPA)、提供師資培訓、宣導線上外語評估資源指南、開發 Early Language Learning Oral Proficiency Assessment (ELLOPA)和學生自評、從事遠距學習科技之兒童外語研究。其次，在 2006 年到 2010 年間的計劃中提出兩個重點，一是漢語 K-5 的課程發展(Chinese K-5 Curriculum and Program Development)，藉由建立一個長順序的銜接模式，來改善漢語教學。其二是透過網站平台(Ñandutí)和電子郵件群發系統(Ñandu)持續提供兩個初期外語學習資源，目的爲利用科技的整合，提供活躍的討論平台給外語教師，以提昇在職教師專業發展(NK-12FLRC, 2011)。

第四節　英語爲國際語言及英語爲共通語言的衝擊

根據英國語言學家 Crystal(1997)的估算，全球以英語爲母語或接近母語程度(native or native like)的人數約有六億七千萬人，而具備合理英語能力(reasonable competence)的人數則高達十八億人，且以「英語爲外語」的人數已遠勝於以「英語爲母語」的人數，且非以英語爲母語人士數量約爲以英語爲母語人士的三倍。而根據英國文化協會的報告，未來十年內全球人口數的一半約三十億人將能使用英語。以目前英語在全球使用的趨勢來看，非以英語爲母語人士彼此用 EIL 溝通的頻率實際上是遠超過與以英語爲母語人士互動的頻率，可見已成爲全球趨勢的 EIL 意涵需更進一步釐清。

隨著全球化浪潮，英語成爲一種國際語(EIL,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已是必然之趨勢。根據 Crystal (2005) 的 English Next 一書提到，非以英語爲母語人士(non-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彼此用「英語爲國際溝通語言」的頻率已遠超過與以英語爲母語人士(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面對全球使用 EIL 的重要性將與日俱增，因此有必要對其意涵和教學觀加以釐清。EIL 的教學觀點提供全球性英語本土化的理論基礎，希望非以英語爲母語者跳脫西方主流文化的宰制，既能夠使用英語做爲國際溝通語言，而達到跨文化溝通的目的，同時亦能兼顧自己在地文化使用英語的特色。而 EIL 所牽涉到的議題甚廣，例如英語的所有權、英語相互理解(mutual intelligibility) 的建立、文化認同，以及適於當地文化環境的英語教法教材。

全球化的趨勢中，無論科技發展、經濟交流、和文化互動都能增進英語做爲國際語言的傳播力量，作爲增進全球各經濟和政治實體間的互動，隨著全球化浪潮，英語已然成爲一種國際語(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而英語做爲國際語是指在世界不同地域和不同情境中使用各種英語體例，包括地域語用、情境語用、功能語用、及社會語用等不同的語言使用層次。雖台灣英語教育的主流語用是以美式英語爲主，但在社會語言學觀點上，偏重美式英語的語用層次表示美式英語的政經、學術或政治權力都居於領先地位，因而在傳播範影響力擁有絕對的優勢或英語霸權的現象。

學者對英語爲國際語曾提出定義:「使用英語作爲國際溝通語言的場合並不必然是以英語爲母語人士所說的英語爲基礎，如所謂的美式或英式英語，而是依據說話者的母語和使用英語的目的而定」(Richards、Platt & Platt, 1992)。此定義強調 EIL 指的是 non-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所用的英語，藉以溝通的對象可能是其他以英語爲母語或非以英語爲母語人士溝通。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曾進一步闡釋英語作爲國際語與文化的關係(Smith,1976; McKay, 2002)。首先，英語爲國際語的學習者並不需內化(internalize)以英語爲母語國家的文化標準。其次，英語爲國際語的擁有權應該「去國家化」(de-nationalized)，亦即不應該屬於任何國家。最後，英語爲國際語的主要教學目標是讓

英語學習者能溝通個人想法及文化內涵。

因此，根據上述的 EIL 原則或觀點，英語教材教法和文化意涵應該依據各種學習情境因素，包括各國語言政策、教育資源、文化觀點、教學目標、師生背景等來作進行微調與適應當地文化。因此，Crystal(2010)在一篇 New Englishes: going local in Brazil 文章中提出「全球化英語的趨勢下，反而讓英語更具在地化的語言特色」的論點。另一方面，而在 EIL 的趨勢下，McKay(2002)提出隨著 EIL 的普遍使用，在語言教育上更應強調不同英語的溝通策略，包括如何釐清語言使用功能、如何建立和諧關係、及減低文化衝突。而這一觀點亦成爲 EIL 的教學目標及教學觀。McKay(2002)強調 EIL 教學觀的三個預設立場。首先，英語使用者必須體認到多語言社群中英語使用的多樣化，每個人使用英語有其特定目的，可能是全球性的溝通交流，也有可能是在地化的對話理解。其次，英語學習者不需要將英語學到所謂的「幾乎與母語相近」的英語能力，因爲多數的英語使用可能僅限於某特定領域 (domains)，如工作場所或學術領域交流，並無必要學習到英語所有語域的用法 (registers)。而且英語學習者亦可能有語言認同或語言態度的議題，而不見得樂於將英語說得和英美母語者極爲相似。最後，英語所有語體應該都是平等的，且都能達到溝通目的，因此需要相互的尊重，不需要強調某一特定語體的高人一等。

從上述強調的 EIL 三個觀點，EIL 的外語政策及外語教學政策應該鼓勵本英語教學的在地化及主控權，且以英語母語者當之教材當作學習教材並非必要的。亦即，應強調使用英語爲國際語的功能，以進行國際溝通互動、表達自己的思維或情感，且在學習多樣化的語言文化之同時，亦能保有獨有的語言文化特色。

第五節　各國外語政策推動經驗總結

綜合上述世界各國推動外語政策的目標及其作法，與我國目前相關外語政策作法比較，如表所示：

表 3-4：各國外語政策推動比較

	各國作法	我國
美國	美國推動的外語政策與作法歸屬於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共分四大主軸： **1.國家語言諮詢會** National Council of State Supervisors for Languages (NCSSFL) 聯繫與督導各州外語政策的執行 **2.國家外語中心**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NFLC) 推動國家級的外語教育政策及計劃，協調中央及地方層級政策制訂與推動 **3.國家外語資源中心**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NFLRC)	我國目前主由行政院召集相關小組，主題式推動相關外語能力提昇計畫，尚無成立業務專責單位，以進行相關政策之推動。 行政院研考會推動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雙語標示建置補助等，然需以長期有連貫性的政策推動及各地方政府間進行橫向協調與整合。 教育部補助外籍教師引進，或曾補助各大學提昇國際競爭力等計畫，然在各縣市推動重點與作法不盡相同，缺乏具外語政策之核心理念與價值，導致各縣市自行其是，而過去幾年各大學亦僅在爲教育部統計外語成效數據，僅於 2010 暑期協助開設成效

	推動外語教育研究計畫 **4.國家中小學外語資源中心** National K-12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推動美國 K-12 外語教育，及各級學校外語資源中心之合作	導向的密集英語課程。 在國家教育研究院下，推動國中小英語資源整合及深耕計畫培訓各縣市的國教輔導團。
日本	日本外語政策目標明確，以「English Only」爲主，「外語」等於「英語」之外語政策，由文部科學省中央審議會提出「提昇英語作爲國際語能力之五大提議及具體措施」	我國過往由行政院研考會推動「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計畫」、「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等計畫，然計畫性質主以短期執行爲主，尚無長期推動之指標及具體措施。
新加坡	新加坡採多雙語政策，主要以英語爲第一語言，而這幾年則致力於培養華語能力爲重點。 以政府力量支持下，在教育部成立國家級的語言教學中心(MOELC)，且核心價值明確化。	我國目前以英語爲九年一貫課程之一，第二外語課程於高中則多被視爲選修課程，各校作法不同，且各校以不同標準及作法開設相關課程。 而去年開始補助大學暑期密集課程，亦以教學資源中心之計畫補助方式進行，並未列入長期體制內之規劃。
英國	英國教育部出版 Languages for All 以勾勒國家外語政策之主張，提倡外語教育之	我國尚未明定外語政策之核心價值及相關重點外語指標。

	核心價值、重點目標、及明定共通之語言指標	
澳洲	澳洲參議院提出國家語言政策原則四大原則： 1. 提倡英語溝通能力 2. 保存並發展外語 3. 提供外語學習相關機制與服務 4. 推動學習第二語言之機會	我國尚未在此一位階上明定全國性的外語政策原則或核心價值
歐盟	歐洲委員會統籌歐洲地區語文教育政策之方針，包含五面向： 1. 多語文化(Plurilingualism) 2. 語言多樣性(Linguistic Diversity) 3. 相互理解(Mutual Understanding) 4. 公民素養(Democratic Citizenship) 5. 社會凝聚力(Social Cohesion)	我國尚未明定外語政策發展方針

資料來源：戴浩一、林麗菊彙編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我國推動外語政策之核心價值與政策主張

因應今日國際化激烈競爭的環境需求，我國國家外語政策應有之核心價值與政策主張。這個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可以長遠的影響到我國未來整體政策的擬定與施行。政治大學陳超明教授曾於一場該校舉辦的「國家外語政策座談會暨記者會」提出他所主張的國家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

> 國家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在「如何推動外語(英文)為未來國民的基本能力」，具體落實在以下兩個面向的檢視：（一）培養跨語言與跨文化的能力：美國研究報告顯示未來高等教育應培養跨語言與跨文化能力，該能力必須包含以下兩種內涵：1)必須具有反省本土文化與語言的機制，2)透過學習外語的過程可使創造泉源變得更加豐富，文化活力也變得更為活躍；(二）培養外語的文化觀： 外語不只是一種溝通工具，更是一種文化的表徵及思維的方法，在外語的文化觀背後所產生的現象更是應該去掌握的關鍵。(2008)

陳超明教授提出此一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強調「語言不僅是語言能力」，而語言能力的內涵才是我們應該強調的核心。因此，在此次座談會中，同樣的觀點也不斷經由不同的角度來強調。多位教授都同時提及一個重要的觀點：營造使用情境。無論如何，在政策上，必須更積極的去製造一個能充分使用外語的機會。首先是清華大學曹逢甫教授強調的外語情境的應用。如清大曹逢甫教授所主張：

> 最重要的是要營造使用英語的環境，我想關於任何語言，唯一的真理是，語言一定要用才會存在，不用就不會存在，你沒有讓他有使用的環境，他就不會繼續發展下去。一個語言

> 一定要讓他有使用的環境，他才會能夠繼續在這個地方發展下去，沒有使用的環境大概都很難，完全靠學校裡頭學的，那是很有限的。即使像現在我們這樣子教英語，就詞彙量的話，國中念到畢業的話可以學到一千兩百個字，到了高中一課五十個生字，一年能夠教多少？三十課，一千五百個生字，三年，四千五百個生字，一千兩百個加上四千五百個生字，也不過五千多個生字，如果真的是把在學校裡頭教這些東西，教的每個字都學得很好，那也不過是五千多個生字而已，五千多個生字如何拿來看大學的教科書？大學的教科書，我的估計大概是一萬五到兩萬的字彙，當然不見得要每個字都懂才能閱讀。根據專家的研究，一個字到學會為止至少要有 sixteen 左右的 exposures，要讓一個人能夠使用十六次以上，他才有希望能夠把這個字學會，能夠拿來運用，所以無論如何一定要設法去製造環境，讓他能夠去充分的使用這個語言。

其次，在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上，專家學者亦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不應是齊頭的外語教育政策。一個國家的外語政策制訂必須考慮兩大面向，其一是攸關國家競爭力的專業外語人才的菁英養成教育，另一個是一般的外語能力素養，而這兩種外語教育應在考量國家發展的前提或政策發展的重點下，達到一個平衡點。如曹逢甫教授提出如下的觀點：

> 語言教育本身應該區分兩個，**一個是你把語言當作普羅教育，還是當作一個精英的教育，我想我國現在面臨的問題，很重要的考量是說如果你現在是需要頂尖人才的話，像我們現在這種設計是很難達成的。**我們現在編教科書完全根據教育部制訂的課綱。我們訂課綱的精神完全是一種齊頭式平等的訂法，以這種精神編出來的教科書是沒辦法訓練出頂尖人才的。因為光拿詞彙量來講頂尖人才所要求的量恐怕要比別人大到兩三倍以上，因此，**我會覺得我們總該想一個辦法，**

> **讓普羅教育跟精英教育在外語教育裡頭能夠取得某一種平衡，讓他兩個都能夠並行，要不然你不太可能訓練出頂尖人才的**。即使在香港，不懂英文的。新加坡的這種情況，你也不太可能說全民都要提升他們的英語能力到一定的程度，一般的只會說兩句英文或者只會 Singlish 的人也很多，但是當然在整個講起來他們的英文能力比我們高，尤其是在比較高程度的英文表現上是比我國好。

而關於外語政策的第三個觀點，則與華語定位有關。此一觀點與前述陳超明教授所提的「必須具有反省本土文化與語言的機制」核心價值相呼應。專家學者提出外語政策制訂的同時必需兼顧到吸引國際人士到我國交流的議題。就我國政策面而言，學習外語不僅是走出去或迅速地獲得新知，更是具有吸引國際人士來瞭解具有本國特色的社會與文化現象。而這樣的外語功能時常被忽視。因此，華語定位與政策必須在制訂外語政策時同時考慮，才能增加我國雙向文化交流的優勢。曹逢甫教授強調以下觀點：

> 外國人到台灣來，或者說他跟你要進行國際交流的時候，他最感興趣的是什麼？我們學英語，大家共同的寄予厚望的就是希望我們能夠得到，比如說最新的科技的方面的資訊，得到一些重要的 information，或者是得到這種知識，語言可以去獲取最新的 information。可是從他們的角度來講，他們**想要知道的多半都是關於我們的此地的文化的一些東西、這裡的社會現象跟文化的了解**，所以我們的學生學外語自然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有能力把我們自己的東西介紹給外國人，我想這是我們經常忽略的一點。換句話說，我們其實在努力教英語發展國際化的同時也要發展我們自己本地的文化，還有像**華語教學等等的領域，才能夠吸引外國的學生到我們這裡來，雙向的交流才有可能**。

靜宜大學外語學院曾守得院長對我國的外語政策提出兩個重要建

言，他認爲好的外語政策必須具備兩項條件：一是具有學理根據，二是能更兼容並蓄、且多元化。這個觀點與黃美金教授提及的「走出去、走進來」外語政策核心價值主張極爲相似。曾守得院長強調「外語政策必須面對學理議題，例如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且外語政策亦需面對「本國語言政策的定位」議題。曾院長主張必須能在反省本土文化與語言的前提之下，我國外語政策才能落實與推動：

> 思考外語教學政策及外語政策幾個議題，馬上就想到了學理的根據，**如果要設立一個外語政策， 沒有學理根據馬上就會被攻擊，而學理一定要先講到語言的規劃，**language planning，**提及** language planning **就一定要提到** language policies，**而這個** policies **馬上就會牽涉到我們台灣的語言政策，所以我們要談這個外語政策， 沒有談到本國的語言政策，** 這是絕對逃避不了的。

因此，曾守得院長建議從施政現實面的多元語言兼顧與外語教育政策一併考量。例如外語政策的目的爲何？是對外的經濟外交面抑或是對內的內政及教育功能面比較多？而且外語政策需要與外語教育政策緊緊扣住，在考慮外語政策的同時，不可忽略外語教育的政策。

> **外語政策需學理上著手，語言規劃的時候要注意哪些東西？本國語言？外國語言？這個是第一個要考量的，其次外國語言是哪一些為主要語言？ 哪一些是次要語言？ 哪一些是屬於政治外交要用的？ 哪一些是屬於經濟、文化、教育方面要用的？ 哪一些是屬於我們的內政要用的？外語政策一決定馬上就是教育政策，我們的外語教育政策要怎麼做？**

也因此他主張在我國的國際環境現況下，外語政策的定位不單是英語這個領域的議題，考量上更需涵蓋與全球化趨勢相關的主要語言，及台灣本身在亞洲地理位置上所需考慮的東南亞及東北亞語系，甚至非洲語系。

> 外語政策最主要是，制訂外語政策可能不是英語領域的事情而已，當然更多的外語的人才必須介入，日語的人才進來，還要有歐語的人才進來，因為這個外語政策， 大概是歐洲語言，大概有德語、法語、西班牙語，這個是最重要的三種語言。亞洲裡面有東亞、有北亞、有東南亞，這些都比較minor，但是也是一樣，可能我們要討論到這個政策，外語政策也會談到亞洲語言，非洲的語言我們也要討論。

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陳國榮主任亦提及類似的觀點，認為外語政策本身必須是清楚明確的，而且考慮多元外語的政策，以符合每個國民的學習需求及台灣本身的發展：

> 如果我們在談語言政策，到底是要獨尊英語，還是要所有的語言都能夠納入，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考量。到底我們的外語政策是只要強調一個語言呢？還是要多語？如果是多國語言的外語政策，那為什麼學生一定要學英語呢？為什麼像大學現在一定要英檢要通過？我喜歡學日語，我就只會日語不就很好？我喜歡德語，我就學德語不就好？為什麼大家一定要以共通的標準來學某一種特定的語言？整個語言政策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到底我們政策是要只是聽說讀寫還是個深度的語言學習，還是第二官方語言。像其他教授提到香港較為失敗的例子，或是新加坡可能比較好的例子，可是這些政策是否適合台灣的發展，雖然我自己本身教英語。我還是有點覺得疑惑而持較保留的態度。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王儀君教授亦提出同樣的觀點，他主張我國考慮到外語政策時，其核心價值是多元與包容的，且我國外語政策制訂的同時，必須參考以下國家的許多外語政策內涵或推動結果。他提出以下各國的例子。例如香港的語言政策是兼容並蓄的「兩文三語」制度，而新加坡則是多元語言的政策(英語、華語、馬來語、坦米爾語等)，而韓國在外語政策上則特別重視英文，因此，外語能力訓練開銷

佔韓國家庭平均花費的百分之三十。而在歐盟各國多數採取母語、外加兩種外國語的政策：

> **事實上目前世界上先進國家都提倡多元，使用單獨一種語言的已相當少。國際現實上，外語政策的推動可以促進經貿與政治外交的發展，然另一方面，外語能力和職業需求量有關。除落實外語的專業訓練外，可朝向外語活化的方向。台灣應先思考幾個前題：台灣立國的經濟產業為何？未來需要多少科技及經貿人材，多少語言人材？是否將英文能力視為民眾的一般素養，各級學校學生的基本能力？因為不同答案會有不同結果。**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衛友賢十分肯定台灣大整體環境對在外語政策所展現的核心價值，也認爲整體環境對語言教學具有正面的影響：

> 台灣整個生態已經非常健康，大家不會懷疑這個價值，在美國你要說服人家學外語是值得投入的一件事情，**台灣就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一個共同價值觀，我們覺得應該好好珍惜這個生態，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覺得是對語言教學這方面，這個基礎是很好，雖然我們很關心效果，可是這是非常難得的。**

在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下，衛友賢教授亦提出外語政策核心價值其中之一是將外語能力視語言爲專業學習之基礎。他提出該校微積分課程的分析結果，顯示英文是大學生專業科目的學習成就指標。因此，衛友賢教授提出「外語能力應視爲高等教育的專業領域學習根基」這樣一個論點：

> 中央大學的數學系一位教授分析理工學生需要修習的微積分課程，分析何種的因素影響他們大一的微積分的成績，所有想的到的什麼因素都算進去、作統計，比如說，考慮入學的

> 聯考，指考的成績，一科的成績，其他等等因素都算入分析。結果發現，**決定學生的微積分的大一的成績最強的是他入學的數學成績嗎？不是，英文成績，英文成績比數學成績的 correlation 還強。**

同時，衛友賢教授亦強調對大學生的學習而言，外語能力是他們吸收新知的窗口，更是一種長期的學習投資。他建議在高等教育投資的外文學習機會，未來的獲益回收絕對不僅僅是外文而已，應該還有更多：

> 學外文不是為了外文能力而已，是吸收非常多知識的門檻，沒有這個，**真的是把很多知識或是學習的機會的窗戶關起來了，這個可投資的、該投資的地方，是一個 internal investment。這個 internal investment 不只是他的外文能力而已**。那我們也觀察到這些學生，如果我們說高等教育，比如說在大學， 能像文藻那麼典範或是政治大學那麼投入，這個 payback 也是絕對的。

提到我國傳統上過度依賴大學專業分類來規劃學生的生涯路徑。衛友賢教授提出不同的價值觀，認為外語應該是一個重要且值得投資的基礎。從好的外語基礎開始，很多生涯路徑可以規劃或培養。而這個價值觀正也是在外語政策核心價值上應該加以突破的，他舉出一個例子：

> 美國的文學院的畢業生是財經的公司來找，因為你的背景是歷史、語言甚麼的，因為他們可以用半年教你財經，可是你的**語言或者是溝通能力，卻沒有辦法短期學會**，所以在**外語能力或人文素養外，他們另外教其他的專業，是比較划算**，我覺得這個觀點，可能台灣是比較傳統，你念什麼應該是走那條路。可是如果四年大學是一個準備期，文學院的訓練是準備為了 anything, get ready for anything。可能加兩年、

> 三年就可以變得專業。所以我覺得這個**語言或是人文本身，或是語言是一個基礎**，打好了以後，讓我們的學生的土非常肥沃，那你種什麼都會長得非常好，不是一直擺花盆，**是把那個土弄得非常肥沃，然後種什麼，是從語言的基礎來開始，很多路可以走。**

而衛友賢教授從一位國際人士的觀點，經歷「從外到內」、然後再「從內到外」、再經歷「從外看到內」的跨國經驗，他提出一項值得深思的外語政策核心價值，他認為只有讓我國學生走出至國際互動場合，才能有機會反思本身的文化意涵，而這也是外語政策該有的核心主張。

> 以前我曾訪問一些學生要出國，考他們的英文夠不夠出國，可是我們會問的是：**你有十分鐘或是你有一天可以帶一個來台灣的，看什麼？是什麼？這是他們問到最難回答的問題。**因為他們英文非常好，可是他們有的是英文很有利、可是卻不會開口談這些問題。說這方面的話，所以我覺得我們學生還沒有一個對比，如果他出去，我說**從台灣出去最大的價值不是看國外，而是發現國內的存在**。

曾擔任過國立嘉義大學外語系主任及該校語言中心主任、現任教於南台大學的沈添鉦教授由他擔任過小學教師培訓工作、及在大學成立外語系與語言中心的觀點談起，他認為我國外語政策比較缺乏的是使用外語的情境、以及政府的外語政策推動缺乏共識的建立，必須要在兩者相輔相成的配合下，才能真正落實外語政策的執行，以收預期之成效。

> 就學習來講，我們社會在語言使用方面，**很缺乏語言使用的這種環境，外語使用在我們環境裡頭去使用，這個是很困難的**。如果說我們政府如果說真是要去提升我們整個全國這種國民的英文或外語方面的素養，應該就要創造這樣的環境。

> 這種**環境如果說要由基層去創造的話是很困難的，因為他沒有那個資源，也沒有那種權力。但是如果從高層來開始設計作規劃， 來創造這種環境的話**，我想這語言學習使用， 就是學校的這種學生的語言學習，跟整個社會的這種語言使用能夠接軌，相信這是可以相得益彰，我們整個的外語的水平就是應該是有很大的幫助。我想我們**比較缺乏教育由上而下的這個部分，在這個一個多元的社會裡，很多議題在討論的時候經常到最後可能都沒有一個很清楚的共識，或者說其實有一些共識了， 但是真正要去執行的時候又有很多的問題。**

而對於界定我國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沈添鉦教授提出「語言是資源，而非身份表徵」的外語政策核心價值。他進一步說明如下：

> 當然**語言其實基本上就是一種資源， 把它當作一種資源，而不是一種身分的表徵**，因為如果當一種身分的話，就會討論「你是到底是哪裡人」或「為什麼你要這個母語」，或「 本國語言都還沒有學好」等議題。這樣其實又會再兜一個圈子，但是如果是把**語言是一種資源、它是一種認知的、一種文化，或者說各種比較務實的，就是個人競爭力的提升，外語就是一種資源。**我們能夠從整個國際化的觀點去看，將**英語或是說其他的外語當作一種個人的一種資源的話，其實這是一個值得去追求的國家整體目標。**

而對於外語政策的核心主張，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葉淑華教授認爲外語政策之核心價值與政策主張宜依據時代之變遷作適時之修正，惟修正時不宜躁進應，逐步修正爲宜。應該連同本國語言一起考量，讓本國語與外國語的政策面考量能兼顧平衡。

> 所謂的外語政策不是只有外語， 本國語其實也需一併考量。**在政策的制定過程之中，應該不是只有對內，也要對外，就是說內外都要兼顧，本國語與外國語都要兼顧。外語政策的**

擬定必須同時注重對內與對外、本國語與外國語之平衡。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蔡素娟院長提出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必須從動機釐清發展重點，蔡院長主張這個外語政策議題涉及到三個動機層次：一是菁英外語政策與國民素養的外語政策，其次是鄉土語言教學，第三是我國目前面臨的新住民所引進來的外語政策，因爲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母語教學。

> 有些事情是政府去做，有些事情政府根本不需要做，**政府在推動外語政策時，需要先釐清哪些它需要管的，那些它不要管。若需要的是外交的人才，不需要動用太多的資源，也不需要動到整個教育體制，他也有不一樣的培育方式，因為有特定的目的。而多數時候，學英語都可以有** specific purposes English training。但如果**外語能力是國民的素養，它還有很多的層次，如果是希望它在一般國民的知識上開很多窗，**reading **自然是比較重要的**。而這個層次上，究竟有多少人需要的英文漂亮到什麼程度，需要到外交工作或經濟談判的的高階菁英讀程度的英語能力？其次如果是講到 promote **鄉土語言教學，只要** make point **就足夠了，在歷史某一階段或社會層次，只是用來平衡過去** Mandarin only **的** bias，而這個問題目前已經不太存在。政府需要做的只是去宣導，小孩子會語言愈多愈好，多學母語可以不費吹灰之力，這個觀點學語言認知的專家學者都同意。至於新住民母語所帶進來的母語真的需要大力宣導，讓小學老師、教育者、還有家長知道說這個對小孩是 plus，使增加的資產。這個就是為什麼我提到說先釐清動機很重要，如果政府釐清了之後，就會知道說什麼事情要做，什麼事情不要做。而且不要用力做的事情是怎什麼處理。

成功大學文學院賴俊雄院長則提出以下的論點，來呼應外語議題的複雜性與差異性。建議需從兩方面思考整體外語政策面向：理想性

與現實感。而且在錯綜複雜的現實中，仍需要努力推動外語政策，以朝向更理想的層面。

> 其實這個英語的政策太錯綜複雜了，複雜到不是我們這幾個人真的能處理的。像我們成大就有母語意識很強的，英語政策的推動就會牽涉到種族的問題。因此要**推一個語言政策是很難的，他不僅牽涉到種族問題，還有階級問題、城鄉差距，當然還會牽扯到資源分配如國立大學、私立大學等。由於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太龐大了，甚至還牽扯到政治問題，所以我們無法用語言自身來談自己的政策**，因為他們永遠是跟其他政策連接的。所謂的**政策，一方面要具有理想性，二方面又要有現實感**，所以政策沒有一個是完美的，他們都是要被罵的。但是被罵的中間你要找出一個 necessary evil，還是要推出一個政策。

賴院長亦針對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提出人是「活在語言中」的觀點。首先，賴院長主張外語政策不該掉入工具或技術層面的思維角度，而是以更宏觀的「語言回歸生命」、文化意義及全球價值的思維來定位思考我國的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其次，他建議我國在制訂外語政策時，應該思考的是我國應如何使人民有自己的生存價值。

> 我今天就提出兩個觀點，**一個是 know why 跟 know how，希望對未來政策制定或許有一些幫助。Know why 的部分就是我們為何要有外語政策，比如我們國家為什麼要有外語政策。那第二個 know how 是如何實施這個政策**。事實上承辦單位很用心準備的六個主題，正好讓我們今天能有個共識來討論整個外語政策。在這六個主題中，第一個問題「政策應有核心價值」就是 know why 的問題，而其它全部是 know how 的問題。**know why 的問題我覺得是現在口頭上大家都喊著二十一世紀英語力等於競爭力的口號。競爭力等於生存力，所以我們要生存力就要學英文。這其中的邏輯一直會把所有的英**

> 語政策導向一個技術層面，因而才會造成現在的英語政策的真正問題。我個人倒是覺得政策的核心價值要建構在「語言回歸到生命」的層次。比如說海德格就有一個概念談到語言作為一個存有的屋宇(language is the house of Being)，也就是說語言不僅僅是一個溝通的工具。他是一個存有的屋宇，因為你是活在語言裡的，所以他是一個生命的價值、一個思維的模式、一個文化的底蘊。所以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我國的這個外語政策應該思考的是我們台灣作為一個國家，應如何使我們的人民能在二十一世紀的情境下，有自己的生存的價值。我國應該讓人民如何跟在二十一世紀這個全球化、這麼急速流動的一個文化的產物裡面，建構自己活著的意義是什麼，以及在台灣這個地方你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所以我覺得那個 know why 還是要回歸到一個比較底蘊的東西，而不是談把語言政策當作是一種溝通。我們曾部長曾志朗曾經講過的，語言政策像電腦學習，經常會認為生存力就三個、應戰力就三個：一個就是英語力、一個是電腦(資訊力)、一個是財務力。可是當你把英文放在跟資訊力在一起的時候，他就會變成這個工具了。我覺得那樣的思維是錯誤的。那個思維、核心價值要回到語言如何建構台灣這國家以及在這個土地上的人民，在二十一世紀有自己的價值，這個價值一定是全球的，而不再是島嶼式的。這整個的思維格局，就是所謂的核心價值。

而賴院長更進一步闡述 Know why, know what 及 know how 三種外語政策層次的意義與議題。賴院長堅信這個外語政策議題的重要性，爲了能夠具象化的闡述外語政策，賴院長以專長的文學比喻來說明外語政策的重要性及我國國內現況，而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know why)，如同樹根，我們本身已經具備。而多數人也同意應該學英文、且各自以自己認爲正確的方式在學英文，而擁有許多其他分枝的外語學習，因此，開枝散葉。然而我們缺乏的是能讓大樹成長、有所依靠

的樹幹，亦即外語政策。他認為推動外語政策時，最重要的是一個強而有力、明確可期的主幹。

> **know how 部分真的是太龐大，龐大到不是我們能解決的。由於整個台灣要處理的外語政策在語言上面每每都有衝突，因此我覺得這裡的外語政策這個題目訂的非常好。因為外語政策是中間一個層次，上面有叫做語言政策，即是中華民國的語言政策、中華民國的外語政策，而底下卻有一個中華民國的英語政策。所以我倒是覺得應該要務實。所謂政策必須要有理想性跟務實性，那外語政策的確是應該談，他建立在兩者之間，所以我覺得台灣應該真的要有一個自己的外語政策出來。**我自己是學文學的，現在想到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比喻來談：像是台灣這個島，事實上在語言政策上面是雜草，就是說 know why 跟 know what 是很強的。know why 就是全台灣每一個人，賣菜的、還有八點檔的都知道英文學習很重要，但是沒有人有 know why 的問題。為什麼要學英文，沒有人有這個問題。know what，就變成是各顯神通，就是教育部、或者老師、家長、社會，或者是民間團體，所以那個是一片雜草。可是我們沒有的是那個 know how 的部分，來架構 know why 跟 know what。所以今天的這個會議我覺得非常的重要，若要談，**就得邏輯清晰、那個圖像要很清楚。意思也就是說，要如何把台灣這個島的雜草或灌木，去變成是一個：想像一下成功大學有一個五百萬的大樹，叫做榕樹，我們不缺乏榕樹底下的根，就是 know why，大家都知道學英文很重要，要往上爬，我們也不缺乏那個葉，每個人各自在學英文，我們缺乏的是那個樹幹，那個樹幹是叫外語政策，然後樹幹要分出外語有英語、法語，各種語言，他有枝幹，那枝幹有大、中、小，你還是要區別，因為每一個都有自己的葉子，那我覺得這個部份是台灣最弱的，就是各搞各的，所以英語政策或外語政策現在就是一個很混亂的狀況。**

與賴院長「活在語言中」的比喻觀點，更具體的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可由輔仁大學黃孟蘭院長的建言來呈現。黃孟蘭院長認為外語的學習是無法離開文化的，文化是語言的一部分，在推動外語政策的同時，文化敏感度、跨文化溝通力、禮儀素養與跨領域學習，都應該是競爭優勢的核心能力。

> **至於在跨文化認知方面，我也很認同要重視母文化，我自己現在在我們外語學院，我們很重視的是外語教學和跨文化能力的結合，我們開了「中華文化多語談」院選修課，就是用我們的六種外語來介紹自己的中華文化，為什麼要開設這樣的課程？**我們的交換生從國外回來，我們都有辦一個經驗分享座談會，他們就提到文化震撼，因為學了三年的語言到了法國、德國以後，跟外國人溝通幾分鐘之後，就不知要講什麼，**外國人感興趣的是我們中華文化，但學生的專業詞彙不夠，對自己的母語文化了解的也不夠，所以在溝通時就遇到蠻大的挫折，因此透過這個課程，我們要提升學生的跨文化敏感度，在全球化背景下，我覺得跨文化溝通能力，不管是外交、經貿，任何一個場合他都是可以讓你獲勝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在異我文化差異比較方面。**另外，我覺得人文素養的培育也很重要，我當系主任的時候，我帶我的學生到交換學校去，**我發現在跟法國人溝通的時候，學生基本的禮儀不夠，法國人就因此有點不理人，但我覺得我們學生沒有意識到這方面，我們外語學院現在很重視學生的品德教育，因為它是提升職場競爭力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外語好、有專業，但人文素養不夠，就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另外一個就是在外語專業人才的培育方面，我個人覺得。除了外語，我想大家都認同，外語只是個溝通的工具，我覺得應該還要加一個跨領域的學習。**

輔仁大學黃孟蘭院長亦同意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應該放在跨語言

與跨文化的能力。也提及即使是法國，也能在認同英語爲國際共通溝通語言下，開始正視英語的學習。

> **首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關我國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我個人認為我們應該要培養具跨語言、跨文化認知以及國際公民素養的國際化人才，就跨語言方面來說，我以歐盟為例，大家都知道，以前到法國，英語是行不通的，但現在法國已經意識到英語還是國際最重要的語言，所以現在這個國家很重視英語的學習。**

國立台北大學語言中心劉慶剛主任以「能做」和「不能做」兩部分，提出我國在推動外語政策時強調的核心價值。能做的部分，主要有五項：能增加國民學習或成長力、能增加國民國際觀、能強化國際聯繫與國際競爭力、能促進了解全球思維、及能提昇國民國際人文知識。

> 我覺得在外語政策裡面，**核心價值是一個很不容易訂的東西，因為核心價值本來就不能只從表面化的現象和價值來論定。核心價值還要涵蓋深層的價值層面部分。同時，不管是從縱的角度或從橫的角度來看，核心價值也必須要具備長久性和實質意義**，必須能應用到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這樣的價值才能叫核心價值。在此，不論是在**外語教學政策，或是在外語政策上面，我們或許可以把核心價值整理成為幾個「能做」與「不能做」的部分。**我先講兩個「能做」的部分。第一、這個價值必**須能夠增加一般國民的學習或成長力**。誠如剛才陳主任和王院長提到的「提高國民的素質」。**核心價值決非表面的加強聽、說、讀、寫或只是為了出國旅遊的淺層目的**而已，而**是可以透過外語政策能使國民啟動更深一層的多元學習及成長能力。當然，在執行面上，我們得思考用何種方式來讓此政策發揮功效：要用強迫性的方式？用自主性的方式？用鼓勵性的方式？或是用誘導性的方式？**重點

是：我們在推出這個語言政策的時候，是不是可以提升我們國民的素質還有他的成長力。第二、這個價值必須能增加我們國民的國際觀。增加國際觀是靠透過不同的語言認識不同文化，受到不同文化的薰陶之餘，更進一步的去認識、去關懷國際事務，甚至能主動關懷國際的環境與人民等等。過去大多數人可能是被強迫為考試而讀這些東西，現在因為正確的外語政策，人們變成會主動去關懷國際社會。這是我覺得是讓我們改變人民素質之外的另一個層面。從另一角度觀之，以上兩點跟我們的國際競爭力有密切關係。我們常常在談到國家競爭力的時候，大都著重在國家整體的競爭力、即整體與世界各國國生存角力的競爭力。可是我一直覺得國家的競爭力，決不只是國家上層的政治、經濟、教育或外交的決策即可達成。國際競爭力應該從最底層的個人和地方開始。我覺得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不僅僅止於學習外語是為取得外語能力證照而已。我希望所有學習外語的人，都能透過外語的學習，順便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靈感(inspiration)，甚至可進一步刺激更多的創造力。 如果全國人民能因此而吸收更多元的知識與應用能力，進而提升國家整體的創造力，這才能真正提升國家的國際競爭力。打個比方，芬蘭的一個出版「憤怒鳥」的小公司，最近很夯。我就覺得這個具有非常大的國際競爭力的公司，絕不只是靠英文的聽、說、讀、寫的基本能力而已。這些人一定習慣於善用一定程度的外語能力，了解全世界人民的思維(而不只是本土人民的思維)，其產品才會如此受歡迎。所以我認為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一定不能停在「語言能力的測驗成績」上，而是要顧及全體國民透過外語學習以提升知識吸收、應用能力，多元文化的認知與包容能力，及主動關懷、參與國際社會之各種活動等。國家整體國際競爭力有賴於此。

劉慶剛主任進一步闡述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中「不能做」的部分，

主要包括三大「不能做」的核心價值。首先是不能影響本土語言的核心價值，例如不能過度提早至小學英語教學及不能讓非專業師資教授英語，因爲這是一體兩面的因果關係。如果小學能以正常的語言教學爲主體，而不是不斷將學英語的年紀降低，我國才能真正不影響本土語言的發展。其次，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不能讓語言政策過度簡化，例如不能以測驗主導學習，過度強調英檢，以各式的英檢來主導教學，這會讓整體社會付出更大成本。第三、不能過度強調以爲英外語能力等於國家競爭力。外語能力可能只是國際競爭力其一條件，真正的國家競爭力是來自於國民的本國基礎語言、認知能力、培養主動學習的態度、實事求是的精神、堅忍不拔的毅力、開闊的心胸與永不褪色的好學、求知的習慣等等。只有這些條件才能轉換成影響全球的競爭力與創造力。

> 接下來談兩個「不能做」的部分。**第一、外語政策不能影響到本國主要的語言的發展。**比如說，我不贊成國小一年級就學英文。**Catherine Snow 於 2000 年在台北大學演講時，特別表示一個政府花大把銀子讓國民小學的小朋友提早學習英文是值得深思的。根據她做的研究，小學生提前學習英文，真正進步的只有發音，說起來更像英語母語人士，在閱讀、字彙、寫作上並無顯著進步。**他就直接反問我們一個問題：**我們值不值得花這麼多成本在「提早學習英文」上面？這當然是一個可以重新再思考的議題。**可是現在因為政策多變，幾乎每縣市都搶著一年級開始學習英文，幾乎無人關心上述的問題：**就是提早學習英文是否會影響本國主要語言的發展。**有人可能覺得不會，但依我的觀察，學校只要一年級開始上英文課，家長就讓小朋友在一年級以前開始補習英文。長期以來，**不管相關部會如何宣導，只要能力所及，家長絕不會讓小孩輸在起跑點上。**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國小英語補習班又開始大發利市，**相對的，國語文受到關心的程度，也必然受到影響。**另外還有可怕的現象，就是每一國小都找

不到那麼多英文老師去面對新增的英文課。又剛好碰到少子化現象，**一般學校的解決辦法是讓對英文有興趣的其他專業老師(如數學老師)去參加所謂的「英語 20 學分班」，上完後開始幫忙教英文課。這實在是教育部「勇敢」之舉。**想到我們自己外文系一路讀上來的英文老師，在教英文時還是常常會碰到不是十分有把握的問題，得花相當功夫才能找到解答。**讓這些非英語專業而「臨危授命」承接英文課程，實在是對老師、對學生都不利的權宜措施。第二、我覺得政策不能太簡化。我覺得教育部現在的一些語言政策，有些就是過度簡化。大學設定畢業門檻就是過度簡化之例。**希望看到每個技職院校的學生的英文是否每年進步則是另外一例。所謂過度簡化，是指評鑑團隊無法花很多時間確實瞭解學生在就學期間之多元變化，如從不喜歡英**文變成喜歡，從怕英文變成不怕英文，從不主動碰英文變成主動學英文，從不讀英文資料變成願意從英文文件中直接搜尋資料等。這些都是外語教育最根本的價值，但是因為上述之項目難以用客觀的量化方式呈現，自然難以喚起大家的注意。相反的，「英語能力檢測」能提供明確而看起來可靠的成績，也較容易受到大家的青睞。結果是，所有的語言教育評鑑都以語言能力測驗成績為依歸。大家顯然忘了，老師如果無法奠定上述之外語教育根本價值，考試考得再多，也無法增加或證明學生真正的外語能力。我始終相信任何教育都無法簡化，教育就是要承受麻煩的，而不是閃避麻煩的。今天閃避的麻煩一定會在明天製造更多的麻煩。Education is taking the trouble, not saving the trouble. If we save the trouble today, we will produce more trouble tomorrow.外語政策亦然。如果未來的外語政策只停留在「外語能力檢測」上，那就是過度簡化，不但是對所有英語教學團隊的不相信，同時也讓英語學習者付出更多的社會成本，讓國內、外之英語測驗公司大發其財。最令人難過的是，大家都去考英檢，可是英文好

的永遠是那些懂得主動學英文的一群人。**總之，我們的外語政策絕對不能走這條過度簡化之路：為了執行方便，就一切從簡。我覺得任何一項外語政策，都應該要廣泛、積極地密集討論各層面的問題，等找到一個最好的方法後，先試行一段期間，再研究其立法之必要性與可行性。**千萬不要在像以前凡事貿然立法，立了法以後就似乎再也不能改了。**第三、不能把英文能力或外語能力與國家競爭力視為同一件事。因為外語能力不一定等於國家競爭力。我看過廖咸浩教授曾經寫過菲律賓跟日本的例子，大家都很清楚這個例子是什麼意思。英文在菲律賓幾乎是全國全面化，甚至已經到了自己本土的文化都可能因此而消失的地步。而日本呢，基本上日本人還是非常的堅持他們某些傳統。不少日本人說英文帶有日本口音並不會覺得不妥，他們認為只要英文能溝通，不一定要講的跟美國人一樣，日本口音讓他覺得可以凸顯他是日本人的身份(identification)。雖然日本經濟這幾年不像過去那麼興旺，但仍然是韓國想打倒的對象，對國際經濟仍有一定的影響力。外語可能只是國際競爭力其中的一個充分基礎條件而已，真正的必要條件可能在於培養國民的本國基礎語言、認知能力，培養主動學習的態度，實事求是的精神，堅忍不拔的毅力、開闊的心胸與永不褪色的好學、求知的習慣。惟有這些特質，才能把國民對事物的一絲好奇，轉換成影響世人的創造(如蘋果公司的產品)。總之，外語能力等於國際競爭力是不可仰賴的一種迷思，外語政策絕不可以化成如此簡單的公式。**

劉慶剛主任明確指出，我們必須在外語政策上先明確界定能與不能，才能進一步進行規劃與找到執行方法。亦即目標必須先明確化之後，整體的政策推動由上而下才能具有連貫性與永續化。

我認為上述之幾個「能做」與「不能做」的方向先確立之後，

> **再從政策上面尋求可行的方法與途徑。這樣我們的政策才會有明確的目標。過去的一些政策，要不就是目標搖擺不定，要不就是因為人的改變而產生改變，而甚至讓先前的很多投資付諸東流。若政策一而再，再而三都如此，對全民與國家的傷害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政策理念能否持續推動，由上而下(top-down)的支持與支援力量是絕對不可缺的。**

綜合言之，劉慶剛主任的論點主軸包括：能做包含了增加學習力、增加國際觀、強化競爭力、促進全球思維、及能提昇國際人文知識。而「三不能做」爲的是不影響本土語言的核心價值，不讓語言政策過度簡化，及不過度強調以爲英外語能力等於國家競爭力。

小結

綜合上述專家學者所提出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可以分成以下面向：

一、應釐清我國外語政策制訂的目標、動機、核心價值與前瞻性。

二、應朝營造情境、跨語言、跨文化、跨國的多元宏觀視野思考。

三、應審視我國整體的外交、文化、經濟大環境，以全球化的人才佈局爲前提，考量其他鄰近的亞洲國家，歐洲或甚至非洲的趨勢。

四、應充份平衡專業外語人才之養成教育及一般外語能力素養之培育。

五、應鼓勵本土語言與外國語言政策之共容與平衡發展。

六、避免採取齊頭平等之外語教育政策或過度簡化我國的外語政策。

第二節　我國外語政策推動的專責單位與其定位

上述第二章針對各國的外語政策提出詳細論述，其中以歐盟的外

語政策、美國的外語政策及日韓兩國的外語政策對我國的外語政策制訂及推動具有比較關鍵性的影響。以歐盟的外語政策爲例，歐盟各國基於歐洲各國的整合、文化與族群融合、以及歐盟各國整體競爭力等因素，提出「2＋1」外語政策，亦即要求歐盟各國公民同時學習英語及兩種外語，作爲國家整體發展的政策。而以美國的外語政策爲例，美國政府視外語學習爲一種戰略思維，認爲外語與國家安全問題密切相關，因此明確定出數種戰略外語。至於韓國政府將英文視爲使用語言，其企圖是以推動經濟發展爲目標，成爲亞洲的全球化中心。

此次外語政策的座談會中，多數的學者皆呼籲我國應儘速建立外語政策的專責單位，如國家級的外語學院或中心，以落實外語政策的推動、研究發展、外語專業人才的培育，專業師資的長期培養等等。以下將就這些議題提出專家學者所論述的觀點，試圖探討我國成立外語政策及外語教育學院或中心的定位與可行性。

而根基於第一節提及的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上，外語政策的推動首先需有一個由上而下的專責單位,而這個單位的定位 必須是強而有力的高層單位，才能在成立後規劃、執行我國整體的外語政策。針對這個議題，沈添鉦教授提出：

> 如果說我們純粹只是討論，卻沒有辦法落實、且成立一個比較有強而有力的規劃與執行的這種單位，我想這個一定目的要去達成是真的是比較困難。如果你要**成立一個類似教育研究院或者說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格局，來執行我國外語政策，這位階與它的功能，當然不希望說像教育研究院需要那麼久的時間**。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賴俊雄院長提出「語言與教育是不同的兩件事」的強烈主張。亦說明語言的 output 的條件是環境，必須在整體環境建構的前提下，才能談外語教育的整體推動。賴俊雄院長建議此一專責單位不該在教育部內去解套，而是組織結構議題：

> 如果說要大刀闊斧改革，我覺得教育部做不了那個事情，因為語言真的不是教育的事情，教育是 input，但語言永遠是 output，所以整個環境，也就是那個所謂的 English friendly 的 environment 永遠都是所有語言的先決條件。如果說你沒有環境，只是一味地 input，那只是菁英教育。剛才我們曹老師提到菁英跟普羅大眾教育，像我們現在就用菁英教育的模式在教國小，背單字、背文法，失去了他使用的環境，所以如何借用環境，就要回到剛剛我說的 infrastructure 的問題。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賴俊雄院長對於外語政策的複雜面，建議未來應該以「白皮書」方式提出更具體、明確的規劃外語政策，以整合官方及民間的整體資源。賴院長主張只有正確的外語政策及更高階的外語政策推動專責單位，才能將資源整合，亦才能解決期間複雜的種族、階級等問題，才能達到目標。

> 我們中華民國要端出一個外語政策，唯一的建言就是一個白皮書，那白皮書要有一個單位，來整合官方跟民間所有的語言學習的資源跟現況，去了解，然後去整合，再來就是要去了解全世界，包含歐盟都有語言政策白皮書，人家都有一加一等於二類似的，或二加一等於一個像是自己母語加上英語再加上第二外語的政策。然而我們台灣沒有。這邊要強調的其實是，我們的政策決定我們是否把能量整合。我對台灣的語言現象還是很樂觀，因為從八點檔都有在學英文，計程車司機都知道學英文，所以那個關係是有的、能量是有的，問題就在你這個政府要不要做點事情把他能量整合。要達到這個目標，政府一定要先去學習整個國外的外語政策白皮書，去看人家是怎麼去運作的，因為牽扯太複雜，一定種族問題會牽扯進來，階級的問題也會進來。因為效率跟平等在管理學上是兩端，你要有效率就不可能平等，你要平等就不可能

> **有效率，如何在效率跟平等中找到一個中和點那是一個智慧**，是一個行政團隊的智慧。我覺得我們政府這邊可能真的要有一個大的單位，**絕對不是教育部這個單位，太小了，因為牽扯到語言，牽扯到經濟面，牽扯到媒體，事實上是不是有一個全英文的，真的這一定要有一個很大的單位來去推整個國家級的外語政策，然後定位定好，再來去處理。**

而葉淑華教授亦同意此一觀點，認爲較高層級的跨部會外語政策執行中心有其必要性，且更具體提出此一政策學院或中心成立的「三跨」原則，以及「外語政策的擬定必須同時注重對內與對外、本國語與外國語之平衡」之觀點。，以統籌外語政策擬訂、外語策略執行、外語專業人才培育、與外語研究發展等：

> 外語政策及教育相關中心之成立確實有其必要性，以統籌規劃外語之政策擬定、執行、外語人才的培育、外語研究與發展等。外語政策中心的成立**必須符合三跨:跨部會、跨語言、跨層次。跨部會：彙整各部會之語言需求內涵；跨語言：應顧及各種不同語系；跨層次：小學至大學乃至各部會各職場；語言政策宜兼具上述內涵，且具一貫性及系統性。**

而對於外語政策專責單位的「外語專業人才的培育」業務範疇，南台大學沈添鉦教授建議此一國家級專責單位宜以培養高階外語專才爲主，並能在橫向與直向進行大規模的整合研究，以奠定我國外語政策的堅實基礎：

> **在教育訓練方面，宜以高階外語專業人才訓練為主要任務，並與現有的高等教育及民間外語專業訓練機構進行垂直的分工與整合。在研究發展方面，宜針對國家之外語政策所亟需之學理、論述、資料、國內外之第二語言現況與發展等主題，進行大型之整合型研究，以奠定政策的基礎。**

針對外語權責單位的成立，靜宜大學曾守得院長對於我國過去長期以來外語政策的模糊不清，因此建議此一國家級的外語政策專責單位有迫切性，並強烈提出「該權責單位之位階必須夠高」的呼籲，例如，應與教育部同等高度爲宜，才能讓專責的政策制訂者去長期探討及具體實踐我國的外語政策，並整合其他部會與外語相關決策。以顯現我們對外語政策的重視程度，也因此不會再度重蹈外語政策歷史上「模糊不清」及「權責不足」的錯誤：

> 我們外語政策，**要快一點完成。我希望三、兩年之內這個決策單位就要出現，這個決策最好跟教育部要保持某一種位階上可能要接近或平行，將來外語教育的中心或是外語教育的什麼委員會如果要成立**，也不能差太遠。舉個例子，比如說它放在教育部中教司或是國教司底下，發揮不了作用，幾十年來的政治情況已經告訴我們說，。所以我建議如果要的話它就要高，**這個位階一定要高，在行政院底下，不管是 task force committee ，或者是怎麼樣，反正就是需要這麼一個單位來統管外語政策，從學理上來看那個位階要放在哪裡，這個決策單位一定要有一個主要權責單位，不然沒有 policy，也就沒有 policy making 的人，** 所以這個 policy maker 是誰？我想我們可能要決定一個主管的單位，不管是什麼樣的名稱， 我想我們需要一個這個東西。

而對於成立一專責單位，來推動我國的外語政策，劉慶剛主任提出類似的觀點，他建議宜「審慎、漸進、超脫位階」來處理相關議題，也同意專責單位的成立對外語政策及國家整體發展有其急迫性：

> **我非常同意剛剛所有先進提到的就是最好有一個中心，而且要盡量快，一定要跨部會。這個中心也許是一個臨時性的，就是在非常迫切需要的時機，臨時先用行政院資源，或直接隸屬總統府，所有決策及其推行方案均需跨部會處理，經費亦然。也許經營了一陣子後，會發現該中心其實可以放在行**

> 政院的某一部分、或放在研考會、或放在教育部的某個部門。當然這不能去動到該單位原來的內部結構，因為長期以來大家已經固守本位，所以要增加一個單位、或要某一個單位來增加這項工作，一定會造成很大的衝擊。所以我覺得成立一個中心是重要的，也很急，但一定要很審慎為之：以漸進方式，先從非常超脫的地位，按實際、客觀的需求漸漸回歸常態的編制。

台北大學劉慶剛主任同時建議，而在執行外語政策時，必須同時兼顧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執行策略，才能落實外語政策：

> 辛苦規劃的政策或策略能夠實現，絕對需要由上而下(top-down)的政策支持與由下而上的執行力量。現在我們大學裡常碰到的情形是教育部決定的一個議題，用 top-down 的方式傳達下去之後，接下來所有的人力與花費都要各校之校務基金支付。這個就是等於說命令是 top-down，所有的執行則是 bottom-up。這樣的情形，有些小事作來容易，大事則不易完成。國家的外語政策一定不可如此。由上而下(top-down)的支持與由下而上的支援力量是絕對不可缺的。

南台大學的沈添鉦教授亦提出同樣的觀點，他認爲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外語政策都應該要具備，才能真正落實外語政策的執行，而成效也才能預期：

> 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外語政策這兩項程序應該都是要有的，從政府方面，有這種由上的政策制訂， 有比較強勢的一些規劃跟投入，再配合整個社會、學校、社區來提升我們整個國家或者國民的外語的能力。

而在談到外語政策的向下落實的具體方式，葉淑華教授建議成立一個「全民外語共享平台」，以開放課程模式提供全國免費的學習平

台：

> **宜於外語政策中心平台內建置外語數位教材，或於公視播放各種外語課程，以 OCW(開放課程）模式免費提供全民學習外語平台，全方位提升全民外語之能力。**

而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蔡院長亦建議類似的作法，她建議在我國現在已有完整的課程或校際資源中，透過各校的結盟或資源共享，以整合各大學現有的外語學習資源：

> **我們可以考慮一些 open courseware 的方式，比如說一門課那麼難找到師資支援，但政大卻難得做得到，且可以同時兼顧幾個語言。可是有沒有可能別的學校也有學生想學習，可不可能開一門課或是找到老師，例如政大有願意開出 open course 或者如何參考我國大學內成功的語言中心或外語學院的範例，例如針對不同動機、不同需求、不同程度的學生，規劃比較有彈性的課程與學程。**

對於各大學的開放課程的作法，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衛友賢院長也表示認同，不僅受益的範圍可以更大，亦可讓開課單位受到實質資源之支持或肯定。

> **我們可以考慮一些 open courseware 的方式，比如說一門課那麼難支援，那政大那麼難得做得到幾個語言可以做，可是有沒有可能別的學校也有學生想學習，可是不可能開一門課或是找到老師，可是如果政大願意有另類的方式，讓 open course，那可能會在自己的單位也受到一種肯定。**

政治大學外語學院于乃明院長亦說明該校已有的外語課程資源，並且表示該校所負責的北區外文中心過去所建立的外語平台已開放至全國各大學免費使用，並強調這樣的學習平台是值得政府繼續提供支持，以持續開放課程方式達到全國資源共享：

事實上政大已經開放給全國大專院校，而至今已有一百一十所大學申請我們線上自我學習平台，中央大學是有使用的，使用率達八百四十一次，使用率最高的是台灣大學和政大的公企中心，其次是政大、交通大學和輔仁大學，但是一百一十所學校都已申請，我們是開放的，每一個學校都有一個 password，這樣學生就可以自由上網了，北區大學外文中心是開放給全國大專院校使用的，除了這個之外我們最近投入三年很重要的一個項目是數位教材開發，現在有日文、韓文、越南文、俄文跟土耳其文，今年暑假又增加西班牙文跟阿拉伯文及英文。現在已經開發了十八個單元，預定未來三年要繼續完成五十四個單元，也就是兩年的外語課程，目的是希望讓沒有環境學習外語的人，也可以利用這個平台學習，我們覺得這個部分是很值得繼續做下去的。

而清華大學曹逢甫教授針對外語政策的執行面，提出「成立與全世界對話的電視台」的宏觀及永續化的建議：

建議還是要在財力能夠支付下，應該還是要建立一個全外語的電視台，事實上連 Russia 都已經成立了一個國家英語電視台，以前這個 Russia，是非常不願意教英文的，現在逼於現實也不得不這麼做。日本的 NHK 也已有一個英語頻道，中國大陸也是去年、前年就開始有一個全英語的電視台。所以我覺得另一個部分當然不一定是全英語的，也可以附有一些別的外語，但是最主要的節目還是要回歸到英語的節目。也建議要多出版雙語的雜誌等等。即使說不賺錢，還是應該要做。像這個光華，我就覺得光華產生了不少的效應，我們最近在考慮建立一個中英雙語的語料庫，那其實就光華雜誌來講，已經有人把它納入 corpus 裡了，當然也有人說這個光華的英文不夠地道，但是這已經是我們所能夠取得的最好的資訊了。

如各教授強力建言政府儘速成立的電視台模式,在各國是以World English 電視台成立，且在東北亞國家，如日本、韓國，或歐盟國家，如法國，都已經建置多語的網路共享電視台，這個 World English 電視台的建議，不僅對國際人士是友善的，能引導他們進來且加深他們對本國文化的瞭解，亦能透過當地語言及更多元的語言學習內容，產生認同感。如日本 NHK 電視台的 World English(http://www3.nhk.or.jp/nhkworld/)或韓國的 KGS World English(http://world.kbs.co.kr/english/)都是值得的參考模式。而過去多年，我國亦曾努力過，只是相對於日韓兩國的此兩台英文電視台深度與廣度，中央廣播台(http://english.rti.org.tw/)的新聞雖剛開放英文新聞，多數的新聞仍以本土語言的新聞爲主。另一個差異是，韓日的此一網站包含了以各國語言爲主的韓語或日語的教學資料庫。但對我國以中央廣播台在今年開始跨出的第一步，不僅符合世界化的趨勢，且對我國外語政策的推動更具實質意義的。因此，無論是曹逢甫教授、葉淑華教授或蔡素娟院長的中肯建議，都是具有前瞻性且是務實可行的。文藻外語學院前校長李文瑞校長亦補充說：

> 希望在我們的小組將來的建議事項裡有這樣的一項，就是**我們應該有一個由公共電視系統或由教育部主導的外語電視台，當然在我們無法兼顧到多種外語，但至少有一個全英語的電視台，有電視台就一定可以有全英語廣播電台，透過電視與廣播讓那些沒有辦法上補習班、讓那些有意自修，願意在適應外語的學習環境時，那至少有一個地方是可以來自修的，這一點我在這裡特別慎重提出的呼籲**，在國內有這樣的一個外語電視台，**希望是一個完全中立以教育為目的的電台，也不只是播放外國的影片、外國的新聞而已，而是一個要為我們的國民提升外語能力，宣導各種不同民俗文化的內容等教育性功能的電視台**，這樣才能幫助我們的國民提升英語方面的能力。

而對於成立公共系統的外語電視台，黃美金教授建議亦需增加其在外語教育的功能，且能成爲全民普遍化的管道：

> **建議要有一個全外語的電視台**，並不是要播放外國影片，**而是以外語教學、外語教育為主，如此在正規教育體制外，社會大眾想學英文就多了一個管道。當**然現在已經有好多英語教學廣播節目，但事實上有一個影像看的話，學習者會感到更生動有趣、更想學，所以過去彭蒙惠的空中英語教室，目前也已經在電視台裡面播放。只是電視台裡面播放英語、外語教學節目都是片段而已，**如果今天有這麼一個專門、專屬的外語電視台，而且是以教學為主，在不同的時段播放不同的外語，民眾想學哪一個外語，就可以有這樣的管道去學。所以在正規的教育體制外，在公共傳播媒體裡面有這麼一個管道，其實是可以更有效地幫助大眾學習自己想學的外語。**

另外，在師資培育上，黃美金教授亦提出需更重視專業的英語師資培育及強化國內外語學院對第二外語教學的功能與資源：

> **另外，我這邊要呼應的是師資問題。**我們大家都知道外語師資的問題，長久以來都存在著，特別是英文師資方面。目前英文是從小學就開始學習，第二外語是從高中開始學習，**師資不夠或師資不稱職，都是今天要重視的問題。國內這麼多大學都設有英語相關系所，所以英語師資的培育，可能可以由這些系所再多著力一點。至於第二外語，**就像剛剛李振清老師講的，國內有這麼多好的外語學院，今天這麼多好的外語學院院長也都在現場，有日語、法語等等，也許第二外語師資的培育，就要仰賴這些外語學院協助。**也就是說從正規教育體制下，外語人才的培育，特別是師資這一塊，就應由這些學校學院系所來共同努力。英、外語師資的培育如果能有更周詳的規劃，雖然今日已沒有辦法走回到過去的師範體制，但相關單位能夠對外語師資的培育再更重視一點，可**能

> 就可以協助我們讓小學的英語教育導入正途。更何況現在幼稚園也在推雙語教育。天天都在教孩子用英文表現。這裡我們所關心的仍是這些幼教英語師資的培育，因為孩子越小學習外語，若沒有好的師資帶的話，我想以後要導正可能就更難了。討論這個議題有兩個層面，一個是非正規教育體制下，電視台及廣播電台也許可以協助提供一般民眾學習英、外語的機會，而正規教育體制下，教育部若能夠更重視師資培育的問題，結合各大學相關的系所及學院，也許可以把英、外語師資培育這一部分做得更好。再加上在廣受歡迎的八點檔節目裡面，很自然的帶進外語的使用機會，對觀眾也許也會產生潛移默化之效。近年來政府部門在推動國內英語商圈時
> ，對表現好的單位會給予一些獎勵，教育部在北、中、南區設有教學資源中心，裏面其實就有類似這樣分享的一些平台及機制。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黃孟蘭院長認同英語教育需向下紮根，且以創新教學模式來強化溝通表達的能力。而在師資培育方面，更希望教育部能更重視，提供更多協助給正在起步的高中第二外語教學，以期讓我國的外語教育能更早培育。

> 關於英語能力的整個培育，我個人認為在中學要下向紮根，從小學到中學，我們可以加強英語的培育。因為我們太重視學生的文法是否正確，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學生不敢開口，就像我學生學外語還是一樣，不知道自己講的語言是否正確，覺得文法可能不對，所以在溝通的時候就有太多的猶豫，我覺得這是跟我們傳統的教學法有關，我們可能要改變這樣的學習習慣，老師是不是能夠有一些創新教學法的老師？我們應該朝著溝通式教學法來帶領我們學生，台灣是一個孤島，我們要走出去，我們要跟別人溝通，我覺得在溝通當中，要

> **讓我們學生知道，不管語法講的正不正確，我就是要開口，我想這是現在在中小學的英語教育上，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至於第二外語，我很高興的看到我們教育部的中教司，這兩年來鼓勵外語特色高中的成立，特別是大園國際高中，因為地緣的關係，在桃園國際機場的附近，這所高中跟輔仁大學有很密切的合作，他現在有德語、法語兩個外語，包括數學、音樂、體育，都要用這兩類外語來修課，可見師資是很難培育的。因著我們在第二外語教學上的努力，希望教育部能夠在師資的培育上多一些協助，我想，學生越早學第二外語越好，外語特色高中畢業的學生，將來進入大學，不一定要來外語學院就讀，可以學法律、學管理。外語只是一個技能，進來大學四年，有個外語，再學一個專業，我們要越早培育這樣的人才。**

世新大學李振清教授提及他在新加坡的外語政策執行，是由隸屬南洋理工大學的國家教育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負責，在政府部門的位階高、且有實際權責的國家級單位，新加坡英語力的提升都由這樣一個國家級的單位在負責，且聘請國際知名的語言教學專家 Dr. Jack Richards 長期負責師資、教材、及外語政策執行。

> 我剛好上上禮拜在新加坡參加一項國際會議。**新加坡比我們更保守、但更 powerful，他們有一個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是屬於南洋理工大學底下的一個獨立的，而且國家級的單位，國家級的單位叫 NIE，NIE 負責整個國家教育政策、英語教育政策的執行，而且他們是與早期的 RELC，Regional Language Center，結合在一起。大家都知道 Professor Jack Richards 在那裡，他現在也參與 Cambridge 跟 Oxford press 的英語師資培訓，及教材編撰等工作，並利用 NIE 做 base。新加坡現在的英語能力提升不遺餘力，就是這個地方在執行。**

李振清教授也同意在推動外語政策時，應該同時重視我們的華語文。他以新加坡爲例，新加坡政府幾年前已經開始重視中文能力，強調「中文做爲國際溝通語言」的觀念已逐漸受到肯定。因此，李教授提出「英語能力提升也能重視中文，以吸引更多國際人士到我國學習中文」的呼籲。也認爲這樣對於營造英語使用情境及國際化的推動應更有實質的助力。

> 他們除了提升全新加坡人們的英語能力外，他們現在有一個重點工作，**是國家重點，**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我這次參加的會議廣邀全亞太地區的，就是講到**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目前要提升英語能力，我們必須同時重視中文才對，一定要把中文同時加入，將兩者結合在一起，那尤其**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觀念，政府當局宜加重視。顧及提升英語能力之外，還要鼓勵更多國人到台灣學華語，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對提升英語力與國際化，會更有幫助。

而對於師資培育，李振清教授建議參考新加坡國家提升英語力的做法，初期也許由國家教育研究院提供特別預算處理，以發揮外語政策推動的功能，逐漸成立一個國家級的外語政策推動的專責單位，且應將專業外語師資的培育也爲政策重點，以避免城鄉差距及外語政策的推動窒礙難行。

> 所以我想新加坡的模式我大概很建議政府，假如可能的話，**應該有編列特別的預算，觀摩新加坡提升英語能力的策略。新加坡跟香港在努力的重點工作是老師的培訓。外語政策，假如要成立一個相關的學院或中心，我想將來政府的預算短期內一定不可能支應，所以我建議國家教育研究院應該發揮功能，扮演一個很重要的師資培育與在職訓練的角色。培養優秀的英文老師，最主要在於英文老師，要怎麼樣培養、政策如何配合。師資培育，我覺得應該把單獨師資培育制度重**

> **新建立制度，培養高中、國中，尤其是小學的英文老師。我想這應該是個重點，因為我們現在不可避免的城鄉差距這麼大，政府應該怎麼樣幫助那些偏遠地區，進行專業英語老師的培養，否則將來可能因為英文師資不好，那這個英語能力的提升政策將很難執行**，而且會造成一個常常提到的問題:「越早教英語，越早讓學生體會到感受英文的恐懼(discourage them from learning English)。

沈添鉦教授針對國家級的外語政策單位成立持相當正面的看法，並提出該單位必須有三項主要功能面：政策制訂、教育訓練、及研究發展：

> 在政策制訂方面，宜兼顧學理與實務，依據**國家目標，制訂政策，引導外語教育、學習、評量**，朝向優質、有效的方向與策略發展。在教育訓練方面，宜以**高階外語專業人才訓練為主要任務，並與現有的高等教育及民間外語專業訓練機構進行垂直的分工與整合**。在研究發展方面，宜針對**國家之外語政策所亟需之學理、論述、資料、國內外之第二語言現況與發展等主題，進行大型之整合型研究，以奠定政策的基礎。**

針對外語政策的推動，文藻外語學院李文瑞前校長建議應加深我國外語專業的學習，特別是在外語系或外語學院學生能以雙主修來增強多外語的能力，是必然的趨勢，李校長亦提出該校過去的作法即因此而建立該校畢業生的就業優勢：

> 文藻還是專科的時代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政策，就是每一個學生一定要學兩個外語，如果他是 English major，他一定要在法、德、西、日中要選一個 minor，但你如果是法、德、西、日語系的 major，英語一定是 minor，所以文藻早期畢業的學生在語言能力上面，**因為有兩種外語互相配合的基礎，讓他們不論是後來在升學或就業都佔了很大的便宜**，像法、

> 德、西這幾個系 major 的畢業生，在台灣，以目前的狀況來說，很不容易找到工作，但因為他們的英語都有很好的基礎和能力，因此也讓他們很容易就能就業。

然而這樣外語專業學生的雙外語主修制度，隨著改制爲外語學院後，爲了能繼續保有原先外語學院的特色與學生在外語的優勢，文藻提出因應之道，以維持外語學院的優良傳統。李校長也藉此機會提出對大學高等教育評鑑的呼籲，他認爲教育部應該鼓勵各大學發展特色重點及教學優勢，評鑑的標準應該要能強調各校的發展專業。這樣對國家整體外語政策的推動才能建立更優質的基礎。

> 為了要保持我們過去的這個傳統與特色，**我們訂了一個全台灣沒有任何另一所大學所做的**，就是我們每個大學部的學生，因為他們已經沒有雙外語的要求，**因此規定每個學生都要有三十六個學分的英語必修課**，這是個不得已的作法，也是很難維持的。為配合這個做法，**我們另外訂的是英語和各種外語的畢業門檻，為了就是希望持一個外語為主學校的傳統和特色**，不要因為我們改制或教育部齊頭式的評鑑標準與規定，影響了學校的發展專業和特色。事實上後來教育部訂的許多標準與政策讓我們根本無法只是強調外語的教學和要求的。

小結

綜合所述，爲符合我國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在我國外語政策的推動上，學者專家的建議主要分成以下重點：

一、專責單位之成立宜審慎評估，建議初期考慮由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下啓動外語政策發展中心(圖 5-1)，漸進實施後，中長期目標則爲成立國家級(如中央 29 個部會的位階)的外語政策推動專責單位

或國立外語大學(圖 5-2)。

二、應儘速建立我國體制內行政位階高且具跨部會整合的外語專責單位，除扮演外語政策規劃與擬定，如制訂更明確、具連貫性、前瞻性、及全球化觀點的外語政策，亦可藉以整合官方及民間的外語資源，專責推動外語師資的永續養成計畫，進而能長期推動我國外語政策的研究與發展。

三、以英語爲國際溝通語爲導向的全民的外語學習推動，以歐亞各國爲推動國際雙向溝通而成立的 World English 外語電視台實具有迫切性，其不僅作爲外語教育及全民學外語共識的媒介，更是供國際友人瞭解我國社會文化的國際化溝通的平台，讓國際人士更樂於親近我國文化內涵及社會動態，進而深化對我國的認同。

四、強化整合現有各大學的外語學習資源或平台，或維持各大學外語系或外語學院的外語人才養成基礎建設，不僅能提供更廣泛的共享機制，亦可相互交流優質的教學典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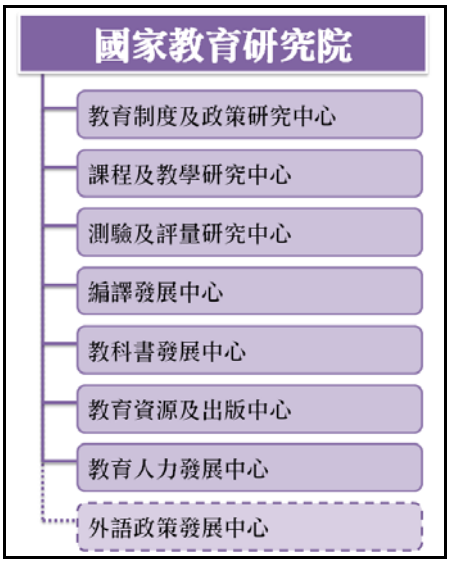

圖 5-1：外語政策立即可行建議：國家教育研究院之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戴浩一、林麗菊彙編

圖 5-2：外語政策中長期建議：國家外語政策委員會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戴浩一、林麗菊彙編

第三節　英語在我國外語政策之定位

英語在我國外語政策之定位究竟爲何？應視爲官方國際語言，或是比照新加坡、香港等地視英語爲第二官方語言？專家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但共同的交集都是「情境不同」。世新大學李振清教授認爲「英語成爲官方國際語言，將來一定爭議性很多，因爲台灣、香港、新加坡三者的社會情況不一樣」。

南台大學沈添鉦教授首先提出其對「英語爲第二官方語言」的見解，認爲這樣雖可提供我國公民英語使用的溝通情境，但整個政府體制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才可能建構英語爲第二官方語言：

> 台灣不具類似新加坡的英語歷史及語言的背景，**因此推動本政策的初期必須面對英語人才有限、資源不足、因擠壓其他**

> **語種而引起反彈等各種挑戰。但是如果國際化及培養世界公民是國家重大發展目標，則政府必須有大膽、前瞻的規劃，制訂長遠、具體可行的策略，逐步建構以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的機制與條件，以提供國民以英語溝通的環境。這不但對英語教育及學習能產生良性的引導作用，對於提昇我國國際化及國際競爭力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幫助。在政策制訂方面，宜兼顧學理與實務，依據國家目標，制訂政策，引導外語教育、學習、評量，朝向優質、有效的方向與策略發展。**

靜宜大學外語學院曾守得院長同意英語作爲第二官方語言的地位，的確能提升英語使用的情境。然需考慮英語作爲第二官方語言的衝擊，以我國歷史發展至今的現狀，我們是否有能力將所官方文件都英語化：

> 因為現在國語有人在反對、地方語言也有人在反對， 也有人在贊成。如果再加上一個外語， 它要一個官方地位。**官方地位是很好的。如果要所有東西都翻成英文，哪個殖民國家都沒有辦法達成。現在如果我們台灣要現在把我們的法律全書部要翻成英文，在座我們所有各位窮畢生之力， 我們也沒辦法做到。何況學校的政策還有很多的原文書沒有辦法翻成英文。假定說英語要變成官方語言， 這個一定要做的。我們台灣有沒有這個能力做？ 這個可能要考量的。**

曾守得院長對於考慮以香港或新加坡模式，將英語定位爲第二語言，提出保留的看法，他認爲將英語列爲第二官方語言在政府部門需付出的代價非常高，需要審慎評估：

> 假定說英語要變成官方語言，我們台灣有沒有這個能力做？這個可能要考量的。**如果說把將英語當成第二官方語言或者是第二語言，這個可能要考量到它的全世界的定位。**因為英語的全世界定位， 通常，可能我們要稍微參考一下。 以香

> 港為例。看看香港的例子，提升到什麼地步，我們才來做我們的決策，可能會更好一點。

國立台北大學劉慶剛教授認爲英語爲官方國際語可行性是短期無法完成，且所付出的整體代價過於龐大。他以所任教的台北大學英文網頁爲例，強調雙語化的外語政策需付出極大的成本：

> **英語為官方語言的部分。這是非常困難，無法在短期完成的事。就我自己親身的體驗，我們一直希望新成立的台北大學，一個以首都為名的大學，可以建立一個中英雙語「一對一」對照的網頁，讓想到台灣來進修或讀書的人，可以進入英文網頁以後，就可以找到所有中文網頁最新上載的所有資訊。我們都知道，在國外大家知道台北這兩個字的人可能比知道台灣的人更多，很多人都可能先打 Taipei 去 google 他們要的東西。結果十年過了，這個網頁還沒做出來。想想看，我們全國有多少部會、單位，要通通雙語化，需要多少的財力與物力才能完成，更需要加倍的財力與物力才能「維持」已經既有的成果或繼續創新。這樣做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也不是目前我們能力所能及的。至於我們是否要把英語變成官方語言的問題，需要討論的問題也是一樣複雜的。也一樣需要及龐大的財力與物力才能完成，更需要加倍的財力與物力才能維持的政策。**

小結

綜合所述，有關英語在我國外語政策之定位，學者專家見解稍有不同，然亦有其共識之處，主要分爲以下重點：

一、英語爲國際溝通語之定位已是趨勢，我國未來外語政策應致力於提升英語使用情境。

二、然需評估我國歷史國情發展不同於香港、新加坡等國際定位，審慎地處理英語爲官方第二語言之定位、社會文化因素、及實施所產之衝擊及所需付出之社會代價成本等。

三、此一議題對我國多語環境未來及國家長期發展有重大影響，建議需以長期研究，以深入探究此一議題。

第四節　其他外國語言之角色

英語已經高度被認同爲國際溝通語言，因此，在外語政策的推動上，除了強調英語的地位與重要外，在我國整體經貿外交及國際政治現實上，其他外國語的重要性爲何？國立政治大學外語學院院長于乃明首先表示，她在外語學院真切地感受到過去幾年外語需求的改變與影響，並具體說明政大外語學院在少數外語教學上的貢獻。更進一步提出其他外國語言應有的的角色：

> 我國多語言社會的關係，除了剛才大家講的台語、國語、客家語、山地語之外，**我們不能否認越南文跟泰文在台灣的需要，而且台灣新的一代，也就是台灣新生之子，有很多是跟越南人生出來的，或者跟泰國、中國大陸**，這些孩子都已經進入高中。他們不該忘掉他們母親的語言，所以我們也看好這一塊。**越南商會希望在台灣能有大學成立東南亞語文系，**他說在越南、泰國做生意很有機會，可是我們官方派出去的人，往往不會當地語言，而中國台商希望我們能在政大成立東南亞語文系。因為目前教育部給的北區外文中心的經費只夠開第一年的課程，我們用台商給我們的獎學金，用來開第二年、第三年的越南文和泰文，現在第一年有許多同學學越語、泰文，第二年人比較少，現在我們也看出成效了，因為有碩士生會用越南文，到越南去發表論文，教越文的老師說學一年或一年半就可以說越南文了，會至少念稿子，去發表

> 論文，**我個人認為東南亞國協未來的發展值得關切，我們不該忽略東南亞的語文和市場發展，政大外文中心除了越南文、泰文外，我們也曾經開過印尼文，但是老師回國就停了，但是這塊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對於東南亞各國語言發展的未來趨勢與重要性，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黃孟蘭院長亦表示認同，她認爲以我國面對亞洲經濟體大環境的現實面，東南亞外語的學習應該值得重視，且認爲應該以學程方式推動課程，以兼顧語言及文化學習的層次：

> **有關東南亞語的教學，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外勞，很多新住民，希望大學能夠開設越南語，我們輔仁大學除了歐語，英、法、德、日、西、義大利文以外，在今年八月以後，我們要開設越南語課程，我們的目標是要成立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分學程，因為學位學程困難度高，除了讓我們學生多學習東南亞語言以外，我覺得文化更為重要，我自己認為在外語的學習當中，文化和語言思維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也會在這方面多所著墨，除了歐語和英語之外，我覺得為了因應台灣現在的整個大環境的變遷、東南亞語的課程可以慢慢的推廣。**

至於其他外國語的角色與教學推廣，于乃明院長提出政治大學外語學院的日語修課模式及日語教學創新作法的成效。

> **以台灣的地理位置來說，日文很重要**，日本確實是很例外的一個國家，雖然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世界上很重要的經濟體，可是在日本會講英文的人真的非常少，你如果用英文去跟他們溝通，效果差很多，所以必須會日文。**以日本以地理位置還有歷史來講，學習的人當然是非常多的，政大學日文的學生，每一年申請要當作輔系的都超過四、五百人，本來所謂的輔系我們只能收十幾、二十個學生，但我們採取收費制度

> 的擴大輔系，現在最多可收到三百人，但我們還是不能滿足另外兩百個學生的需求。

然而在主導政治大學外語學院課程發展的經驗中，于乃明院長提到，她曾遇到企業所需外語人才的期望值與外語學院所培養的專業外語人才有高度落差，這也是他們現在面臨的挑戰。她提到日本企業的例子，企業主在尋找人才時，是以專業及英文爲最優先考量，而不是以第二外語專業人才爲優先考量：

> **有些企業家也希望我們不只訓練外語**，過去日本三井商社老闆來訪問的時候我曾問他，你們企業到底希望我們幫你們培養甚麼樣的外語人才？他講的答案我是非常失望的，但**那卻符合市場的需求，第一個他說要有專業知識，第二個英文要非常好，因為商場要到全世界行銷，第三個電腦當然要非常強，第四個才是日文，對日文系的學生他們要求的日文已是第四個條件，可是我覺得商場的敏銳度非常強**，他們講的是實情。

于乃明院長亦提出其他外語專業人才在職場發展亦受到類似的挑戰，其他外語的專業人才究竟應該具備何種外語能力，或者外語人才又應具備何種職場優勢？以台灣的島國經濟體，如何能讓其他外語專業人才面對職場現實的環境，提早培養企業所需的能力？于乃明院長舉出兩個實例：

> 有很多公司老闆希望我們在校生除了去**念專業的課程外，也希望有一些實務上的要求**，我們校長一直問我說，你站在外語學院院長的立場，你覺得學生出來應該具備怎樣的能力，我說我**希望各種語種畢業的學生都能看得懂當地的報紙，也就是我希望同學看得懂報紙，因為學了外語很多同學真的還是看不懂報紙**，也有很多老闆跟我抱怨，日文系學生不能用，我說為什麼不能用，他說我給他**一份資料，叫他幫我在**

> **兩、三個小時內做出摘要**，但是做不出來，因為沒有概念。最近日文系也有電腦公司來跟我們產學合作，老板說因為去**培訓資科系的學生不如來培訓日文系的比較快，因為語文養成比較難**，所以我覺得台灣既然是一個島國，是一個必須要靠外貿的、靠旅遊的國家，所以也必須要注意一些現實的層面，當然不能全部變成應用英文或者應用日語系，但是有一部分必須是考**慮學生的出路面對現實的環境。**

正因為一般企業所需要的是專業知識及英文能力優先，這也讓其他外語的人才必須面臨需培養自己兼具雙外語的競爭優勢。于乃明院長也分享了在政治大學外語學院成功發展出來的模式，雙外語的優勢體現在政治大學的歐語文學程，呈現極有成效的結果。這也許是未來我國推動外語政策時，可以參考的模式，

> 我們歐語學程的學生到目前實驗也算是很成功的，到現在來講慢慢變成**德文的同學可能會修法文，法文的同學可能修西班牙文，同時還修英文，所以他們的學生出來非常好用，今年已有第二屆畢業生，現在看來這個模式好像還不錯**，今年校方同意把歐文學程更名成歐文學系。政大外語學院這三年的數據顯示，大概**有四成的同學都修了雙外語，我們外語學院標榜的是雙外語雙專長，我們跟商學院有合作，我們跟傳播學院也有合作關係。**

關於其他外語的定位及展望，李振清教授表示以我國經濟發展模式，應該朝向多元的外語政策方向去推動，不論西班牙語、東南亞語系、或東北亞語系的學習都值得我們關注，而且建議更應該善用這些新住民帶進來的外語資源，進行產學合作的方案。李教授認為對我國現狀而言，外語政策不宜僅限於英文。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已在國內長期受到重視。而且為了因應我國國際地位及經貿需求，韓文、越南文等其他外語教學的新場域也逐漸在我國受到重視：

剛好在今年年初，有一個紐約時報的著名記者 Nicholas Kristof 在紐約時報寫一篇報導，強調 Spanish first, and then Chinese(先學西班牙文，接著學中文)這個觀點。各大學都宜把將之列為參考資料。所以我們提倡中文的功能在這裡，英文好、中文好，在其他語言我覺得就是日文跟西班牙文。其他東南亞的外語學習，也應列為台灣各大學的選項。我覺得台灣現在發展很特別，台灣現在外勞那麼多，而且東南亞很多，事實上他們很多背景都不錯，是有大學畢業的，是高中畢業程度不錯的。他們會講越南語、馬來語、印尼語，我們台灣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而且未來不可能沒有外勞，為什麼不好好利用這些人的外語背景，然後開始在大學開一些越南語等。那這一點我想在大學評鑑和國際訪視的時候，發現南部和外勞較多的一些地區，或科技大學他們為了產學合作，就請一些越南的泰國的開在職進修班，專門教越南語跟泰語，所以我想這一點是可以列為考慮的方案。

小結

綜合所述，有關其他外國語言之角色，學者專家建議主分爲以下重點：

一、以我國面對亞洲經濟體大環境的現實變遷，東南亞外語、少數外語教學應逐漸受重視。

二、因應國際經貿需求，應重視其他外語重業人才之外語能力培育，應掌握我國人才之職場優勢與現實環境的期望值。

三、應善用我國新住民引入之外語資源,以進行產學合作或國際交流。

第五節　外語教育與多語言社會的關係

我國是一個多語言的國家，幾乎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具有「雙語言」能力，無論是國語加上閩南語的雙語能力，或國語加上客家語的雙語言能力，或者是加上其他多達十多種的原住民語言。全國人口將近二千三百萬人，使用著主要的三種語言及十多種南島語，如塞德克語、排灣語、阿美語、泰雅語、布農語、魯凱語等，再加上英語、其他外語、以及引進東南亞各地勞工而帶進來的各種外語，台灣是非常多語言、且多元文化的社會。

在第一節論述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中，多數學者專家都表示，外語政策的推動必須先考慮我國多語言社會的現況，因爲外語政策不能獨立於國家整體的政治與社會的現實。關於中央大學衛友賢教授認爲多語言的社會必須能容納多元的文化與價值，且在推動外語政策時，關心本土的語言與文化這個觀點是不應該衝突的。同樣地，學習外語時，也應該重視外國文化價值，才能達到外語學習時的深度文化學習層次。

> 關心本地的語言，這個真的需要我們去主動地去關心的，跟外語？聽起來可能有點矛盾，所以我想是不是有一個看法是不會衝突是不是矛盾的，我想的其中一個切入點是說，我們也希望台灣可以在華語教學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就是由我們可以做得到的一個地方看能不能再努力。我覺得一直希望他可以用外文講什麼，不一定是外國來的東西可以用外文講本地的東西，而且他有一個目標，如果他可以知道國外的人對這些文化或是日常生活或是傳統文化等等的，不管是都好，他有一個任務，就是他可以用外文，可能主要是英文或別的外文，介紹台灣的文化給好奇的外國人聽，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而且很實際的動機，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有辦法，把這兩個加起來，外文不是，學外文變成崇洋的一個態度，都是看外國的內容為了學外文，滿可惜，也是很好，學習外國的文化，外國的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不要犧牲自己的母文化的珍惜，我覺得可以同時，然後我們可以

看怎麼落實。

此次座談中，多數專家學者都對第一及第二議題提出熱烈討論，對於外語政策與多語言社會的議題較少提出看法。國立台北大學語言中心劉慶剛主任的觀點亦顯現多語言社會的議題在推動外語政策時，我國的現象是相對的單純：

> **外語教育與我國多語言社會的關係。我個人認為在外語政策上，對社會層面上的擔憂可能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複雜。我認為不論外語政策如何推動，我們的學生或民眾都要面對三大語群：國語、母語(鄉土語言)、外語。最後我們可能發現小朋友都在這三個選擇上面看哪一個最挫敗就最不要去選，通常英文可能就是很挫敗的一個。**

本節所探討的我國對於多語言的尊重與共容，可以英國語言學者Graddol (2006)在他的《英語下一步》(English Next)一書中強調的觀點作爲總結：「後現代是屬於能說多種語言的時代」(Postmodernity is the age of multilingual speakers)。亦即，在擬定國家外語政策時，現在的趨勢是朝向多元外語的政策時代。

小結

綜合所述，有關外語教育與多語言社會的關係，學者專家建議主分爲以下重點：

一、外語政策推動應將我國多語言社會現況列入考量，充份評估國家整體政治及社會現實

二、應鼓勵多元文化價值之發展，倡導多語言的尊重與共容。

第六節　英語爲國際語之定位

英語作爲國際語的定位，以加拿大學者 Caine (2008)提出的 The Spread of English 一詞最能展現其全球化擴散(spread)的力量。而更早在 1997 年 Widdowson 曾宣稱「英語已經散佈爲國際語言」。而同一年，英國語言學家 Graddol (1997)在其出版的《英語的未來》(The Future of English?)一書中提出強烈的主張「英語將在未來五十年成爲全球獨一無二的共通語言」。 隨著全球化強勢的英語浪潮，英語成爲一種國際語(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EIL)已是必然之趨勢。根據 Crystal (2005)的《英語的下一步》(English Next)一書提到，母語非英語人士(non-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使用「英語爲國際溝通語言」的頻率已遠超過以英語爲母語的人士(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目前全球使用的 EIL 一詞來定位英語，其最重要的意涵是必須強調以跨文化溝通的目的，且同時亦能兼顧自己在地文化使用英語的特色。

在以「英語作爲國際溝通語」的全球化趨勢下，歐盟亦於 2003 年制定了一項新語言政策，他們稱之爲「世界英語計畫」(World English Project)。歐盟前瞻性的語言政策很值得我們在檢討我國外語政策時的參考或借鏡。歐盟各國的英語教學原先與我國英語教學相差無幾，只有中學六、七年的英語課程，外加大學一至二年的大學英語文課程。而現今歐盟各國爲了提升全球化職場的競爭優勢，必須往下紮根，並且以專業英文導向(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進行英語的學習，才能符合英語學習的國際潮流。

在以「英語作爲國際語」的議題中，成功大學文學院賴院長肯定此一趨勢已經到來，因爲再多數都非英語爲母語的國際會議中，英語是彼此溝通的主要用語。而面對這樣的趨勢，我們的教育政策或外語政策將如何因應此一趨勢下的學習轉型才是我們現階段的挑戰：

> 可見**英語作為一個 international language 的時代已經來了**。前陣子我去漢城參加語言測驗的一個會議，大概有一百個人參加，亞洲的測驗，英語測驗的一個會議，然後有德國、俄國、有泰國、有馬來西亞、香港、韓國、日本的與會者，

> **我們都用英文來講話，反而是 native speaker 在角落，他們大概十幾個人，就在角落，然後聽我們用各種腔調的英文在溝通這個英文測驗。**所以那樣的一個時代已經來臨了。**這個時代來臨，教育要怎麼配合？因為我們還在教那種正統英文，這個教育的政策真的是遠落後於現實，那這個要如何去改善？而且這個新的趨勢不代表它就是沒有危險，這樣的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是有危機的，因為他會動搖到整個學習的正確性。**

而在面對英語作爲國際語的考量之下，靜宜大學文學院曾守得院長認爲歐洲語言聯盟架構提出很不錯的合作模式，歐洲共同架構的歐洲各國能拋開政治實體或拋開語言本位的議題，而制訂統一的語言政策、推動策略、及教材編製，來檢視外語政策的定位，這不僅是創舉，也是在英語作爲國際語的趨勢下很值得我國參考的典範。曾院長建議從歐盟語言架構去檢視各國的外語政策及各國語言的定位。他也呼籲外語政策的檢視應該從教材及師資培育開始，再去檢視政策如何落實到教室學習情境中，例如，教室的學習面與評量：

> 我們現在正在做一個歐盟語言政策的研究。剛開始。前一、兩年我們都在做一個先導計畫。我們想看一下三個國家，德國、法國、跟西班牙。我們想看一下**這三個國家裡面，他們是怎麼教日文的、他們是怎麼教西班牙文的、還有他們是怎麼教英文的。看看他們三個國家裡面的語言政策。一條鞭式政策編出來的教科書、師資的培育，然後進入教室，我們想進入教室實際上去看一下教學，然後再看他們的評量。我們想了解一下到底這些從政策面一直決定到實際上最底層，在教室裡面是怎麼成形的。**我們希望這個計畫能夠會有一點貢獻。現在呢我們談到外語政策， 歐洲的這些外語政策歐盟的二十八個國家裡面，大部分的國家都遵守這個共同的架構。所以我們想看一下他們的政策實施成效。

輔仁大學黃孟蘭院長亦提及英語作爲國際溝通語言是歐盟各國主要的溝通語言，即使在我國外語學院的教學系統，必須強調學習英語的重要性。

> **在歐盟國家的中學裡，可以學習到的語言就多達三十二種了，不過所有的官方文件都用英文來呈現，我們都知道歐盟有二十七個會員國，他的三個最主要的語言是英、德、法，但英語還是最重要的語言，雖然我教授第二外語，在輔仁大學外語學院，我們非常看重學生的英語能力。**

劉慶剛主任認爲「英語爲國際語」的定位中，學英語應該以功能英語(Functional English)爲主，而不是傳統的文法學習，或以母語學習的規範來制訂學習導向。如同 Graddol 所提到的「英語的功能使用者」(functional users of English)，因此，英語教學的原則、方法、評量必須重新評估後加以調整。

> Graddol 在 2006 年寫了一本書叫 English Next，他預測在 2040 年的時候，將可能會有**三十億人口為** functional users of English。**我個人認為不論我們用**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English (EIL) **或是**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FL)，我們談的大概是跟這群人有關。**而** functional users of English **的出現或形成，似乎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如果未來一定會出現這樣的一群人(約地球總人口的** 40 %)，**我們今天就得先想好應如何去面對這個現實。同樣的，我們在討論最近很流行的專業英語**(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 ESP)**時，發現在公司行號對英文的需求，不會像要求我們外文老師那樣，一切用所謂的** native speakers' norm，他們的概念很簡單，你的英文可以足夠幫我公司賺錢，我就覺得你英文是很好的。如果你的英文不夠好，讓公司在 shipping 上面多花了二十萬台幣，我就覺得你英文是不好的。**這個時候你的英文是否** functional **就變成非常重要。**

> 然而，如何斷定誰的英文具有「功能性」，則不是簡單的事。除了語言之外，還有更多層面需加以考量，如手勢(gesture)的使用、不同行業的不同需求等。除此之外，今天如果從學習或教學的立場來考量，我們到底要如何教我們的小朋友。過去我們都依循母語人士訂定的規則和標準(the native speakers' norm)來教育我們的小孩，卻自然形成這麼大量的 functional users of English。我們是否保持原樣，就能不斷製造出更多的 functional users of English 呢？還是我們得因應 David Graddol 所談到的趨勢，在教學準則和方法上重新調整？如果是，那新的 functional users of English 的準則在哪裡？用這個新的準則教出來的學生，會不會連 functional users of English 的程度都達不到呢？上述這些問題的答案，有待未來大家共同努力去尋找。我覺得這個 EIL/EFL 真的需要有一個蠻大的一個 research team 來共同努力，以尋求對語言政策最有利的解答。

成功大學文學院賴俊雄院長提出「好的政策必須有新的觀點」，而不是技術或工具面的問題：

> 今天要談外語政策就必須要有結構性的思考，因為 know how 部分太複雜也太多了，那我覺得要談政策一定是政治的問題，政治問題是資源分配的問題，城鄉啦、公私立這些問題；但我覺得重點是如果你要有一個好的政策你必須要有新的觀點，觀點是這個政策的核心，而不是技術層次的問題，所以有沒有新的觀點才能談新的外語政策。而就 ELL 或跟 ELF 這兩個是不是等同？還是說是很具爭議性的？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跟 as a lingua franca 是兩個概念還是一個概念？

小結

當今我國外語政策面對的正是全球英語趨勢中不可避免的觀點議題，無論是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或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以不同角度或觀點來檢視我國外語政策時，都需面對不同層次的議題與現實。這正是我們當今必需審慎面對的挑戰。綜合所述，有關英語爲國際語之定位，學者專家建議主分爲以下重點：

一、參考歐洲語言聯盟架構模式之執行，拋開政治實體及語言本位的議題，而制訂統一的語言政策、推動策略、及教材編製，來檢視外語政策的定位。

二、外語或英語教育應該以語言功能爲導向，且應從教材及師資培育之基本面檢視外語教學的準則與方法。

三、因應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的國際趨勢，建議重新檢視我國過去深受 English as a first language 或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影響的教學模式，以擬定適合我國外語學習的方向與語言教育政策。

本章總結

綜整專家學者建言，建議主分爲以下重點：

一、明確擬定我國外語政策制訂的目標及核心價值。

二、倡導我國多語言社會的尊重與共容。

三、審視我國整體國家發展，擬定外語教育方針，以養成全球化人才爲前提。

四、兼顧社會與國家的整體需求，平衡發展高階專業外語人才之養成及一般外語能力之訓練。

五、建立跨部會的專責單位，以推動外語政策。

六、成立外語電視台,以營造全民的外語學習情境及國際交流的平台。

七、善用各大學的外語學習系統，以共享優質的教學典範機制。

八、英語成爲國際官方語言之議題需審慎評估。

九、因應外語學習國際趨勢，參考歐洲語言聯盟架構模式之執行，擬定適合我國外語學習的方向與語言教育政策。

第五章　外語政策重要建議

在此次透過座談以蒐集專家學者的觀點時，多數人對於我國現階段的外語政策的不夠明確都提出懇切的建議或務實的思考觀點。例如提升大學院校的英文學習情境，應以情境及語言功能學習爲主，不應該以測驗來引導教學，外語學習應考慮本土語言的定位、並結合文化素養內涵，培育專業化的外語師資等。

然而，此次外語政策座談會中，最值得我們在制訂我國外語政策中身深思的議題應該是我國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及我國可以採取的推動策略。在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價值方面，包括區分普羅教育的外語教育及菁英教育的高階專業外語教育，以語言功能面強調營造英語學習情境的重要性，需考慮文化層次的學習，需考慮本土語言的定位，能兼顧國內多元語言的發展、以及師資的養成制度等等。而在外語政策的推動策略上，務實面上包括成立公營的外語電視台，推動共享平台成立、各校教學典範的分享等等。

以下綜合專家學者意見後，針對短期、中期、及長期的外語政策提出以下之政策建議，並列明相應之主協辦機關，以供政府相關主管單位做爲未來外語政策發展的基礎：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我國外語政策立即可行、且具體落實的建議如下：

1. **整合官方及民間的外語學習資源：**建議由教育部統籌，透過各大學或教學資源中心大學的結盟或資源共享機制，開放全國化的外語學習平台，並提供永續運作模式。
2. **積極營造使用外語的環境，成立非營利之外語電視台或外語媒體傳播系統：**目前國內雖已有外語廣播台，以目前傳播趨勢，仍建議由行政院主導外語電視台暨網路傳播之推動小組設立，以外語電視台創造一個能充分使用外語的環境，除可積極促進公民的外

語素養外，亦能提供國際人士接觸我國在地文化與內涵的管道。

3. **強化大學外語學院在第二外語教育的功能：**建議透過教育部對高教育的管道，長期永續提供我國重點外語學院相關資源，由這些重點外語學院協助全國中學、大學院校師資養成及雙外語競爭優勢力之培養。

4. **長期推動外語教育研究發展：**建議在行政組織位階夠高的外語專責單位，長期能持續推動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的趨勢主題研究，以利我國外語教育發展，例如外語人才養成研究、跨文化溝通、英語在特殊場合使用、英語作爲學術語言等相關議題，以作爲外語政策的參考。

5. **英語作爲第二官方語言之政策宜審慎評估：**建議由教育部成立評估研究小組，充份考量我國歷史、文化背景與社會民情，參酌歐盟等地相關經驗，分析全世界的英語做爲國際溝通語或英語爲共通語言之趨勢後，另評估行之。

6. **重視外語師資培育的永續化制度：**建議由教育部統籌，參考美國外語學習指標之五大核心能力，以長期推動 K-12 課程、教材、教學、評量工具之研發，亦可透過各大學之外語學院協助推動外語師資專業培育模式，以提昇中小學、大學英外語教育教學品質。

二、中長期建議

我國外語政策在十年內可以經由蒐集政策核心價值及重大施政理念，因此可規劃實施的建議如下：

1. **明確擬定我國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與政策主張：**建議成立新的跨部會專責單位，明定我國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與政策主張，例如考慮外語政策的重大議題，並衡量三個層次：一是考慮不同的外語需求面向，包含菁英外語政策與國民素養的外語政策，其次是鄉土語言教學，第三是考慮與鄰國的東北亞或東南亞語言的經貿需求，亦即，考量東南亞各國語言未來發展趨勢與重要性，應善用新住民帶進來的外語資源，外語政策應能依據全球化時代之變

遷作適時之修正。

2. **成立跨部會之外語政策專責單位或成立國立外語大學：**我國的外語政策專責單位之成立需盡早規劃，建議由教育部主導，此一專責單位需符合跨部會、跨語言、跨層次之「三跨」原則。另外，外語人才或外語師資需長期養成及規劃，可比照北京外國語大學，成立國立的外國語大學，除可針對國家政策發展，提供所需要的外語人才，更可以外語爲主要溝通語言，成立各種學術領域的學門(如英語、德語或法語的國際商學院，或外語國際關係或外交學院)，以培養外語兼具學門專長之高階人才。

3. **明定外語政策專責單位組織任務：**該單位應具備統合我國外語政策發展之定位，擬定明確核心政策主張、政策目標及定位，以統籌我國外語政策擬訂、外語策略執行、外語專業人才培育、外語研究發展、及外語政策白皮書的擬定等。

表 5-1：我國外語政策建議彙整

時程	政策建議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立即可行建議	1. 整合官方及民間的外語學習資源。	教育部	各大學或教學資源中心
	2. 積極營造使用外語的環境，成立外語電視台或媒體傳播系統	新聞局	
	3. 推動各大學外語學院發展重點外語的教育成效	教育部	各大學外語學院
	4. 推動外語教育研究發展	教育部	

	5. 審慎評估英語作爲第二官方語言之政策	教育部	
	6. 建立外語師資培育的永續化制度	教育部	
中長期建議	1. 明確擬定我國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與政策主張	成立新的跨部會專責單位	
	2. 成立國立外國語大學或外語教學研究院	成立新的跨部會專責單位	教育部
	3. 成立跨部會之外語政策專責單位	行政院	
	4. 明定外語政策專責單位組織任務	成立新的跨部會專責單位	

資料來源：戴浩一、林麗菊彙編

第六章　結論

我國當前的各項外語政策與我國整體國際關係、經濟發展、及外交之英外語的現階段需求尚存在相當的距離。因此，以國家整體政策發展的高度來制訂能迎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挑戰的外語教育政策實具有相當之迫切性，亦將是國家中長期教育發展規劃或國力提升的重要根據之一。馬總統曾提出政府核心策略在於「培育國民全球化能力」，而其中提到政府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帶領台灣勇敢地迎接全球化帶來的挑戰」，而這也正是本計畫之重點，尤其是外語教育政策的專責單位成立，更是如何本國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推手。

英外語能力的培養是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必然的趨向，不論亞洲各國或歐盟各國，都致力於全球化的學術交流、共通互惠的資源分享、全球化職場中提升國際競爭優勢等。美國著名文學Henry B. Adams 曾強調教育儘量「瞭解與涉獵全球事務的努力」。而這正是英語作爲國際語言的未來，這個趨勢不僅改變我們對語言的看法，更進一步改變英語教學的實務與原則。

很明顯地，對於英語的所有權歸屬之定義已經轉移，且已經變成世界英文(World English, WE)的趨勢中(The ownership of English has shifted and new world Englishes have emerged)，我國的外語政策制訂必須能呼應這個國際潮流的轉變，並成立國家級的專責單位以最積極的態度面對全球化及世界村的趨勢，探討我國的外語政策及該政策的推動。

本研究在整合多數專家共識後，針對我國外語政策中應儘速成立的外語政策專責的學院或中心，提出以下結論：

一、整合我國專家學者建議後，建議再參考各國的外語核心價值及政策主張，建立本國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例如，美國的的核心價值是國家整體安全爲首要考量。因此，五項主要政策主張如下：

提昇國家安全與外交能力，提昇國際經貿發展，提升公民參與國際事務和經濟活動的能力，提倡外語多元性，保存多元族裔語言與文化，及提昇學術研究能力。另外，亦制訂了外語學習指標的五大核心價值：溝通能力(Communication)、文化理解(Cultures)、跨領域學習(Connections)、語文素養(Comparisons) 和社群參與(Communities)。而歐盟各國則考慮到各國語言多元化需求，其主要核心價值如下：以多語文化培養終生語言溝通的能力，語言多樣性應受平等之對待，理解跨文化溝通及接受文化差異，具備多元語言社會交流的公民素養，及以個人平等發展機會爲前提的社會凝聚力。

二、建議參考歐盟或美國的外語教育政策，以永續模式建議我國的外語政策專責單位，一方面進行外語政策或外語教育相關研究，培育專業師資及國家發展重點的高階外語人才，另一方面，整合國內外語教學資源，提供共享平台或教學典範。而在實施上述實證研究的同時，可提供我國外語政策主張的參考。美國的外語專責單位分爲：國家外語中心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國家外語資源中心(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及國家中小學外語資源中心(National K-12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並且有整合協調及諮詢功能的國家語言諮詢會(National Council of State Supervisors for Languages)。美國推動這些各地外語專責單位以來，以國家外語中心與國家外語資源中心的成效最爲彰顯。不僅舉辦全球化的外語教學研討會，更因長期的研究推動，能提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報告。

三、建議參考新加坡或美國模式建立有效的外語教學政策及配合的策略，並下向紮根，由建立嚴謹的專業師資養成制度開始。而這些外語教學政策必須能因應英語爲國際語的全球趨勢。不論教學法、教學重點或教材，都能符合情境學用的原則。而外語專責單位的成立才能真正配合國家發展政策，不僅整合國內的外語資源，更能進行不會間或縣市間的橫向整合協調。

參考書目

中文參考資料

梁安玉(2009)。**香港之外語教育政策及多語言學習之可能性**。政治大學：全球化下多語言同步學習之環境與政策國際研討會。

翁幸瑜(2009)。**歐盟多語言政策與德國移民者語言課程設計之研究**。政治大學：全球化下多語言同步學習之環境與政策國際研討會。

尤雪瑛(2009)。**台灣外語政策制定初探**。政治大學：全球化下多語言同步學習之環境與政策國際研討會。

行政院 (2009)。**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計畫**。取自 http://www.rdec.gov.tw/public/attachment/9101617414471.pdf

張武昌(2009)。**台灣英語教育政策之檢視：從小學到大學**。台北：文鶴。

張武昌(2006)。台灣的英語教育：現況與省思。**教育資料與研究，69**(04)：131-143。

葉玉賢(2002)。**語言政策研究—語言政策與教育：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比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行政院(2008)。**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總結報告**。取自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10257&key=&ex=%20&ic=

黃宣範(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文鶴。

吳錫德(2002)。**法國的語言政策–全球化與多元化的挑戰**。取自 http://mail.tku.edu.tw/cfshih/ln/paper06.htm

教育部(2009)。**教育部電子報，北區大學外文中心**。取自 http://epaper.edu.tw/topical.aspx?period_num=338

教育部(2011)。**教育部中教司，推動第二外語教育五年計畫**。取自 http://www.edu.tw/high-school/faq.aspx?faq_sn=431&pages=2

公共政策論壇(2008)。**國家外語政策座談會暨記者會**。取自 http://www.ppf.nccu.edu.tw/970919/970919_wbook.pdf

References

_____. (2006).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facing America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 letter to our members: Next steps. Letter from ACE, AASCU, AAU, AACC, NAICU, NASULGC.

_____. (2008). *Trends in world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Preview of findings from the national K-12 foreign language survey*. CALreporter, No. 22, pp. 1, 3.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2008). A brief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nflc.org/about_us/history/

The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 (2005, February). 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lconference.org

Abbott, M.G. (2008). Perspectives: A national voice for the language profession at the federal/national level.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2*(4), 623-24.

ACTFL. (2006-2008). ACTFL position statements. Retrieved from http://www.actfl.org/i4a/pages/index.cfm?pageid=4743

Akaka, D. K. (2005). Remarks before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languag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aniel Kahikina Akaka, U.S. Senator for Hawaii*.

Alatis, J. A. (2001). *History of U.S. policy and efforts for education in the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annual conference, Arlington, VA.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1998). Educating for global competence: America's passport for the futur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2000). Strategic Initiativ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sponding to the Presidential Directive. *Annals, 39*(2), 255-275.

Asia Society. (2001). Asia in the schools: Preparing young Americans for today's interconnected world. Retrieved from http://www.askasia.org/teachers/about-materials/ASIA_101.pd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2006, January).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initiative: Meeting America's economic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00). *White paper on the study of Asian languages in the U.S.: Present programs, future needs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2001).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izing america's education system and its citizenry*. Australian Language and Literacy Council.

Preisler, B. I., Klitgård, & Fabricius, A. (2011). *Language and Learn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From English Uniformity to Diversity and Hybridity*. Bristol,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Bardovi-Harlig, K. (2002). A new starting point? Investigating formulaic use and input in future expressio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4*(2), 189-198.

Bärenfänger, O., & Tschirner, E. (2008). Language educational policy and language learning quality: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 of reference.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41*(1), 81-101.

Baucorn, L. (2005). World leaders establish a plan of action for U.S. language policy.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actfl.org/i4a/pages/index.cfm?pageid=3725

Baum, D., Bischof, D., & Rabiteau, K. (2002). Before and beyond the AP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llegeboard.com/prod_downloads/apc/ap04_beforeandbeyond.pdf

Bianco, J. Lo, J. Orton and G.Yihong (2009). *China and English: Globalisation and the dilemmas of identity (Critical Language and Literacy Studies).*

Biber, D., & Reppen, R. (2002). What does frequency have to do with grammar teaching?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4*(2), 199-208.

Birkbichler, D. (2007). *Lost in translation: A review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efforts to develop a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y.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Blake, R.J. & Kramsch, C. (eds.) (2007). The Issue: National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1*(2), 247-249.

Blake, R. J. (2007). New trends in using technology in the

language curriculum.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7*, 76-97.

Blatchford, P., Goldstein, H., Martin, C., & Browne, W. (2002). A study of class size effects in English school reception classes.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8*, 169-185.

Bousquet, G. (2008). A Model for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2*(2), pp. 304-06.

Brecht, R.D. (2007). National language educational policy in the nation's interest: Why? How? Who is responsible for what?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1*(2), 264-265.

Brecht, R.D., & Rivers, W.P. (2000). *Langua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ole of Title VI/Fulbright-Hays in supporting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Dubuque, IA: Kendall/Hunt

Brecht, R.D., Golonka, E.M., Hart, M.E. & Rivers, W.P. (2007). *National capacity in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 post 9/11: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Title VI/Fulbright-Hays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College Park, MD: The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recht, R. D., & Rivers, W. P. (2000). *Langua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ole of title VI/F-H in supporting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Dubuque, IA: Kendall/Hunt Publishing Company.

Brecht, R. D., & Rivers, W. P. (2001). *The language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guage, security and the federal role*.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Brecht, R.D., & A.R. Walton. (1994). National strategic planning in the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In R.D. Lambert (Ed.).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An agenda for change. Special Issue of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p. 190-212). M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Byrnes, H. (2008). MLJ Perspectives panels: Representing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Georgetown University Web site: http://www1.georgetown.edu/departments/german/faculty/byrnes/perspectivespanels

Byrnes, H. (2008). Perspectives: The issue: From representation at the federal/national level to creating a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framework.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2*(4), 614-20.

Byrnes, H., & Maxim, H. H. (2004). *Advance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 challenge to college programs*. Boston: Heinle Thomson.

Byrnes, H., Weger-Guntharp, H., & Sprang, K. A. (2006). (Eds.). *Educating for advanced foreign language capacities: Constructs, curriculum, instruction,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Carreira, M.C. & Anmengol, R. (2001). Professional opportunities for heritage language speakers. In J.K. Peyton, D. A. Ranard, & S. McGinnis (Eds.), *Heritage languages in America: Preserving a national resource* (p.p. 109-142). McHenry, IL, and Washington, DC: Delta Systems and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Chapelle, C. A. (2007). Techn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7*, 98-114.

Christian, D., Pufahl, I., & Rhodes, N. C. (2005). Fostering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What the U.S. Can Learn from Other Countries. *Phi Delta Kappan, 87*(3), 226-228.

Clifford, R. T., & Fischer, D. C. Jr. (1990). Foreign language needs in the U.S. government. In R. D. Lambert & S. J. Moore (Eds.), *Foreign language in the workplace: Special Issue of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p. 109-21).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6). *Education for global leadership: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for U.S.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ittee on Prosper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of the 21st Century. (2007). *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 Energizing and employing America for a brighter economic future*.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Conference on Global Challenges and U.S. Higher Education. 2003. Retrieved from http://www.jhfc.duke.edu/ducis/globalchallenges/

Council of Europe (2011). Council of Europe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e.int/t/dg4/linguistic/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2005). Innovate America: Thriving in a world of challenge and change.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mpete.org

Crump, T. (2000).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lexandria, VA: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Crystal, D. 1997.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Wiley, D. S. & Glew, R. S. (Eds.). (2010) *International and Language Education for a Global Future: Fifty Years of U.S. Title VI and Fulbright-Hays Programs*.

Davidson, D. E. (2004). Capabilities and outputs of the U.S. education system: Proficiency outputs. Retrieved from the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 http://www.nlconference.org/docs/NLC_Commentary_Davidson.doc.

Davidson, F., & Fulcher, G. (2007).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CEFR) and the design of language tests: A matter of effect. *Language Teaching, 40*(3), 231-241.

De Bot, K. (2007). Language teaching in a changing world.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1*(2), 274-276.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02). Languages for all: languages for life. A strategy for England**.**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ducation.gov.uk/publications/standard/publicationDetail/Page1/DfES%200749%202002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05a). Secondary pocket guide: Curriculum onlin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ducation.gov.uk/publications/eOrderingDownload/15332.pdf.pdf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05a). Secondary pocket guide: Curriculum onlin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ducation.gov.uk/publications/eOrderingDownload/15332.pdf.pdf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05b). The Key Stage 2 Framework for Languag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ducation.gov.uk/publications/eOrderingDownload/Framework%20for%20Languages%20-%20Part%201.pdf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0). Languages at Key Stage 4 2009 - 2011: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Languages Review recommendations - baseline findings from the first year of the evalu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ducation.gov.uk/publications/standard/publicationDetail/Page1/DFE-RBX-10-01

Department of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 (2007). The Languages Ladde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ducation.gov.uk/publications/eOrderingDownload/DCSF-00811-2007.pdf

Department of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 (2003). Framework for Teaching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Years 7, 8, and 9. Retrieved from http://education.staffordshire.gov.uk/cgi-bin/MsmGo.exe?grab_id=292&page_id=1842944&query=MFL+framework&hiword=MFL+framework+

Draper, J. B., & Hicks, J. H. (2002). Foreign language enrollments in public secondary schools. ACTFL. Retrieved from http://www.actfl.org/files/public/Enroll2000.pdf

Edwards, J.D. (1995). The future of languages. *FLES News, 8*(3), 8.

Edwards, J.D. (2004). The role of languages in a post- 9/11 United States.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8*(2), 269-272.

Edwards, J.D., A.L. Lenker & D. Kahn. (2008). National language policies: Pragmatism, process, and products. Joint National Committee on Languages and National Council for Languag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languagepolicy.org/documents/JNCL-NCLIS_p2-42_v1.pdf

European Parliament. Report on a New Framework Strategy For Multilingualism (A6-0372/2006, 23.10.2006). Retrieved from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pubRef=-//EP//NONSGML+REPORT+A6-2006-0372+0+DOC+PDF+V0//EN.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 *Europeans and language*s. *Eurobarometer, 64* (3).

Fishman, J. A. (1994b). "English Only" in Europe? Some suggestions from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Sociolinguistica, 8*, 65-72.

Fishman, J.(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Bistol, England: Mutilingual Matters.

Freedman, S.G. (2004, 16 June). On education: After Sputnik it was Russian; After 9/11 should it be Arabic? Retrieved from http://query.nytimes.com/gst/fullpage.html?res=9E03E3DC1E30F935A25755C0A9629C8B63

Friedman, L. Thomas. (2005). *The World Is Flat: The Globalized Worl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Penguin.

Friedman, T. (2005).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Fulbright: Program History. (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us.fulbrightonline.org/about_programhistory.html

Fulbright-Hays Act. Retrieved from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Web site: www.ed.gov/about/offices/list/ope/iegps/fulbrighthaysact.pdf

Global challenges and U.S. higher education. (2003). Coali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the Duke University Web site: http://www.jhfc.duke.edu/ducis/globalchallenges/schedule.html

Grabe, W. (1994b). Foreword. In W. Grabe (Ed.),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14.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pp. vii–xii).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abe, W. (Ed.). (1994a).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14.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addol, D. (2006). *English Next*. British Council. Retrieved from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learning-research-english-next.pdf

Graddol, David. 1997. *The Future of English? UK: The British Council. 2006. English Next*. UK: The British Council.

Hawkins, J.N. & Haro, C.M. (1998). Introduction. In J.N. Hawkins (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global era: Proceedings of a national policy conference on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Title VI, and Fulbright-Hays programs* (pp. 9-16). Los Angeles, CA: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overseas progra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eining-Boynton, A. (Ed.). (2006). *2005-2015: Realizing our vision of languages for all*.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Helliwell, J. F. (1999). Language and trade. In A. Breton (Ed.), *Exploring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pp. 26). Ottawa: Canadian Heritage.

Iwashita, N., Brown, A., McNamara, T., & O'Hagan, S. (2008). Assessed levels of second language speaking proficiency: How distinct? *Applied Linguistics, 29*(1), 24-49.

Jackson, F & Malone, E.(2009). Build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Capacity We Need: Towar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for a National Language Framework,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University of Maryland. Retrieved from http://www.languagepolicy.org/documents/synthesis%20and%20summaryfinal040509_combined.pdf

Jackson, F. H. & Malone, M. E. (2009). *Build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Capacity We Need: Towar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for a National Language Framework*.

Jackson, F. H., & Kaplan, M. A. (2003). Theory and practice in government language teaching. 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Retrieved from www.govtilr.org/Publications/TESOL03ReadingFull.htm

Jensen, J. (2007).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A state language coordinator's perspective.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1*(2), 261-264.

Jensen, J. (2007).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A state language coordinator's perspectiv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1*(2), 261-264.

Jessner, U. (2008). Teaching third languages: Findings, trends and

challenges. *Language Teaching, 41*(1), 15-56.

Jossey-Bass, K. R. & Hornberger,N.H. (1996). Unpeeling the Onion: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and the ELT professional. *TESOL Quarterly, 30*(3),p. 10~36.

Kachru, B. (1990). *The Alchemy of English: The Spread, Functions, and Models of Non-native Englishes*. Chicago: U of Illinois Press.

Lantolf, J. P. (2006). Redefining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light of the concept of languaculture. In H. Byrnes (Ed.), *Advanced language learning* (pp. 72-91). UK: Continuum.

Larsen-Freeman, D. & D. Freeman. (2008). Language moves: The place of languages--foreign and otherwise--i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J. Greene, G. Kelly, and A. Luke (Eds). *Review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Larsen-Freeman, D. (2002). Making sense of frequency.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4*(2), 275-285.

Larsen-Freeman, D. (2007). Reflecting on the cognitive-social debat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1*(5), 773-787.

Larson-Hall, J. (2008). Weighing the benefits of studying a foreign language at younger starting age in a minimal input situatio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4*(1), 35-63.

Laurence, D. (2001) *The 1999 MLA Survey of Staffing in English and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s*. Profession 2001. New York: MLA.

Leaver, B. L. (2002). *Developing professional-level language proficien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aver, B. L. (2003). *Achieving native-like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A catalogue of critical factors* (Volume I: Speaking). MSI Press.

Leaver, B. L., Ehrman, M. E., & Shekhtman, B. (2005). *Achieving succes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Loup, J. W., & Ponterio, R. (2006). Technology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Where we have been, where we are now, where we are headed. In A. Heining-Boynton (Ed.), *2005-2015:*

Realizing our vision of languages for all (pp. 153-74).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Lena, M., & Reason Moll, J. (2000).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profe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 survey and analysis*.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iamkina, O. (2008). Teaching grammatical meaning to advanced learners: A cognitive-semantic perspective. In L. Ortega & H. Byrnes (Eds.), *The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vanced L2 capabilities* (pp. 163-181). New York: Routledge

Littlemore, J., & Low, G. (2006). Metaphoric competence,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 *Applied Linguistics, 27*(2), 268-294.

Liyvinov, A. (2008). Finding our way with words: Adapting to the global age means having a voice in it. Can America's schools break the language barrier? NEAToday, Octob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accessmylibrary.com/coms2/summary_0286-35524011_ITM.

Lo Bianco, Joseph (1987). National Policy on Languages.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pp 1-10, 14-15, 18, 189-203. Retrieved from http://www.multiculturalaustralia.edu.au/doc/lobianco_2.pdf

Lo Bianco, Joseph (1990). Making language policy: Australia's experience in Baldauf, R. B. Jr. and Luke, A. (eds.) Language Planning and Education in Australasia and the South Pacific, (Multilingual Matters 55) Philadelphia, Cleved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multiculturalaustralia.edu.au/doc/lobianco_1.pdf

Lo Bianco, J. (2002). Brief outline of the Australian language policy experience. Paper presented at meeting of the 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November, 2002. Retrieved from http://www.govtilr.org/Publications/ILR_papers01.htm

Lo Bianco, J. (2004). *A site for debate, negotiation and contest of national identity: Language policy in Australia*.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LoCastro, V. (2001). Teaching English to large classes. *TESOL Quarterly, 35*(3), 493-496.

Long, M. H. (2007). *Problems in SLA*.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Macaro, E., & Erler, L. (2008). Raising the achievement of young-beginner readers of French through strategy instruction. *Applied Linguistics, 29*(1), 90-119.

Mackey, A. (2006). Feedback, noticing and instructe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pplied Linguistics, 27*(3), 405-430.

Magnan, S. S. (2008). Perspectives: What is needed for global literacy to become an educational reality? Summary of a discussion group.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2*(4), 628-30.

Malone, M.E., Rifkin, B., Christian, D., & Johnson, D.E. (2005). *Attaining high levels of proficiency: Challenges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US*. Retrieved from ERIC database. Retrieved from http://www.cal.org/resources/digest/digest_pdfs/attain.pdf

Malone, M. E., Rifkin, B., Christian, D., & Johnson, D. E. (2005). Attaining high levels of proficiency: Challenges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US. CAL Digest. Retrieved from http://www.cal.org/resources/digest/digest_pdfs/attain.pdf

McGinn, G. H. (2008). Statement on Language and Cultural Awareness Capabilities in the Military, made to the Committee on House Armed Services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Investigations, September 10, 2008. Retrieved from http://armedservices.house.gov/pdfs/O1091008/McGinn_Testimony091008.pdf

Merkx, G. W. (2006). *Four key programs in title VI and Fulbright-Hays 102(b)(6): NRCs, FLAS fellowships, DDRA and FR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Mills, N., Pajares, F., & Herron, C. (2006). A reevaluation of the role of anxiety: Self-efficacy, anxiety, and their relation to reading and listening proficiency.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39*(2), 276-289.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2010). MLA language map. Retrieved from http://www.mla.org/map_dataanddcwindow=sam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2008). MLA language map. Retrieved from http://www.mla.org/map_dataanddcwindow=same.

Morgan-Short, K., & Bowden, H. W. (2006). Processing instruction and meaningful output-based instruction: Effects on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8*(1), 31-65.

Mori, J. (2007). Border crossings? 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foreign language pedagogy.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1*(5), 849-862.

Moyer, A. (2006). *Language contact and confidence in second languag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 pilot study of advanced learners of German*.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39 (2).

Müller, K. E. (2006). A blueprint for action on language education. In A. Heining-Boynton (Ed.), *2005-2015: Realizing our vision of languages for all* (pp. 39-54).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Myriam Met. (1994).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in U.S. Secondary Schools: Who Decides?* CA: Sage.

NAFS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 (2007). *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for U.S. Leadership, Competitiveness, and Security*. NAFSA.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Boards of Education. (2003). *Ensuring a place for the arts and foreign languages in America's schools. The Complete Curriculum*. Alexandria, VA: NASBE.

National Council of State Supervisors for Languages. (2011). Retrieved from http://www.ncssfl.org/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2011). Retrieved from http://www.nflc.org/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1994-2011). Retrieved from http://nflrc.hawaii.edu/projects.cfm

National K-12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www.cal.org/projects/nflrc.html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7).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s: Keys to securing America's future, Committee to Review the Title VI and Fulbright-Hays International*.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2011). National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actfl.org/i4a/pages/index.cfm?pageid=3392

National Standard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ject (NSFLEP). (1999).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 Lawrence, KS: Allen Press, Inc.

National Standard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ject. (1996). *National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Boards of Education. (2003). The complete curriculum: Introduction and summary recommendations: The importance of the arts and foreign languag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menc.org/documents/legislative/CompleteCurriculumSummary.pdf

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2002). *World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Standards for teachers of students ages 3-18+*. 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National Council for Languag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5). *Languages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Press release.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 (2005). 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lconference.org/docs/White_Paper.pdf.

National Standard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ject. (1996).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Lawrence, KS: Allen Press, Inc.

Noden, P., & Schagen, I. (2006). The Specialist Schools Programme: Golden Goose or Conjuring Trick?.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32*(4), 431-448.

Norris, J. M. (2006a). Assessing advance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learners: From measurement constructs to educational uses. In H. Byrnes, H.D. Weger-Guntharp, & K. Sprang (Eds.),

Educating for advanced foreign language capacities (pp167-87).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Norris, J. M. (2006b). The why (and how) of assessing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in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s.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0*(4), 576-583.

Norris, J. M., & Ortega, L. (2000). Effectiveness of L2 instruction: A research synthesis and quantitative meta-analysis. *Language Learning, 50*(3), 417-52.

Norris, J. M., & Pfeiffer, P. C. (2003). Exploring the use and usefulness of ACTFL oral proficiency ratings and standards in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s.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36, 572-581.

O'Brien, I., Segalowitz, N., Freed, B., & Collentine, J. (2007). Phonological memory predicts second language oral fluency gains in adult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9*(4), 557-582.

O'Connell, M. E., & Norwood, J. (Eds.). (2007).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s: Keys to securing America's future*.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Oleksak, R. (2007). *Ensuring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by building language capacity in the schools*.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Ortega, L., & Byrnes, H. (2008) (Eds.). *The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vanced L2 capabil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Panetta, L.E. (1999).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f "scandalous"in the 20th century, what will it be in the 21st centur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anford.edu/dept/lc/language/about/conferencepapers/panettapaper.pdf

Paribakht, T. S., & Wesche, M. (2006). Lexical inferencing in L1 and L2: Implications for vocabulary instruction and learning at advanced levels. In H. Byrnes, H.D. Weger-Guntharp, & K. Sprang (Eds.), *Educating for advanced foreign language capacities* (pp. 118-35).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Pavlenko, A. (2006). Narrative competence in a second language. In

H. Byrnes, H.D. Weger-Guntharp, & K. Sprang (Eds.), *Educating for advanced foreign language capacities* (pp. 105-17).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Payne, J. S., & Whitney, P. J. (2002). Developing L2 oral proficiency through synchronous CMC: Output, working memory and interlanguage development. *CALICO Journal, 20*(1), 7-32.

Petro, M. (2007). *Testimony on national language needs to the senat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the Federal Workforce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Phillips, J.K. (1998). *What Does It Mean to Know a Foreign Language?: A Framework for Instruction*.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hillips, J.K. (1994). State and local policy on the study of world languages. In R.D. Lambert (Ed.).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An agenda for change. Special Issue of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p. 88-98). M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Phillips, J. K. (2008). *Foreign language standards and the contexts of communication. Language Teaching*, 41(1).

Pochhacker, F. (2003).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Routledge.

Pochhacker, F. (Ed.)(2001).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Pratt, M. L. (2004). Building a new public idea about language. Retrieved from http://www.govtilr.org/Publications/Prof_Pratt.htm.

Pratt, M. L., et al. (2008). The issue: Transforming college and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s.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2*(2), 287-292.

Pufahl, I., Rhodes, N. C., Christian, D. (2000).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W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Learn from Other Countries*. ERIC Clearinghouse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Report.

Rhodes, N. & Christian, D. (2002).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6*(4), 615-616.

Rhodes, N. C., & Branaman, L. E. (1999).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ational survey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ashington, DC, and McHenry, IL: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Delta Systems.

Ricardo-Osorio, J.G.(2008). *A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outcomes assessment in U.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Richards, J. C., & Schmidt, R.(2010). *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4th ed.)*. London: Longman (Pearson Education).

Richards, J. C.(2008). Second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today. *RELC Journal, 39*(2), 158-77.

Rifkin, B. (2005). A ceiling effect in traditional classroom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Data from Russian.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9*(1), 3-18.

Rivera, G. M., & Matsuzawa, C. (2007). Multiple-language program assessment: Learners' perspectives on first- and second-year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rogram improvement.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40*(4), 569-583.

Robinson, D. H.(2003). Becoming a Translat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Robinson, J. P., Rivers, W. P., & Brecht, R. D. (2006). Speaking foreign langu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rrelates, trends and possible consequences.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0*(4), 457-472.

Robinson, P., & Ellis, N. (Eds.). (2008).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Robinson, R. (2005). Cognitive abilities, chunk-strength, and frequency effects in implicit artificial grammar and incidental L2 learning: Replications of Reber, Walkenfeld, and Hernstadt 1991 and Knowlton and Squire 1996 and their relevance for SLA.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7*(2), 235-268.

Rott, S. (2007). The effect of frequency of input-enhancements on word learning and text comprehension. *Language Learning, 57*(2), 165-199.

Ruther, N. L. (2003). *The international and foreign language human capital challenge of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Paper

presented at Duke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Glob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ajavaara, K., Lambert, R. D., Takala, S., & Morfit, C. A. (Eds.). (1993).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planning: Practices and prospects. Jyväskylä, Finland: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Sato, C. (2007). Learning from weaknesses in teaching about culture: The case study of a Japanese school abroad.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18*(5), 445-453.

Sauro, S. (2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casts and metalinguistic feedback through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L2 knowledge and production accuracy.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avage, R. (1994). *Policies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v. ed.). Brussels, Belgium: European Commission, Task Force on Human Resources, Education, Training and Youth*.

Sawyer, D. B. (2004). *Fundamental aspects of interpreter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Scarfo, R. D. (1998). The history of Title VI and Fulbright-Hays. In J.N. Hawkins (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Global Era: Proceedings of a National Policy Conference on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Title VI, and Fulbright-Hays Programs* (pp. 23-25). Los Angeles, CA: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overseas progra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chmidt, R. (2008).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or a framework for a national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2*, 621-623.

Schmidt, R. (2008). Perspectives: National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or a national language education framework? Summary of a discussion group.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2*(4), 621-2.

Scott, R.A. (2003). *Many calls, little action: Global illite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 College Park, MD. Retrieved from http://www.nlconference.org/docs/For_Lang_Pres_Speech.pdf

Scott, R. A. (2003). *Many calls, little action: Global illite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Paper presented at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 College Park, MD. Retrieved from http://www.nlconference.org/docs/For_Lang_Pres_Speech.pdf

Segalowitz, N., & Freed, B. F. (2004). Context, contact, and cognition in oral fluency acquisition: Learning Spanish in at home and study abroad context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6*(2), 173-199.

Shekary, M., & Tahririan, M. H. (2006). Negotiation of meaning and noticing in text-based online chat.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0*(4), 557-573.

Siek-Piskozub, T., Wach, A., & Raulinajtys, A. (2008). Research 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Poland 2000-2006. *Language Teaching, 41*(1), 57-92.

Skutnabb-Kangas, T. (1996). Educational Language Choice—Multilingual Diversity or Monolingual Reductionism? In M. Hellinger & U. Ammon (Eds.), *Contrastive sociolinguistics: Part III.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tic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Spenader, A. J. (2008). Acquiring oral language skills over the course of a high school year abroad. In L. Ortega & H. Byrnes (Eds.), *The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vanced capabilities* (pp. 247-263). New York: Routledge.

Stubbs, M. (1995). Foreword. In C. Brumfit (Ed.),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pp. vii–ix).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wain, M. (2006). Languaging, agency and collaboration in advanced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H. Byrnes (Ed.), *Advanced language learning* (pp. 95-108). UK: Continuum.

Swain, M., & Deters, P. (2007). New mainstream SLA theory: Expanded and enriched.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1*(5), 820-836.

Swender, E. (2003). Oral proficiency testing in the real world: Answers to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36*(4), 520-526.

Taguchi, N. (2008b). Longitudinal gain of higher-order inferential abilities in L2 English. In L. Ortega & H. Byrnes (Eds.), *The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vanced L2 capabilities* (pp. 203-222). New York: Routledge.

Taguchi, N. (2008a). Cognition, language contac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 comprehension in a study-abroad context. *Language Learning, 58*(1), 33-71.

Takala, S. (1998). Language teaching policy effects a case study of Finland. In Jacek Fisiak (Ed.), *Studia Anglica Posniensia Vol. 33. Festschrift for Kari Sajavaara* (pp. 421-430). Poznan, Poland: 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The National Academies. (2007). [Congressional Brief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s: Keys to securing America's future. Retrieved from http://www7.ationalacademies.org/ocga/briefings/International_Education_and_Foreign_Languages.asp

Thompson, R. T. (1980). New directions in foreign language study. In R.D. Lambert (Ed.). *New direction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p. 45-55).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Thorne, S.L., & J. Reinhardt. (2007). Technologies for advanced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Position paper: Center for Advanced Language Proficienc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he Pennsyvania State University.

Thorne, S. L. & Black, R. (2007). Language and literacy development in computer-mediated contexts and communities.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7*, 133-160.

Tollefson, J. W. (1991). *Planning language, planning inequality: Language Policy in the community*. Harlow, England: Longman.

Tollefson, J.W. (Ed.) (2002). *Language policies in education: Critical issue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Tragant, E. (2006).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ge. In C. Munoz (Ed.), *Age and the rate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pp. 237-276).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Trim, J. L. M. (1994). Some factors influencing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policymaking in Europe. In R. D. Lambert (Ed.), *Language planning around the world: Contexts and systemic change* (pp. 1–16). Washington, DC: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at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sao, Feng-fu (2008). 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Taiwan with an Update. In Kaplan, R. B. and Richard B. Baldauf Jr. (eds.) *Language Planning & Policy in Asia, Vol.1: Japan, Nepal and Taiwan and Chinese Characters* (pp.237-300). Bristol,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Tucker, G. R., & Donato, R. (2001). *Implementing a district-wide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 A case study on acquisition planning and curricular innovation*. Retrieved from ERIC database. (EDO-FL-01-03).

Tyler, A. (2008).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 In P. Robinson & N.C. Ellis (Eds.),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 456-88).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d.) Foreign language assistance program (FLAP). Retrieved from http://www.ed.gov/programs/flap/index.html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4). *Language continuum*.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2002). Foreign languages:Human capital approach needed to correct staffing and proficiency shortfalls. GAO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requesters. Retrieved from http://www.gao.gov/search?q=foreign+languages&Submit=Search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2002, January). Foreign languages: Human capital approach needed to correct staffing and proficiency shortfalls.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Retrieved from http://www.gao.gov/new.items/d02375.pdf

Van Houten, J. (2006). Turning a new light on assessment with LinguaFolio. *Learning Languages, 12*(1), 7-11.

Van Houten, J. (2006). Turning a new light on assessment with LinguaFolio. *Learning Languages, 7*(1), 7-11.

Verspoor, M., & Cremer, M. (2008). Research on foreign-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Netherlands (2002-2006). *Language Teaching, 41*(2), 183-211.

Von Stutterheim, C., & Carroll, M. (2006). The impact of grammatical temporal categories on ultimate attainment in L2

learning. In H. Byrnes, H.D. Weger-Guntharp,& K. Sprang (Eds.), *Educating for advanced foreign language capacities* (pp. 40-53).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Eggington, W. J. & Hall, K. (2000). *The Sociopolitics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Bristol,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Wadensjo, C., Dimitrova, B.E. & Nilsson, A. L. (2007). *The Critical Link 4: Professionalization of interpreting in the community*. John Benjamins.

Wallraff, B. (2000). What global language? Atlantic Monthly, November. 52-66.Webb, S. (2007). The effects of repetition on vocabulary knowledge. *Applied Linguistics, 28*(1), 46-65.

Webb, S. (2008). Receptive and productive vocabulary sizes of L2 learner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30*(1), 79-95.

Weber, W. K. (1990). Interpre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 In R. D. Lambert & S. J. Moore (Eds.), *Foreign language in the workplace: Special Issue of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p. 145-59).

Welles, E. (2004). Foreign Language Enrollments 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DFL Bulletin* (35).

Welles, E. B. (2003). Foreign Language Enrollments 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DFL Bulletin.

Wilbur, M. L. (2007). How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get taught: Methods of teaching the methods course.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40*(1), 79-101.

Yankelovich, D. (2005). Ferment and Change: Higher Education in 2015.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52*(14).

Zimmer-Lowe, H. (2008). Perspectives: An audacious goal: Recruiting, preparing, and retaining high-quality language teachers in the 21st century.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2*(4), 625-28.

日文參考資料

古賀範理(2002)「日本における外国語教育政策の現状と問題点」久留米大学外国語教育研究所 9，1-20.

加藤浩三(2009)「グローバル化と日本の英語政策」『上智法学論集』第 52 巻 3 号，137-170．

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2004)「外国語のカリキュラムの改善に関する研究－諸外国の動向－」『教科等の構成と開発に関する調査研究研究成果報告書』21，125－166．

斉藤光代(2005)「マレーシアにおける言語政策についての考察」『融合文化研究』第 5 号，204－219．

平尾節子(2001)「フィリピン共和国における言語教育政策」『言語と文化』5，愛知大学，13－35．

宮奥正道(2006)「マレーシアとシンガポールにおける言語政策」『独立行政法人国立高等専門学校機構大島商船高等専門学校紀要』第 39 号，110-120．

文部科学省(2010)「国際共通語としての英語力向上のための 5 つの提言と具体的施策～英語を学ぶ意欲と使う機会の充実を通じた確か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の育成に向けて～」(本文・概要)

森山卓郎・梅原大輔・森 篤嗣・冨永英夫・濱本秀樹・加藤久雄(2009)「『外国語活動』に向けて ： タイにおける初等中等学校の英語教育が示唆するもの 」『京都教育大学紀要』115，47－61．

附錄一 學者專家座談會紀錄

一、座談會主題

1. 因應今日國際化激烈競爭的環境需求，我國國家外語政策應有之核心價值與政策主張。
2. 我國成立外語政策及教育的相關學院或中心的定位與可行性，以統籌外語政策擬訂、外語策略執行、外語專業人才培育、與外語研究發展等。
3. 英語在外語政策之定位，應視爲官方國際語言，或是比照新加坡、香港等地視英語爲第二官方語言。
4. 其他外國語言在我國所扮演之角色。
5. 外語教育與我國多語言社會的關係。
6. 英語爲國際語(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在我國外語教育之定位。

二、計畫主持人及與會者

1. 主持人：戴浩一 (計畫主持人，國立中正大學講座教授)
2. 與會人員：林麗菊(計畫協同主持人，國立中正大學語言中心主任)、李佳家(研究助理)、王立仁(研究助理)
3. 列席人員：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代表 林嘉琪(科長)、辜煜偉(專員)、Andrew de Silva (internship)
4. 紀錄：王恬恬(研究助理)、許潔心(研究助理)

三、參與座談會學者專家

時間	地點	參與者
100年 7月7日	中正大學 台北 聯絡處	1. 李振清(前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現任世新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2. 于乃明(國立政治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3. 曹逢甫(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4. 衛友賢(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 5. 黃美金(前台師大英語系系主任，現任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教授) 6. 李文瑞(前文藻外語學院校長，現任文藻外語學院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教授) 7. 賴俊雄(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 8. 黃孟蘭(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100年 7月28日	中正大學	1. 曾守得(前彰師大英語系教授兼教務長，現任靜宜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2. 王儀君(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3. 葉淑華(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教授) 4. 沈添鉦(前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主任，現任南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系主任) 5. 劉慶剛(國立臺北大學語言中心主任) 6. 蔡素娟(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院長) 7.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系主任)

四、座談會紀錄：逐字稿摘要

發言者：曹逢甫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我覺得第一點，最重要的是要營造使用英語的環境，我想關於任何語言，唯一的真理是，語言一定要用才會存在，不要用就不會存在，你沒有讓他有使用的環境，他就不會繼續發展下去。一個語言一定要讓他有使用的環境，他才會能夠繼續在這個地方發展下去，沒有使用的環境大概都很難，完全靠學校裡頭學的，那是很有限的。即使像現在我們這樣子教英語，就詞彙量的話，國中念到畢業的話可以學到一千兩百個字，到了高中一課五十個生字，一年能夠教多少？三十課，一千五百個生字，三年，四千五百個生字，一千兩百個加上四千五百個生字，也不過五千多個生字，如果真的是把在學校裡頭教這些東西，教的每個字都學得很好，那也不過是五千多個生字而已，五千多個生字如何拿來看大學的教科書？大學的教科書，我的估計大概是一萬五到兩萬的字彙，當然不見得要每個字都懂才能閱讀。你自己個人的語言能力也是如此，除了你的母語，因爲已經跟你太久了，你想要忘記都有點困難。不過話雖說如此，母語久不用也會顯得生疏，說起來吃力。你可 expect 你的學生在這種教育體系之下，高中畢業就能有能力去上大學嗎？這個恐怕是不太可能的，而且這個還是說老師教你一次你就學會了。沒有這種事情的，根據專家的研究，一個字到學會爲止至少要有 sixteen 左右的 exposures，要讓一個人能夠使用十六次以上，他才有希望能夠把這個字學會，能夠拿來運用，所以無論如何一定要設法去製造環境，讓他能夠去充分的使用這個語言。

我再補充一點，我會覺得語言教育本身應該區分兩個很重要的東西，一個是你把語言當作普羅教育，還是當作一個精英的教育，我想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很重要的考量是說如果你現在是需要頂尖人才的話，像我們現在這種設計是很難達成的。我們現在編教科書完全根據教育部制訂的課綱。我們訂課綱的精神完全是一種齊頭式平等的訂法，以這種精神編出來的教科書是沒辦法訓練出頂尖人才

的。因爲光拿詞彙量來講頂尖人才所要求的量恐怕要比別人大到兩三倍以上，因此，我會覺得我們總該想一個辦法，讓普羅教育跟精英教育在外語教育裡頭能夠取得某一種平衡，讓他兩個都能夠並行，要不然你不太可能訓練出頂尖人才的，即使在香港的情形下，香港裡頭不懂英文的還是一籮筐。新加坡的這種情況，你也不太可能說全民都要提升他們的英語能力到一定的程度，新加坡的英文文盲我相信還是有，那一般的只會說兩句英文或者只會 Singlish 的人也很多，但是當然在整個講起來他們的英文能力比我們高，尤其是在比較高級一點的英文表現上面是比我們好。

建議還是要在財力能夠支付的情形之下，應該還是要建立一個全外語的電視台，在我當時提出來的時候，事實上連 Russia 都已經成立了一個國家英語電視台，以前這個 Russia，是非常不願意教英文的，現在逼於現實也不得不這麼做。日本的 NHK 也已有一個英語頻道，中國大陸也是去年、前年就開始有一個全英語的電視台。所以我覺得另一個部分當然不一定是全英語的，也可以附有一些別的外語，但是最主要的節目還是要回歸到英語的節目。然後我也建議要多出版雙語的雜誌等等。政府如果要扶植的話，應該也要掏腰包出來，即使說不賺錢，還是應該要做。像這個光華，我就覺得光華產生了不少的效應，我們最近在考慮建立一個中英雙語的語料庫，那其實就光華雜誌來講，已經有人把它納入 corpus 裡頭去了，當然也有人說這個光華的英文不夠地道，但是這已經是我們所能夠取得的最好的資訊了。

外國人到台灣來，或者說他跟你要進行國際交流的時候，他最感興趣的是什麼？那我們這一邊的這個學英語，大家共同的寄予厚望的東西，就是希望我們能夠得到，比如說最新的科技的方面的資訊，得到一些重要的 information，或者是得到這種知識，語言可以去獲取最新的 information。可是從他們的角度來講，他們對這個不是很有興趣的，他們想要知道的多半都是關於我們的此地的文化的一些東西、這裡的社會現象跟文化的了解，所以我們的學生學外語自然

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有能力把我們自己的東西介紹給外國人，我想這一點就是說往往是在這個裡頭，就是我們單方向的來看的時候經常忽略的一點。

我們其實在努力教英語發展國際化的同時也要發展我們自己本地的文化，還有像華語教學等等的領域，才能夠吸引外國的學生到我們這裡來，那這樣子雙向的交流才有可能。

發言者：黃美金教授(前台師大英語系系主任，現任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教授)

今天討論的第一個議題就是談到外語政策應有的核心價值。台灣是一個島嶼，我覺得外語教育事實上就是使台灣不要成爲一個孤島，台灣的人民具有外語能力，就能夠走得出去，跟國際人士能夠交往，同時也讓外籍人士能夠進到台灣來，有一個很好的外語環境，讓他們覺得台灣是一個 friendly 的 environment，他們就願意來。

建議要有一個全外語的電視台，並不是要播放外國影片，而是以外語教學、外語教育爲主，如此在正規教育體制外，社會大眾想學英文就多了一個管道。當然現在已經有好多英語教學廣播節目，但事實上有一個影像看的話，學習者會感到更生動有趣、更想學，所以過去彭蒙惠的空中英語教室，目前也已經在電視台裡面播放。只是電視台裡面播放英語、外語教學節目都是片段而已，如果今天有這麼一個專門、專屬的外語電視台，而且是以教學爲主，在不同的時段播放不同的外語，民眾想學哪一個外語，就可以有這樣的管道去學。所以在正規的教育體制外，在公共傳播媒體裡面有這麼一個管道，其實是可以更有效地幫助大眾學習自己想學的外語。

另外，我們大家都知道外語師資的問題，長久以來都存在著，特別是英文師資方面。目前英文是從小學就開始學習，第二外語是從高中開始學習，師資不夠或師資不稱職，都是今天要重視的問題。國內這麼多大學都設有英語相關系所，所以英語師資的培育，可能可以由這些系所再多著力一點。至於第二外語，就像剛剛李振清老師

講的，國內有這麼多好的外語學院，今天這麼多好的外語學院院長也都在現場，有日語、法語等等，也許第二外語師資的培育，就要仰賴這些外語學院協助。也就是說從正規教育體制下，外語人才的培育，特別是師資這一塊，就應由這些學校學院系所來共同努力。英、外語師資的培育如果能有更周詳的規劃，雖然今日已沒有辦法走回到過去的師範體制，但相關單位能夠對外語師資的培育再更重視一點，可能就可以協助我們讓小學的英語教育導入正途。更何況現在幼稚園也在推雙語教育。天天都在教孩子用英文表現。這裡我們所關心的仍是這些幼教英語師資的培育，因爲孩子越小學習外語，若沒有好的師資帶的話，我想以後要導正可能就更難了。

所以討論這個議題有兩個層面，一個是非正規教育體制下，電視台及廣播電台也許可以協助提供一般民眾學習英、外語的機會，而正規教育體制下，教育部若能夠更重視師資培育的問題，結合各大學相關的系所及學院，也許可以把英、外語師資培育這一部分做得更好。

我想了解這些議題及現象後，一定要認清我們不是在建議要把英文當作是官方語言，另外，站在我的立場，我更不樂見把英語當作是官方語言，原因在於第五個議題「外語教育跟我國多語言社會的關係」所探討的。我真的太關心我們的本土語言，這些本土語言即使在九年一貫教育推動下，表面上好像是能在正規教育體制下教學，但九年一貫將近十年，本土語言教學成效非常不彰，有時我們甚至都覺得這樣的本土語言教育彷彿在扼殺更多的弱勢語言。所以我建議在相關的場合還是要保護本土語言，一定要讓這些語言有一個生存空間，否則這個多語言的大環境、這個美麗的寶島，最後可能會因內外夾攻之情勢，不僅本土語言消失，進來的外語也長得不好，形成更多、更大的問題，所以我想相關部門對第五個議題「外語教育跟我國多語言社會的關係」，應該要更審慎的去考量所有相關的問題，教育部在北、中、南區，不確定東區有沒有，設有教學資源中心，裏面其實就有類似這樣分享的一些平台及機制。

發言者：衛友賢教授(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

其實有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la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Obama campaigning 有一天在 campaign 說，廣播電台聽到說，鼓勵美國大學或者是美國的年輕人學外語，他過三天就收回來這句話，因爲人家不接受這個價值觀。

所以你看台灣哪裡會有這方面的，所以這個整個生態已經跟台灣非常健康，大家不會懷疑這個價值，在美國你要說服人家學外語是值得投入的一件事情，那台灣就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一個共同價值觀，我們覺得應該好好珍惜這個生態，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這方面在台灣，我覺得是對語言教學這方面，這個基礎是很好，雖然我們很關心效果，可是我覺得可以是點金石是非常難得。

價值觀或是核心價值開始，提幾個重點，比如說關心本地的語言，這個真的需要我們去主動地去關心的，跟外語，聽起來可能有點矛盾，所以我想是不是有一個看法是不會衝突是不是矛盾的，我想的其中一個切入點是說，我們也希望台灣可以在華語教學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就是由我們可以做得到的一個地方看能不能再努力。那我自己是個例子是來台灣不是偶然的，就是大學的時候來開始，然後真的是非常投入，爲了台灣的對外國人的，給我們一個學習環境那麼好，然後文化等等，都是很珍惜這個機會，那這種來台灣的外國人是不少，其實不算非常多，可是算一個 special population，特地從那麼遠的地方來，願意學習，是非常 special population，那來的時候也是對台灣的文化、亞洲的文化等等很有興趣，那剛開始還沒有學得那麼好之前他要介紹，就是要經過外文，

所以我們的學生，我覺得一直希望他可以用外文講什麼，不一定是外國來的東西可以用外文講本地的東西，而且他有一個目標，如果他可以知道國外的人對這些文化或是日常生活或是傳統文化等等的，不管是都好，他有一個任務，就是他可以用外文，可能主要是英文或別的外文，介紹台灣的文化給好奇的外國人聽，是一個非常

有價值的而且很實際的動機，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有辦法，把這兩個加起來，外文不是，學外文變成崇洋的一個態度，都是看外國的內容為了學外文，滿可惜，也是很好，學習外國的文化，外國的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不要犧牲自己的母文化的珍惜，我覺得可以同時，然後我們可以看怎麼落實。

我分享一個例子，我在中央的語言中心的時候，數學系的教授，單維彰教授，請我跟他，我幫他的一個碩士論文的學生的 leader 的一個口試委員，那我分享一下，結果非常有趣，他是分析中央大學的低修微積分的課，理工學生需要修微積分，是分析各種的因素影響他們大一的微積分的成績，所有想的到的什麼因素都算進去，作為一個統計，發現比如說，有考慮一部分是他入學的聯考，所謂的聯考是指考的成績，每一科的成績，等等其他的因素都算，決定學生的微積分的大一的成績最強的是他入學的數學成績嗎?不是，英文成績，他的英文成績比數學成績還強，那個 correlation 還強。

所以剛剛有幾位提到他們吸收外語的原文的課本，英文對他們，所以我講的是說學外文不是為了外文能力而已，是吸收非常多知識的門檻，沒有這個，真的是把很多知識或是學習的機會是，那個機會的窗戶關起來了，所以我覺得我們很多在場的可能是不像我需要一直說服我的單位，這個夠投資的、該投資的地方，那這是一個 internal investment。這個 internal investment 不只是他的外文能力而已。

我們也觀察到這些學生，如果我們說高等教育，比如說在大學，舉個例子來說，很多是沒有辦法像文藻那麼典範或是政治大學那麼，我們的模範的單位可以那麼投入，可是這個 payback 也是絕對的，那有這麼一天我們中央的行政大樓的某一位問我，我是在語言中心的時候，他說文藻做外文教學那麼好，變成那麼有名，為什麼中央不行？那我就說你給我三十六個英文必修學分我們就努力看看。

這是我實際的一個例子，可是我覺得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價值是說，單位要看出一個成果，真的要願意投入，給我們壓力要一

個成果，可是不投入該投入的，謝謝政治大學跟文藻，還有師大也是，是該投入的地方都投入，我們有很多例子可以提的，不是光想、光講的，所以我覺得這是很關鍵。

聽到于院長也提到學生的語言能力，打開很多這個 career path，他可以未來的職業上，那其實我們看，不一定是從一個外語學院或是文學院的，比如說法文系、英文系的，不一定是他是以外文系畢業，然後才有這個外文能力我們都知道，可是我從以文學院的角度一直要往外看說，其實不要小看我們文學院或是外語學院來畢業的學生可以以後走的路，比如說有一個例子，美國的文學院的，liberal arts colleges，來的是財經的公司來找，你的背景是歷史、語言甚麼的我要你，因爲剛剛提到，我來到這裡，我可以用半年教你財經，可是你的語言或者是溝通能力，我沒有辦法，所以我希望你已經有這些準備，然後我額外教你其他的專業，是比較划算，我覺得這個觀點，我們可能台灣是比較傳統，你念什麼應該是走那條路，可是如果四年是一個準備，文學院你說那個準備是爲了 anything，get ready for anything，可能加兩年、三年就可以變成專業人士，比如說我可能是美國文化的影響，美國沒有一個 law department undergraduate，你有一個大學部的，可能一個念法律的，你念別的，那畢業以後你給我兩、三年，你可以變成律師、你可以變成 MBA，你可以變成什麼，所以我覺得這個語言或是人文本身，或是語言是一個基礎，打好了以後，我的比喻是說，讓我們的學生的土非常肥沃，那你種什麼都會長得非常好，不是一直擺花盆，一直要澆水，不是一直擺花盆，是把那個土弄得非常肥沃，然後種什麼，以後換行，其實不是換行，是從語言的基礎來開始，很多路可以走。

其實我覺得關鍵在外文的教學或是學習，秘訣是什麼？爲什麼我們一直覺得十年後、二十年後還是繼續談同樣的問題？那新加坡、香港爲什麼做得比我們理想等等，我認爲是很複雜，而且複雜完全超過我們的理解，我那麼多年，比如說在高中也是跟老師們落實一些英文的學習的心得，心得是說非常多年成功的例子，那他們成功的

原因也都不一樣，可能跟他們原來的學校的生態非常有密切的關係，那換到別的學校可能不會那麼容易成功，因爲生態也變，所以我覺得政府可以考慮一種比較研究 best practice，我不是說我已經知道怎麼做最好，然後我去面試，可能是那個學習的態度，去找成功的例子，而且那個成功不一定百分百，某一方面是成功的，比如說有一個初中某一班某一個老師的學生敢開口，那個在台灣真的是難得，敢開口，可能考試文法不是那麼好，可是敢開口，或是講得流利，請這個老師有一個平台，可以跟別的老師分享，那可能很多秘訣是跟學校的生態有符合，然後他自己教學的厲害等等，可是我覺得整體，那另外一個老師可能他的學生上癮閱讀英文，那怎麼做到這種事情，可能很多老師覺得，我的學生根本不想看英文，那某幾位老師對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不是說怎麼包裝 formula 去勉強別的老師做，不是，就是給這位老師，或這個團隊一個平台，然後一個尊重，我覺得優秀的老師有一個平台、有一個資源可以非常方便分享，或是跟別的老師接觸，然後別的老師很容易吸收，或是挑某一塊是他想 try，然後新的老師，可能他們的那個學校沒有那麼理想的一個生態，那讓校長、行政單位也來那個學習的態度說那你需要什麼，在行政方面需要什麼資源才會成功。

哪裡需要行政的支援，讓相關的人也來聽、學習，這種平台，然後隨時會有新的成功的例子出來，很靈活的，不一定是要包裝變成全國都走這一塊，有興趣的老師符合他的個性、符合他的哲學，可以吸收、可以落實，可以得到一種 community，有挫折馬上有一個，另外一個附近的老師可以安慰或是溝通，就是不會讓他放棄，類似一個平台。

這個價值方面我覺得很多，比如說我們要考慮 social context，整個 social context，我們今天也很多提到重要性，其中我想到 Singapore, Hong Kong 跟我們不一樣的是說，多元的文化或是歷史上，他們出門爲了基本的溝通，一定要找一個共同的語言，而且這個不是華語，是英文，因爲歷史的因素。我們跟 Singapore 這一方面是不一樣，所

以我們不要要求自己一直有挫折感，趕不上，因爲 social context 本來就沒有給我們這個生態，可是我們可以模擬一下這個 social context。

也聽到一些很多資源，比如說政大這邊有那麼好的，那麼多語言的，我也聽了也很想學學習，我覺得我們可以考慮一些 open courseware 的方式，比如說一門課那麼難支援，那政大那麼難得做得到幾個語言可以做，可是有沒有可能別的學校也有學生想學習，可是不可能開一門課或是找到老師，可是如果政大願意有另類的方式，讓 open course，那可能會在自己的單位也受到一種肯定。就是說這個那麼有吸引力，那外面的學校也會受到一個更大的機會，那看那個怎麼分享或怎麼支援都可以談，可是就是 share new resources 的一個可能，特別是比較少數語言的方面，可以更考慮。其實曹教授剛剛提到這個我覺得真的是關鍵。

以前我在某個系教書，訪問一些學生要出國，其實是考他們的英文夠不夠出國，可是我們會問的是：你有十分鐘或是你有一天可以帶一個來台灣的，看什麼？是什麼？這是他們問到最難回答的問題。因爲他們英文非常好，可是說你有一天可以帶誰在台灣哪裡，他們有的是英文很有利可是不可開口說這方面的話，所以我覺得我一個比喻是說，魚是最不了解水，因爲對他來說是無所不在，那牠需要離開水才發現他的，像我回我的家鄉也是，我長大就不曉得他是鐵路的歷史上很有利，所以我覺得我們學生這個還沒有一個對比，如果他出去，我說從台灣出去最大的價值不是看國外，是發現國內的存在，而且我補充一點，我們學校跟很多學校是關心怎麼提高國際生來學的學位或是交換，可是我一直從文學院的角度說，而且他強調要吸引好的學生。例如，德國有一個學物理的學生，學的很好，他是好學生，爲什麼要從德國跑到台灣學物理呢？可是如果他對文化或是亞洲或是文化的比較或是語言有興趣，你真的可以吸引非常好的學生來台灣念，所以我覺得語言方面是真的是水準吸引的國際生來的水準也是吸引力的一點，另外是我們的學生遇到他，真的是

你在國外碰到一個自己某一個國家來的學生，我們判斷這些學生，不是說他多了解，比如說我們在美國念的時候遇到，不是他多了解美國，他多有力的可以跟你介紹他自己的國家，讓我們聽懂的語言來講，就是發現這個學生那麼有水準，所以我們這方面怎麼努力，是語言跟文化加起來是很，外文跟本地的文化是可以做的。

我覺得一個很具體的關鍵，小學取消成績，一直到國中才開始考，因為我的女兒的例子，我跟她用英文溝通沒有問題，她跟我說 daddy 我的英文不好，我說妳怎麼會這樣覺得？因為在學校考試就是背單字的，她的大概我沒有投入在這裡，可是她的英文我怎麼說就會，聽不懂，所以我覺得那個學生遇到挫折感那麼早，是本身是一個害，不是一個幫助，所以英文接受或是情感等等都要有的話，我覺得最具體的就是前三、四年不要有成績，就是讓她很愉快的去接觸這個。

發言者：沈添鉦教授(前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主任，現任南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系主任)

剛剛一開始在講說這個由上而下、由下而上這個政策推動。剛剛說或許這兩個程序應該都是要有的。就是上頭從比較，這種政府方面，有這種政策，有比較強勢的一些規劃跟投入，這個作為出來之後。那再配合，就是說整個社會、學校、社區這樣子來提升我們整個國家或者國民的外語的能力。

比如說，我是覺得說說，我們的，就學習來講，我們的社會裡頭，這種語言使用，這是一個這是很缺乏語言使用的這種環境，我們說外語使用那當然我們說我們本身在我們台灣這邊，所有的外語既然是外語的話，你說要在我們環境裡頭去使用，這個是很困難的。但是如果說我們政府如果說真是要去提升我們整個全國這種國民的這種不管是說英文還是說外語方面的這種素養那應該就要創造這樣的環境，這種環境如果說要由基層去創造的話是很困難的，因為他沒有那個資源也沒有權力，但是如果從高層來開始設計作規劃，來創造這種環境的話，我想這語言學習，跟整個社會的這種語言使用能

夠接軌，我相信所以這是可以相得益彰，讓整個我們的外語的水平就是應該是有很大的幫助。

第二個就是我想說我們比較缺乏教育由上而下的這個部分，大家沒有一個很清楚的共識，或者說其實有一些共識了，但是真正要去執行的時候又有很多的問題。我們整個國家的語言政策，或者是在底下的這種外語的政策，如果說我們純粹只是大家做討論，沒有辦法成立一個比較有強而有力的這種規劃跟執行的。如果你要成立一個類似教育研究院或者說國家衛生研究院規格，位階跟它的功能，我們可以這樣去思考的時候。那當然不希望說像那個教育研究院這樣，那麼久的時間。從比較實際的，或者說語言使用的，或者說這種學習各種的成本。如果說如果有一個由上而下、由下而上這樣子兩方面去搭配的話，那或許能夠讓整個語言的學習，怎麼樣提升國民的外語能力。

說這核心價值，當然語言其實基本上就是一種資源， 把它當作一種資源，而不是一種身分的表徵，因爲如果當一種身分的話，就會討論「你是到底是哪裡人」或「爲什麼你要這個母語」，或「本國語言都還沒有學好」等議題。這樣其實又會再兜一個圈子，但是如果是把它當作一個比較，語言是一種資源、它是一種認知的，一種文化，或者說各種比較務實的，就是個人競爭力的提升，外語就是一種資源。我們能夠從整個國際化的觀點去看，將英語或是說其他的外語當作一種個人的一種資源的話，其實這是一個值得去追求的國家整體目標。

在政策制訂方面，宜兼顧學理與實務，依據國家目標，制訂政策，引導外語教育、學習、評量，朝向優質、有效的方向與策略發展。在教育訓練方面，宜以高階外語專業人才訓練爲主要任務，並與現有的高等教育及民間外語專業訓練機構進行垂直的分工與整合。在研究發展方面，宜針對國家之外語政策所亟需之學理、論述、資料、國內外之第二語言現況與發展等主題，進行大型之整合型研究，以

奠定政策的基礎。

有關英語爲第二官方語言之議題，台灣不具類似新加坡的英語歷史及語言的背景，因此推動本政策的初期必須面對英語人才有限、資源不足、因擠壓其他語種而引起反彈等各種挑戰。但是如果國際化及培養世界公民是國家重大發展目標，則政府必須有大膽、前瞻的規劃，制訂長遠、具體可行的策略，逐步建構以英語爲第二官方語言的機制與條件，以提供國民以英語溝通的環境。這不但對英語教育及學習能產生良性的引導作用，對於提昇我國國際化及國際競爭力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發言者：葉淑華教授(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教授)

剛才戴副這邊有提到就是說，中正大學的語言中心在兩千零三年的時候正式成立。那他的位階是高過於院級單位，不隸屬於某一個院的下面，我覺得我對這一個部分我非常的肯定。我覺得那是必要的。我們如何去做一個一貫性的自訂。我覺得這三個部分我們都必須要做一個考量，那我也希望這樣的一個中心其實它應該是儘早成立。

我自己是畢業於日本的東京外國語大學，那東京外國語大學他的最主要的功能是，日本的話基本上他是文部科學省， 就是我們教育部，是專門會有一個單位來制定所謂的整個國家的一個外語政策，政策當然是有專家的一個參與，跨部會專家的一個開會以後，然後去制訂，然後落實。去執行這些政策的就是我的母校，東京外國語大學，那很榮幸的我也有機會剛好跟著這個指導教授，這個指導教授從戰後一直就是當了這個最主要的一個執行的工作。在這邊我看到的就是說，所謂的外語政策他不是只有外語， 本國語其實他會一併考量。另外的話就是說在政策的制定過程之中， 他應該不是只有對內，他也要對外就是說他內外都要兼顧， 然後本國語外國語他都要兼顧。

極力的呼籲就是說其實我們可以成立這樣的一個外語政策的中心。另外的話就是說我剛才有提到他不僅對內、對外，他其實有很多的

一個政策在執行。我覺得其實，不管除了日文以外，我相信其他的語言一定都有他成立的一個必要性，那另外的話所謂的跨層次我是覺得說，不管他是小學或者是中學， 或是高中到大學， 甚至到了所謂公部門的層次，我們如何去做一個一貫性的自訂。

我覺得如果將來有機會國家能成立這樣的一個外語政策中心的時候，它應該是三跨：它應該是跨部會、它應該是跨語言、那它應該是跨層次。那所謂的跨部會當然是部會之間的一些意見的一個融合，我覺得那是必要的。

其實所謂的英文或者是外語， 不管它是哪一種外語，其實不同領域的英文、不同領域的日文、不同領域的東南亞語，或者歐洲語言，它是會不同的，所以我覺得那種所謂跨部會的整合是很重要。

另外跨語言方面，的確，英文很重要，但是你對日本人講英文，他就是聽不懂，雖然縱使他的英文程度也不錯。我覺得其實，不管除了日文以外， 我相信其他的語言一定都有他成立的一個必要性。

另外，我亦建議外語政策之核心價值與政策主張宜依據時代之變遷作適時之修正，惟修正時不宜躁進應逐步修正為宜。外語政策及教育相關中心之成立確實有其必要性，以統籌規劃外語之政策擬定、執行、外語人才的培育、外語研究與發展等。

外語政策中心的成立必須符合三跨:跨部會、跨語言、跨層次。跨部會：彙整各部會之語言需求內涵；跨語言：應顧及各種不同語系；跨層次：小學至大學乃至各部會各職場；語言政策宜兼具上述內涵，且具一貫性及系統性。外語政策的擬定必須同時注重對內與對外、本國語與外國語之平衡。

宜於外語政策中心平台內建置外語數位教材，或於公視播放各種外語課程，以 OCW(開放課程) 模式免費提供全民學習外語平台，全方位提升全民外語之能力。

發言者：蔡素娟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院長)

我個人也先覺得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地方可能我們需要釐清的，個就是說政策跟執行之間的關係。因爲有的政策其實是可以訂的很大方向，那有的時候是執行面沒做好。那接下來就是講到就是說所有事情他都會有一個動機跟目的，那我們要訂這個政策的時候其實至少有兩個層次，就是說在國家級的那個動機跟目的是什麼。今天如果我們要談的是國家的政策，他是要培育外交人才嗎？還是說剛剛有提到的什麼國民的素養等等之類的，那先釐清楚之後做法會很不一樣，但是我覺得很多問題出在於我們常常就忽略掉了個人的動機跟目的，如果個人的動機跟目的也釐清楚了，有很多事情的做法會不一樣。第二個，有很多事情根本不需要做。所以我是覺得說個人，很多時候，個人的 Motivation，我覺得剛剛也有幾位提到說那學生他爲什麼學某一個語言學的很好，他可能有個人的那個因素在裡面，不見得是你需要國家政策下去的。那現在這種情形的話只要他有動機，任何機會，他自己會去找機會，就不會產生鄉土語言那個問題。

鄉土語言這個也是一個相關的，事實上，母語 by definition 是媽媽的語言，爲什麼不是媽媽教，要到學校去教？因爲我個人是做兒童語言習得的，所以我覺得就這一點來講， 當然這些我們將來要釐清，就這個來講國家不需要去訂一個政策說我要你來學你媽媽的語言。你媽媽的語言在家裡學，包括外配的語言，我一直在推這個，外配的媽媽你教就他自己的母語。因爲你知道從小學母語是 effortless，爲什麼不要自己在家裡學媽媽的語言？絕對有學理證據去支持說，那個是好的，那個是 plus， 小孩子絕對不會 confused，Bilingual 的小孩多的不得了。這個也不要國家的政策來、也不要花國家的錢。你只要提供小學的老師那個概念說學媽媽的母語是很好的，你就多一個資產，你將來就多一個資產，他們就去學，不管他學的是印尼、菲律賓、泰語，哪一種，越南語，這些小孩子將來長大之後呢， 整個社會對外語的需求，很多問題其實就解決了。不需要國家來做，所以我覺的說把一些個人的需求的東西釐清楚之後，有助於我們去

了解說我們到底國家需要什麼樣的政策。

我覺得哪一些是國家需要做、哪一些是國家只要稍微引導一下即可，不需要真正訂政策訂到像你說小一教英文， 然後很多老師其實是不合格的。這個我們要承認真的不合格。但是我一直在想說，我們的小孩子的， 他們的這些所謂的小學的英語是哪些人在教、是教什麼樣子。

我常常就在懷疑說政策做下去，到底實質是什麼樣？我們需要很多這樣子普通的，還是我們讓他有各種不同的類型以及各種不同的層次，還有各種不同的 functions 等等之類的。所以這些是我自己想到比較一些觀念性的。因爲我覺得我們真的需要一個國家語言的這個研究學院或研究院，像教育研究院這樣的機構來幫我們，所以很多時候也許國家真的需要去做的是不是真的那麼多，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錢，那我覺得很多的細節要由那個專責單位來長期去推動。

有些事情是政府去做，有些事情政府根本不需要做，政府在推動外語政策時，需要先釐清哪些它需要管的，那些它不要管。若需要的是外交的人才，不需要動用太多的資源，也不需要動到整個教育體制，他也有不一樣的培育方式，因爲有特定的目的。而多數時候，學英語都可以有 specific purposes English training。但如果外語能力是國民的素養，它還有很多的層次，如果是希望它在一般國民的知識上開很多窗，reading 自然是比較重要的。而這個層次上，究竟有多少人需要的英文漂亮到什麼程度，需要到外交工作或經濟談判的的高階菁英讀程度的英語能力？其次如果是講到這個 promote 鄉土語言教學，只要 make point 就足夠了，在歷史某一階段或社會層次，只是用來平衡過去 Mandarin only 的 bias，而這個問題目前已經不太存在。政府需要做的只是去宣導，小孩子會語言愈多愈好，多學母語可以不費吹灰之力，這個觀點學語言認知的專家學者都同意。至於新住民母語所帶進來的母語真的需要大力宣導，讓小學老師、教育者、還有家長知道說這個對小孩是 plus，使增加的資產。這個就是爲什麼我提到說先釐清動機很重要，如果政府釐清了之後，就會知道說什麼事情要做，什麼

事情不要做。而且不要用力做的事情是怎什麼處理。

發言者：于乃明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政治大學，這六、七年下來，我們已經發展開設了二十五種外語，這要感謝國家的一些政策，在七年前教育部給了一筆計畫預算，叫做北區外文教學中心，

北區大學外文中心設在政治大學，當時破天荒的給了人員的編制，有十四個人的編制，其中有九個人我們就放在德、法、西，成立了一個德法西的歐語學程，另外五個人力就放在少數語言，正因爲這樣，甚至連大家想都不會想到的語言我們都開了課程，連非洲語言中的史瓦希利語，我們這邊都開了，居然有人願意修這麼稀有的語文， 所以我覺得很多情況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前天才跟我們校長從土耳其回來，去年我很意外的接任土耳其語言學系的系主任，當然都有歷史的因素在內，我們校長說他出訪這麼多的國家，從來不知道土耳其會是這樣一個有發展潛力的國家，他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橫跨歐亞兩洲的國家，他的文化、人種、宗教、飲食，都是非常非常多元的，而且人們充滿了活力，而且他經濟成長率今年是百分之十三，這個市場非常大，我們碰到在那邊的台商，台商認爲土耳其將來具有非常非常大的潛力、值得推廣雙邊商務。

另外想提一下東南亞，我一直認爲，我國多語言社會的關係，除了剛才大家講的台語、國語、客家語、山地語之外，我們不能否認越南文跟泰文在台灣的需要，而且台灣新的一代，也就是台灣新生之子，有很多是跟越南人生出來的，或者跟泰國、中國大陸，這些孩子都已經進入高中，他們不該忘掉他們母親的語言。

大概在三年前我到越南跟泰國去訪問，結果越南、泰國台商願意捐錢給政大做爲獎學金，我們先用來聘老師，越南商會希望在台灣能有大學成立東南亞語文系，他說在越南、泰國做生意很有機會，可是我們官方派出去的人，往往不會當地語言，而中國台商希望我們

能在政大成立東南亞語文系。因爲目前教育部給的北區外文中心的經費只夠開第一年的課程，我們用台商給我們的獎學金，用來開第二年、第三年的越南文和泰文，現在第一年有許多同學學越語、泰文，第二年人比較少，現在我們也看出成效了，因爲有碩士生會用越南文，到越南去發表論文，教越文的老師說學一年或一年半就可以說越南文了，會至少念稿子，去發表論文，我個人認爲東南亞國協未來的發展值得關切，我們不該忽略東南亞的語文和市場發展，政大外文中心除了越南文、泰文外，我們也曾經開過印尼文，但是老師回國就停了，但是這塊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以台灣的地理位置來說，日文很重要，日本確實是很例外的一個國家，雖然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世界上很重要的經濟體，可是在日本會講英文的人真的非常少，你如果用英文去跟他們溝通，效果差很多，所以必須會日文。以日本以地理位置還有歷史來講，學習的人當然是非常多的，政大學日文的學生，每一年申請要當作輔系的都超過四、五百人，本來所謂的輔系我們只能收十幾、二十個學生，但我們採取收費制度的擴大輔系，現在最多可收到三百人，但我們還是不能滿足另外兩百個學生的需求。

我覺得多語言的環境或是國際關係非常重要，尤其我們是個島國，一定要對外發展，不管是經貿或者是旅遊觀光， 或者現在非常重視的文創，東南亞這塊不容忽視。當然今天已是全球化的時代，你出國不會講英文就是不行，這是很基本的問題。我們也必須承認這個事實。

此外，我們歐語學程的學生到目前實驗也算是很成功的，經營了這麼多年，到現在來講慢慢變成德文的同學可能會修法文，法文的同學可能修西班牙文，同時還修英文，所以他們的學生出來非常好用，今年已有第二屆畢業生，現在看來這個模式好像還不錯，今年校方同意把歐文學程更名成歐文學系。外語學院這三年的數據顯示，大概有四成的同學都修了雙外語，我們外語學院標榜的是雙外語雙專

長，我們跟商學院有合作，我們跟傳播學院也有合作關係。

有些企業家也希望我們不只訓練外語，過去日本三井商社老闆來訪問的時候我曾問他，你們企業到底希望我們幫你們培養甚麼樣的外語人才？他講的答案我是非常失望的，但那卻符合市場的需求，第一個他說要有專業知識，第二個英文要非常好，因爲商場要到全世界行銷，第三個電腦當然要非常強，第四個才是日文，對日文系的學生他們要求的日文已是第四個條件，可是我覺得商場的敏銳度非常強，他們講的是實情。

最近新加坡也透過教育部，然後教育部交由政大來承辦一個英語的師資訓練課程，就是給每一個有開授英語專業課程的學校一個名額的老師可以到新加坡去培訓英文，但是對象必須是非英語系的老師，比如說教政治學的，用英文來教授，教經濟學的，用英文來教授，經費由教育部支付。

有很多公司老闆希望我們在校生除了去念專業的課程外，也希望有一些實務上的要求，我們校長一直問我說，你站在外語學院院長的立場，你覺得學生出來應該具備怎樣的能力，我說我希望各種語種畢業的學生都能看得懂當地的報紙，也就是我希望同學看得懂報紙，因爲學了外語很多同學真的還是看不懂報紙，也有很多老闆跟我抱怨，日文系學生不能用，我說爲什麼不能用，他說我給他一份資料，叫他幫我在兩、三個小時內做出摘要，但是做不出來，因爲沒有概念，最近日文系也有電腦公司來跟我們產學合作，老板說因爲去培訓資科系的學生不如來培訓日文系的比較快，因爲語文養成比較難，所以我覺得台灣既然是一個島國，是一個必須要靠外貿的、靠旅遊的國家，所以也必須要注意一些現實的層面，當然不能全部變成應用英文或者應用日語系，但是有一部分必須是這樣，考慮學生的出路面對現實的環境。

事實上政大已經開放給全國大專院校，而至今已有一百一十所大學申請我們線上自我學習平台，中央大學是有使用的，使用率達八百

四十一次，使用率最高的是台灣大學和政大的公企中心，其次是政大、交通大學和輔仁大學，但是一百一十所學校都已申請，我們是開放的，每一個學校都有一個 password，這樣該校學生就可以自由上網了，北區大學外文中心是開放給全國大專院校使用的，除了這個之外我們最近投入三年很重要的一個項目是數位教材開發，現在有日文、韓文、越南文、俄文跟土耳其文，今年暑假又增加西班牙文跟阿拉伯文及英文。現在已經開發了十八個單元，預定未來三年要繼續完成五十四個單元，也就是兩年的外語課程，目的是希望讓沒有環境學習外語的人，也可以利用這個平台學習，我們覺得這個部分是很值得繼續做下去的。尤其對後段班的學生自學非常有幫助，將來貧富城鄉差距加大，可以靠著這個自學平台，我們希望可以對社會有所回饋。

發言者：李文瑞教授(前文藻外語學院校長，現任文藻外語學院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教授)

談到國際語言的學習，事實上文藻因爲從四十幾年前成立的時候，就設有幾個主要的外語，英、法、德、西、日，當然這幾個系不是同時一起成立有先後的順序，文藻還是專科的時代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政策，就是每一個學生一定要學兩個外語，如果他是 English major，他一定要在法、德、西、日中要選一個 minor，但你如果是法、德、西、日語系的 major，英語一定是 minor，所以文藻早期畢業的學生在語言能力上面，因爲有兩種外語互相配合的基礎，讓他們不論是後來在升學或就業都佔了很大的便宜，像法、德、西這幾個系 major 的畢業生，在台灣，以目前的狀況來說，很不容易找到工作，但因爲他們的英語都有很好的基礎和能力，因此也讓他們很容易就能就業。

大學畢業或是技職體系校院的畢業生，他們的就業狀況到底怎麼樣？因爲如果一種外語在台灣完全沒有就業市場的話，事實上是不太容易推廣這種外語的。後來文藻跟很多其他的學校一樣，我們要

從專科改成學院，也希望能變成大學，我們不得不把過去專科雙外語的政策做相當的調整。我相信很多人一聽到文藻，想到的就是學生外語的基礎很好，爲了要保持我們過去的這個傳統與特色，我們訂了一個全台灣沒有任何另一所大學所做的，就是我們每個大學部的學生，因爲他們已經沒有雙外語的要求，因此規定每個學生都要有三十六個學分的英語必修課，這是個不得已的作法，也是很難維持的。爲配合這個做法，我們另外訂的是英語和各種外語的畢業門檻，爲了就是希望維持一個外語爲主學校的傳統和特色，不要因爲我們改制或教育部齊頭式的評鑑標準與規定，影響了學校的發展專業和特色。事實上後來教育部訂的許多標準與政策讓我們根本無法只是強調外語的教學和要求的。

但是幸運的，到今天我們雖然有十多個系、很多的外語學系或專業學系給校方很多的挑戰，比如說日語系的就強烈的反對我們有三十六個學分的英文課，資訊傳播學系也認爲爲什麼需要學那麼多的英語，因爲他們的專業科目學分都不夠。可是至少在我任校長的時候是非常堅持這個 policy 的，到現在爲止，大概這個觀念在學校裡是慢慢地建立起來了。所以我強調三十六個學分的必要性，這不是說在大學的學生一定要那麼多學分才能讓他的英語學好，而是我們在彌補他們在過去很多中學、高職的時代，他們英語背景的不足。爲了要能夠推行這樣的政策，我們是不可能聘請那麼多英語老師的。所以文藻在我擔任校長時就率先開始聘請(至少是在八、九年前)英語的專案教師(special contract teachers)到現在類似的做法在很多學校都有了，但是文藻是第一所學校這麼做的。我們不把他們放在正式的教師名額中，我們請專案教師負責 acquisition courses，基礎的英語課程，這些人要有 linguistic 的 background，至少他是有 teaching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的背景，亦具有碩士學位。我們對於這些老師的甄選非常嚴格，由英語系的老師來負責。當然到今天爲止，仍有些可再研究改善的部份但爲了讓外語在文藻維持這個重要的傳統，而且還是我們的特色，我們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與努力。另外

一個就是對外語畢業門檻的要求，我相信今天在許多的大學都有英語畢業門檻的要求，文藻為了對畢業門檻的堅持，其實學校也發生過很多討論跟家長之間的矛盾，而學校的堅持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點意見願在此慎重提出：有一次文藻的外籍老師問我，你們的有線電視台那麼多，但是我為什麼找不到一個你們自己國家經營的全英語或是全外語的電視台？今天在這裡希望能特別表達這個意見。是希望在我們的小組將來的建議事項裡有這樣的一項，就是我們應該有一個由公共電視系統或由教育部主導的全外語電視台，當然在我們無法兼顧到多種外語，但至少有一個全英語的電視台，有電視台就一定可以有全英語廣播電台，透過電視與廣播讓那些沒有辦法上補習班、讓那些有意自修，願意在適應外語的學習環境時，那至少有一個地方是可以來自修的，這一點我在這裡特別慎重提出的呼籲，在國內有這樣的一個外語電視台，希望是一個完全中立以教育為目的的電台，也不只是播放外國的影片、外國的新聞而已，而是一個要為我們的國民提升外語能力，宣導各種不同民俗文化的內容等教育性功能的電視台，這樣才能幫助我們的國民，提升英語方面的能力。

文藻在幾年前，就是當政大前外語學院陳院長提出來，希望全國在北、中、南各有一個外語中心的時候，其實當時教育部也很願意讓文藻成為一個南部的外語教育中心，但是到後來實際在執行的時候，就大大的縮水了，文藻得到的經費，從原來想像的好幾千萬變成只有三、五百萬，變成是我們只能夠請四、五個不同 minor language 的臨時講師到學校來，所以對文藻來說的確是非常困難的環境，我只是願意在這裡呼籲一下，將來對於這些國家的外語教育資源，因為語言的投資應是長期的，而且國家一定不要把他分成私立學校或是公立學校。

發言者：李振清教授(前國際文教處處長，現任世新大學教授)

我覺得這個問題我們都很重視，可是政府在執行的時候為什麼老是執行不彰？值得研究與深入探討。最近的美僑商會在最新的白皮書講得很清楚，台灣什麼都好，就是英文程度不好，缺乏國際競爭力。

有關師資培育與英語文能力提升的問題，我們這裡提到師資培育，我覺得這幾年剛好教育部很多問題的發生，與此有關。大概在二十年前，師範教育法就把師範體系完全廢除了，所以台灣本來一些很好的英語師資培育的功能，原有的英語師資培育體制被毀了；代之而起的是「師培 26 學分班」。也就是說，要當老師，只要 26 個學分班加進來，外加實習(practicum)，就可以當老師。二十年之後我們發現，我們完全都是犯了嚴重的錯誤。美國早期就提醒，這是很嚴重的師資培育政策之錯誤。美國前教育部部長 Richard W. Riley 曾提醒我們的教育部，「你們有很好的師培體系，為什麼要把它破壞掉？」果然，最近我們又開始要縮小 26 學分班，設法部分回歸當年的師培策略，可是沒辦法再恢復。現在再重新培養好的師資、培養優秀的英文老師，最主要在於英文老師,要怎麼樣培養、政策如何配合。師資培育，我覺得應該把單獨師資培育制度重新建立制度，培養高中、國中，尤其是小學的英文老師。我想這應該是個重點，因為我們現在不可避免的城鄉差距這麼大，政府應該怎麼樣幫助那些偏遠地區，進行專業英語老師的培養，否則將來可能因為英文師資不好，那這個英語能力的提升政策將很難執行，而且會造成一個常常提到的問題:「越早教英語，越早讓學生體會到感受英文的恐懼(discourage them from learning English)。

因為老師發音不好，也不能說、寫英文，如何培養還子的英文能力？我們現在講不管在國中、高中、學測、指考等，都要考作文、造句、翻譯，那高中你要到偏遠地區，你要教人家寫作、英文翻譯，老師本身不會說英文，也不會寫英文，這樣還要考聽力測驗，老師根本聽不懂，這個老師培養出來的學生，等於提早讓學生放棄英文。

剛好上上禮拜在新加坡參加一項國際會議。新加坡比我們更保守、但更 powerful，他們有一個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是屬於南洋理工大學底下的一個獨立的，而且國家級的單位，國家級的單位叫 NIE，NIE 負責整個國家教育政策、英語教育政策的執行，而且他們是跟早期我們的 RELC，Regional Language Center，結合在一起。大家都知道 ProfessorJack Richards 在那裡，他現在也參與 Cambridge 跟 Oxford press 的英語師資培訓，及教材編撰等工作，並利用 NIE 做 base。新加坡現在的英語能力提升不遺餘力，就是這個地方在執行。他們除了提升全新加坡人們的英語能力外，他們現在有一個重點工作，是國家重點，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我這次參加的會議廣邀全亞太地區的，就是講到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目前要提升英語能力，我們必須同時重視中文才對，一定要把中文同時加入，將兩者結合在一起，那尤其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觀念，政府當局宜加重視。我想在座的中央大學衛友賢院長一定有同感。因爲我們在好幾次開會，他一直強調，顧及提升英語能力之外，還要鼓勵更多國人到台灣學華語，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對提升英語力與國際化，會更有幫助。

所以我想新加坡的模式我大概很建議政府，假如可能的話，應該有編列特別的預算，觀摩新加坡提升英語能力的策略。新加坡跟香港在努力的重點工作是老師的培訓。這次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 他們新加坡更積極努力，從小學，從 International school，因爲他們有很多 demonstration，甚至在新加坡的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School 整個全部帶來這邊做示範教學。

外語政策，假如要成立一個相關的學院或中心，我想將來政府的預算一定不可能支應，所以我很建議，國家教育研究院應該發揮功能，扮演一個很重要的師資培育與在職訓練的角色。

英語成爲官方國際語言，我想這個提出來，將來一定爭議性很多，因爲台灣跟香港跟新加坡的社會情況不一樣。我想這不宜隨便提議

討論。

外語在我國，剛剛主席講得很好，英語當然是最主要的 primary foreign language。台灣的社會情況很特殊，台灣人應該好好把握這個特殊的歷史與社會機會機緣，學習日文，並將之列爲第二外國語。因爲台灣很多前輩像我的父母親兄長，他們都懂日文的，有這樣的社會關係，我覺得應該加強日語的學習跟教學。除此而外，不曉得幾位院長在這裡有沒有發現，台灣各大學的西班牙語(Spanish)現在越來越普及。剛好在今年年初，有一個紐約時報的著名記者，Nicholas Kristof，中文叫「紀思道」。他在紐約時報寫一篇很很重要的長主要強調”Spanish first, and then Chinese.” (先學西班牙文，接著學中文。)各大學都宜把將之列爲參考資料。所以我們提倡中文的功能在這裡，英文好、中文好，在其他語言我覺得就是日文跟西班牙文。

其他東南亞的外語學習，也應列爲台灣各大學的選項。我覺得台灣現在發展很特別，台灣現在外勞那麼多，而且東南亞很多，事實上他們很多背景都不錯，是有大學畢業的，是高中畢業程度不錯的。他們會講越南語、馬來語、印尼語，我們台灣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而且未來不可能沒有外勞，爲什麼不好好利用這些人的外語背景，然後開始在大學開一些越南語等。那這一點我想在大學評鑑和國際訪視的時候，發現南部和外勞較多的一些地區，或科技大學他們爲了產學合作，就請一些越南的泰國的開在職進修班，專門教越南語跟泰語，所以我想這一點是可以列爲考慮的方案。

發言者：黃孟蘭教授(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首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關我國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我個人認爲我們應該要培養具跨語言、跨文化認知以及國際公民素養的國際化人才，就跨語言方面來說，我以歐盟爲例，大家都知道，以前到法國，英語是行不通的，但現在法國已經意識到英語還是國際最重要的語言，所以現在國家很重視英語的學習。在歐盟國家的中學裡，可以學習到的語言就多達三十二種了，不過所有的官方文件都用英

文來呈現，我們都知道歐盟有二十七個會員國，他的三個最主要的語言是英、德、法，但英語還是最重要的語言，雖然我教授第二外語，在輔仁外語學院，我們非常看重學生的英語能力。

關於英語能力的整個培育，我個人認爲在中學要下向紮根，從小學到中學，我們可以加強英語的培育。因爲我們太重視學生的文法是否正確，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學生不敢開口，就像我學生學外語還是一樣，不知道自己講的語言是否正確，覺得文法可能不對，所以在溝通的時候就有太多的猶豫，我覺得這是跟我們傳統的教學法有關，我們可能要改變這樣的學習習慣，老師是不是能夠有一些創新教學法的老師？我們應該朝著溝通式教學法來帶領我們學生，台灣是一個孤島，我們要走出去，我們要跟別人溝通，我覺得在溝通當中，要讓我們學生知道，不管語法講的正不正確，我就是要開口，我想這是現在在中小學的英語教育上，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

至於第二外語，我很高興的看到我們教育部的中教司，這兩年來鼓勵外語特色高中的成立，特別是大園國際高中，因爲地緣的關係，在桃園國際機場的附近，這所高中跟輔仁大學有很密切的合作，他現在有德語、法語兩個外語，包括數學、音樂、體育，都要用這兩個外語來修課，可見師資是很難培育的。因著我們在第二外語教學上的努力，希望教育部能夠在師資的培育上多一些協助，我想，學生越早學第二外語越好，外語特色高中畢業的學生，將來進入大學，不一定要來外語學院就讀，可以學法律、學管理。

外語只是一個技能，進來大學四年，有個外語，再學一個專業，我們要越早培育這樣的人才。英語跟第二外語的人才的培育是要向下紮根的，我覺得需要鼓勵那些已經做得好的學校，讓他們好好地發揮，等他們建立好一個模式，我們就可以推展到其他的學校，這是就跨語言方面的學習。

另外一點是有關東南亞語的教學，因爲我們現在有很多外勞，很多新住民，希望大學能夠開設越南語，我們輔仁大學除了歐語，英、

法、德、日、西、義大利文以外，在今年八月以後，我們要開設越南語課程，我們的目標是要成立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分學程，因爲學位學程困難度高，除了讓我們學生多學習東南亞語言以外，我覺得文化更爲重要，我自己認爲在外語的學習當中，文化和語言思維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也會在這方面多所著墨，除了歐語和英語之外，我覺得爲了因應台灣現在的整個大環境的變遷、東南亞語的課程可以慢慢的推廣。

至於在跨文化認知方面，我也很認同要重視母文化，我自己現在在我們外語學院，我們很重視的是外語教學和跨文化能力的結合，我們開了「中華文化多語談」院選修課，就是用我們的六種外語來介紹自己的中華文化，爲什麼要開設這樣的課程？我們的交換生從國外回來，我們都有辦一個經驗分享座談會，他們就提到文化震撼，因爲學了三年的語言到了法國、德國以後，跟外國人溝通幾分鐘之後，就不知要講什麼，外國人感興趣的是我們中華文化，但學生的專業詞彙不夠，對自己的母語文化了解的也不夠，所以在溝通時就遇到蠻大的挫折，因此透過這個課程，我們要提升學生的跨文化敏感度，在全球化背景下，我覺得跨文化溝通能力，不管是外交、經貿，任何一個場合他都是可以讓你獲勝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在異我文化差異比較方面，我們外語學院，現在在做一個教材，六種語言跟自己母語文化差異的教材，完成之後，我們會上網，那是今年我利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在院裡進行的一項工作，我們希望以後能夠跟大家分享，另外，我覺得人文素養的培育也很重要，我當系主任的時候，我帶我的學生到交換學校去，我發現在跟法國人溝通的時候，學生基本的禮儀不夠，法國人就因此有點不理人，但我覺得我們學生沒有意識到這方面，我們外語學院現在很重視學生的品德教育，因爲它是提升職場競爭力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外語好、有專業，但人文素養不夠，就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另外一個就是在外語專業人才的培育方面，我個人覺得。除了外語，我想大家都認同，外語只是個溝通的工具，我覺得應該還要加一個跨領域的學習。

對於跨領域的學習，我想教育部可以鼓勵各個學校辦理跨領域學程，每年教育部都有給一些跨領域的學分學程的經費申請，但是不容易，我們每年都會提出跨領域的學分學程申請，但是全輔仁能通過補助的大概一個或兩個，我想這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資源不足的地方，我們要發展，是需要有教育部的一些鼓勵。另外一點，就是關於交換生的補助，現在出國的人數逐年遞減，因爲學生要繳輔仁全部的學費，還要繳當地學校的學費，學生希望學校能夠給他們一些補助，但是學校拿到教育部的補助款逐年減少，在這方面，如果教育部能鼓勵我們學生去國外念書，給予多一點補助的話，我想對我們學生來說，可以開拓他們的國際視野、增加他們的多元文化觀，我看到我們學生交換一年回來確實不一樣了，即使只是一年而已，但是我想這方面是教育部可以鼓勵的地方。

發言者：陳國榮教授(國立中正大學外文系主任)

外文系的老師或學生，通常在碰觸到語言的時候，都會有一個很大的疑問，我們學習語言的目的是什麼？到底只是聽說讀寫，就是一般溝通就好呢？還是像剛剛戴教授所提到的，在制定語言政策的時候，是不是要加入一些文化跟文學的深度？因此，如果在制定語言政策的時候，內容該是什麼？只是聽說讀寫，還是要加入一些實質的內容？比如一些西方文化內容，甚或一些文學的作品？若制定外語政策的時候，只是提到說我們是要訓練學生聽說讀寫，沒有內涵的時候那到底我們這個政策會是什麼？

我們似乎都以英語爲主，對過去這麼多年來，全民瘋英語或全民瘋英檢，我自己實在也不太贊同，充滿矛盾的情緒。雖然強力的推展英語，有些好處，可是英語畢竟跟中文母語是不一樣的，因爲它的語言系統、語法結構都不一樣。如果我們在談語言政策，到底是要獨尊英語，還是要所有的語言都能夠納入，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考量。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最近我看了幾次 Euro vision 的歐洲歌唱大賽，到

了決賽時 歐洲四十幾個國家，最後只剩二十五個國家，大部分的歌手都是唱英語歌曲。怎麼烏克蘭，阿爾巴尼亞、土耳其這些不是英語系國家，都是唱英語歌曲？那也就是回到我剛剛原來的問題是不是學英語就夠了？因此，到底我們的外語政策是只要強調一個語言呢？還是要多語？如果是多國語言的外語政策，那爲什麼學生一定要學英語呢？ 爲什麼像大學現在一定要英檢要通過？我喜歡學日語，我就只會日語不就很好？我喜歡德語，我就學德語不就好？爲什麼大家一定要以共通的標準來學某一種特定的語言？

另外一個問題有點牽涉到意識形態，像小學語言政策，因爲我本身，聽懂台語，也會說一些 ，可是小孩不會講，在家都講國語，當他被迫去上某一種所謂的鄉土語言，就好像有些學生，對英語沒有興趣，被迫去學英語的情況一樣。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越早學習這種語言，越多小孩子越早會放棄。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現象。

像我們那個年代可能到國中，國一才開始學 ABC，之後才慢慢學。有些人可能到了高中才放棄，可是現在小孩子很多到了三年級、四年級，已經完全不學英文了，因爲他根本學不來，程度越來越差越多，到了國中的時候，老師也不曉得要怎麼上。所以，整個語言政策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到底我們政策是要只是聽說讀寫還是個深度的語言學習，還是第二官方語言。像其他教授提到香港較爲失敗的例子，或是新加坡可能比較好的例子，可是這些政策是否適合台灣的發展， 雖然我自己本身教英語。我還是有點覺得疑惑而持較保留的態度。

發言者：曾守得教授(前彰師大教務長，現任靜宜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思考外語教學政策及外語政策幾個議題，馬上就想到了學理的根據，如果要設立一個外語政策， 沒有學理根據馬上就會被攻擊，這個學理政策一定要先講到語言的規劃，language planning，那講到 language planning 就一定要講到 language policies，這個 policies 馬上就會牽涉到我們台灣的語言政策，所以我們要談這個外語政策，

沒有談到本國的語言政策， 這是絕對逃避不了的。

外語政策最主要是，制訂外語政策，可能不是英語領域的事情而已，當然更多的外語的人才必須介入，日語的人才進來，還要有歐語的人才進來，因爲這個外語政策， 大概是歐洲語言，大概有德語、法語、西班牙語，這個是最重要的三種語言。亞洲裡面有東亞、有北亞、有東南亞，這些都比較 minor，但是也是一樣，可能我們要討論到這個政策，外語政策也會談到亞洲語言，非洲的語言我們也要討論。

外語政策可以從我們的學理上著手，語言規劃的時候要注意哪些東西？本國語言？外國語言？這個是第一個要考量的，那外國語言是哪一些爲主要語言？ 哪一些是次要語言？ 哪一些是屬於政治外交要用的？ 哪一些是屬於經濟、文化、教育方面要用的？ 哪一些是屬於我們的內政要用的？外語政策一決定馬上就是教育政策，我們的外語教育政策~~是~~怎麼做？

我們外語政策，要快一點完成。我希望三、兩年之內這個決策單位就要出現，這個決策最好跟教育部要保持某一種位階上可能要接近或平行，將來外語教育的中心或是外語教育的什麼委員會如果要成立，也不能差太遠。舉個例子，比如說它放在教育部中教司或是國教司底下，發揮不了作用，幾十年來的政治情況已經告訴我們說，。所以我建議如果要的話它就要高，這個位階一定要高，在行政院底下，不管是 task force committee ，或者是怎麼樣，反正就是需要這麼一個單位來統管外語政策，從學理上來看那個位階要放在哪裡，這個決策單位一定要有一個主要權責單位，不然沒有 policy，也就沒有 policy making 的人， 所以這個 policy maker 是誰？我想我們可能要決定一個主管的單位，不管是什麼樣的名稱， 我想我們需要一個這個東西。

那至於說語言的定位，現在國內諸位都知道我們教育部， 現在九年一貫之後就是外國語言教學，語文領域，分英語主修專長， 然後就

是本國語言及鄉土語言，還有次要的一些語言的掙扎，在的國小已經夠可憐了，一個小孩子同時學三種語言，如果諸位再仔細看一下社會語言學的現狀，在菲律賓、在新加坡、在印度，不管它是什麼樣的 policy， 不管它是怎麼樣的 formula，不管是同時修多少種語言、絕對沒有哪一個語言是非常優先的。在這個情形之下，在每一個國家裡面，他們都有 policies。我想印度我們要看一下， 因爲印度的語言比我們還複雜。新加坡要看一下， 因爲他們的語言政策也做得相當不錯，可以參考一下。

參考完了以後再回來決定我們台灣的英語要放在哪一個地位。因爲現在國語有人在反對、地方語言也有人在反對， 也有人在贊成。如果再加上一個外語，它要一個官方地位。官方地位是很好的。但如果要所有東西都翻成英文，那個殖民國家都沒有辦法達成。現在如果我們台灣要現在把我們的法律全書部要翻成英文，在座我們所有各位畢窮生之力， 我們也沒辦法做到。現在我們一個系裡面開會把會議議程與紀錄都翻成英文，給那些外國老師看。這已經夠悽慘了。何況學校的政策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文書沒有辦法翻成英文。假定說英語要變成官方語言， 這個一定要做的。我們台灣有沒有這個能力做？這個可能要考量的。如果說當第二官方語言或者是第二語言，這個可能要考量到它的全世界的定位。因爲英語的全世界定位，通常，可能我們要稍微參考一下。以香港爲例。看看香港的例子，提升到什麼地步，我們才來做我們的決策，可能會更好一點。

我今年剛好很幸運也做了一個歐盟的整合型的計畫。我們現在正在做一個歐盟語言政策的研究。前一、兩年我們都在做一個先導計畫。對歐洲的語言政策這個案子有一點了解。我想建議一下也要參考一下歐盟的計畫。尤其是英語教學。那他就提到這個問題，就台灣的英語教學的問題。其實我們講了這麼久，一直以爲測驗的分數就等於能力，這個概念是非常危險的，因爲絕對不等，雖然是有關，但是不等。最主要的是我們台灣的英語教學不是 domain-based。每個語言的講話通常都是要有情境的。這個情境我們台灣都把它拿掉

了，所以我們的英語教學就非常的跛腳。我們學生所學的東西很多都不會用。雖然他背了很多單字，但是他都不會用。真正碰到那個 situational context，結果他們會發現語言能力不夠用。所以我們經過檢驗才發覺，我們台灣的教科書真糟糕，真的我們都是採用英、美教材爲主，但是美國人的語言教育，不是 domain-based。如果你注意看，包括我們當初所學的英語 900 句型，也都不是 domain-based。

我們現在正在做一個歐盟語言政策的研究。剛開始。前一、兩年我們都在做一個先導計畫。我們想看一下三個國家，德國、法國、跟西班牙。我們想看一下這三個國家裡面，他們是怎麼教日文的、他們是怎麼教西班牙文的、還有他們是怎麼教英文的。看看他們三個國家裡面的語言政策。一條鞭式政策編出來的教科書、師資的培育，然後進入教室，我們想進入教室實際上去看一下教學，然後再看他們的評量。我們想了解一下到底這些從政策面一直決定到實際上最底層，在教室裡面是怎麼成形的。我們希望這個計畫能夠會有一點貢獻。現在呢我們談到外語政策， 歐洲的這些外語政策歐盟的二十八個國家裡面，大部分的國家都遵守這個共同的架構。所以我們想看一下他們的政策實施成效。

發言者：王儀君教授(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

台灣應先思考幾個前題：台灣立國的經濟產業爲何？未來需要多少科技及經貿人材，多少語言人材？是否將英文能力視爲民眾的一般素養，各級學校學生的基本能力？因爲不同答案會有不同結果。

各國語言政策如下：香港的制度是兩文三語，新加坡則是獨尊英語外，還有其他華語、馬來、坦米爾語等語言，韓國則是韓文爲主，但外語訓練佔韓國家庭平均花費的百分之三十，EU 則是母語加上二外國語。

事實上，目前世界上先進國家都提倡多元，使用單獨一種語言的已相當少。事實上，語言可以推動經貿與政治外交，但台灣實施全英語仍有一段距離。語言和職業需求量有關：除專業訓練，國際事務

相關職業或留學生可以推動語言的活化(換句話說，職業需求量都與華語爲大宗，外語推動就困難(這和我們留學生數字下降的道理是一樣的。台灣提供太多唸研究所的機會，出國學生就少)。

目前台灣的經貿如以華人地區爲主，推動英語和其他外國語會花太多資源，而徒勞無勁。台灣若要推動第二外語學習，可强化國際交流，鼓勵修習第三年，且不會因人數過少停開。

非英語系研究生可享有一般英語課程選修，並讓英語課程多樣化，而非達到中高級程度即免修。如已具備中高級英文能力，可選演講、偵探小說、諾貝爾文學選讀等。目前許多大一時具有中高級程度的學生說，大四時的英文已退步。若英文系所是爲培養語言人材，但目前各校英文系所，根據政策，將第二外國語二年必修改爲一年。目前多種外語課人數少無法開課，且一年語言學習有限，導致浪費。建議應强化外文系第二外語學習課程，非一年即可。大學應建立的語言機制：如何有效培養人材？若以經貿爲前題，應鼓勵第二外國語二年必修，第三年選修。且鼓勵各校開設主題式英文課，供英文佳的各科系所學生選讀，從文學欣賞至商業實務，至科技英文。

同時鼓勵學生參與交換生的計劃，與國際接軌。目前碩博士班過多，學生不願出國情形增加，故應營造氛圍，讓學生採取主動學習的模式。亦可由 Top-Down：鼓勵各校外語系語言能力較優者得選修商學院課程。且仍應設立輔導課程，讓各級學校內落後學生有加速學習語言的管道。使之有高中二年級英文基本語言能力及國際視野，便有機會拓展事業。培養國際觀。

發言者：賴俊雄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

提到整個來講英文政策，老實說就是回歸一個環境，那就是英文使用的環境。因爲語言要被使用，那我就提出一個概念，事實上這個環境是一種屬於 infrastructure 的概念。我們應該面對現實，在過去這十年間，所謂的教育部、經建會、研考會，(還不要說各大學)開的這種所謂英語力，還有英語提升，相關的各種政策，已經多到這種

牛毛的層次了。我們是一個政策的一個建議，那我們首先要有現實感。

事實上我們今天針對這一個計畫提供一些觀點。其實這個英語的政策太錯綜複雜了，複雜到不是我們這幾個人真的能處理的。像我們成大就有母語意識很強的，英語政策的推動就會牽涉到種族的問題。因此要推一個語言政策是很難的，他不僅牽涉到種族問題，還有階級問題、城鄉差距，當然還會牽扯到資源分配如國立大學、私立大學等。由於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太龐大了，甚至還牽扯到政治問題，所以我們無法用語言自身來談自己的政策，因爲他們永遠是跟其他政策連接的。所謂的政策，一方面要具有理想性，二方面又要有現實感，所以政策沒有一個是完美的，他們都是要被罵的。但是被罵的中間你要找出一個 necessary evil，還是要推出一個政策。

我今天就提出兩個觀點，一個是 know why 跟 know how，希望對未來政策制定或許有一些幫助。Know why 的部分就是我們爲何要有外語政策，比如我們國家爲什麼要有外語政策。那第二個 know how 是如何實施這個政策。事實上承辦單位很用心準備的六個主題，正好讓我們今天能有個共識來討論整個外語政策。在這六個主題中，第一個問題「政策應有核心價值」就是 know why 的問題，而其它全部是 know how 的問題。know why 的問題我覺得是現在口頭上大家都喊著二十一世紀英語力等於競爭力的口號。競爭力等於生存力，所以我們要生存力就要學英文。這其中的邏輯一直會把所有的英語政策導向一個技術層面，因而才會造成現在的英語政策的真正問題。

我個人倒是覺得政策的核心價值要建構在「語言回歸到生命」的層次。比如說海德格就有一個概念談到語言作爲一個存有的屋宇 (language is the house of Being)，也就是說語言不僅僅是一個溝通的工具。他是一個存有的屋宇，因爲你是活在語言裡的，所以他是一個生命的價值、一個思維的模式、一個文化的底蘊。所以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我國的這個外語政策應該思考的是我們台灣作爲一個國家，應如何使我們的人民能在二十一世紀的情境下，有自己的生

存的價值。我國應該讓人民如何跟在二十一世紀這個全球化、這麼急速流動的一個文化的產物裡面，建構自己活著的意義是什麼，以及在台灣這個地方你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所以我覺得那個 know why 還是要回歸到一個比較底蘊的東西，而不是談把語言政策當作是一種溝通。我們曾部長曾志朗曾經講過的，語言政策像電腦學習，經常會認爲生存力就三個、應戰力就三個：一個就是英語力、一個是電腦(資訊力)、一個是財務力。可是當你把英文放在跟資訊力在一起的時候，他就會變成這個工具了。我覺得那樣的思維是錯誤的。那個思維、核心價值要回到語言如何建構台灣這國家以及在這個土地上的人民，在二十一世紀有自己的價值，這個價值一定是全球的，而不再是島嶼式的。這整個的思維格局，就是所謂的核心價值。

Know how 部分真的是太龐大，龐大到不是我們能解決的。由於整個台灣要處理的外語政策在語言上面每每都有衝突，因此我覺得這裡的外語政策這個題目訂的非常好。因爲外語政策是中間一個層次，上面有叫做語言政策，即是中華民國的語言政策、中華民國的外語政策，而底下卻有一個中華民國的英語政策。所以我倒是覺得應該要務實。所謂政策必須要有理想性跟務實性，外語政策的確是應該談，他建立在兩者之間，所以我覺得台灣應該真的要有一個自己的外語政策出來。

我自己是學文學的，現在想到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比喻來談：像是台灣這個島，事實上在語言政策上面是雜草，就是說 know why 跟 know what 是很強的。know why 就是全台灣每一個人，賣菜的、還有八點檔的都知道英文學習很重要，但是沒有人有 know why 的問題。爲什麼要學英文，沒有人有這個問題。know what，就變成是各顯神通，就是教育部、或者老師、家長、社會，或者是民間團體，所以那個是一片雜草。可是我們沒有的是那個 know how 的部分，來架構 know why 跟 know what。所以今天的這個會議我覺得非常的非常的重要，若要談，就得邏輯清晰、那個圖像要很清楚。意思也就是說，要如何把台灣這個島的雜草或灌木，去變成是一個：想像一

下成功大學有一個五百萬的大樹，叫做榕樹，我們不缺乏榕樹底下的根，就是 know why，大家都知道學英文很重要，要往上爬，我們也不缺乏那個葉，每個人各自在學英文，我們缺乏的是那個樹幹，那個樹幹是叫外語政策，然後樹幹要分出外語有英語、法語，各種語言，他有枝幹，那枝幹有大、中、小，你還是要區別，因爲每一個都有自己的葉子，那我覺得這個部份是台灣最弱的，就是各搞各的，所以英語政策或外語政策現在就是一個很混亂的狀況。

以台灣的狀況，如果說要大刀闊斧改革，我覺得教育部做不了那個事情，因爲語言真的不是教育的事情，教育是 input，但語言永遠是 output，所以整個環境，也就是那個所謂的 English friendly 的 environment 永遠都是所有語言的先決條件。如果說你沒有環境，只是一味地 input，那只是菁英教育。剛才我們曹老師提到菁英跟普羅大眾教育，像我們現在就用菁英教育的模式在教國小，背單字、背文法，失去了他使用的環境，所以如何借用環境，就要回到剛剛我說的 infrastructure 的問題。但這個真的不是我們今天這個會議能談的，因爲那太龐大了，畢竟，那個 infrastructure 要先有，我比喻的那個樹幹才會出來。問題就在，總要有人來把雜草跟灌木變成樹幹。那牽扯到的問題就是，有沒有這個魄力？

所以國家是不是要有一個，如果說是 know how 這部分，我們中華民國要端出一個外語政策的白皮書，這唯一的建言就是一個白皮書，那白皮書要有一個單位，來整合官方跟民間所有的語言學習的資源跟現況，去了解，然後去整合，再來就是要去了解全世界目前，包含歐盟都有語言政策白皮書，人家都有一加一等於二類似的，或二加一等於一個像是自己母語加上英語再加上第二外語的政策。然而我們台灣沒有。這邊要強調的其實是，我們的政策決定我們是否把能量整合。我對台灣的語言現象還是很樂觀，因爲從八點檔都有在學英文，計程車司機都知道學英文，所以那個關係是有的、能量是有的，問題就在你這個政府要不要做點事情把他能量整合。要達到這個目標，政府一定要先去學習整個國外的外語政策白皮書，去看

人家是怎麼去運作的，因爲他牽扯太複雜，一定種族問題會牽扯進來，階級的問題也會進來。因爲效率跟平等在管理學上是兩端，你要有效率就不可能平等，你要平等就不可能有效率，如何在效率跟平等中找到一個中和點那是一個智慧，是一個行政團隊的智慧。我覺得我們政府可能真的要有一個大的單位，絕對不是教育部這個單位，太小了，因爲牽扯到語言，牽扯到經濟面，牽扯到媒體，事實上是不是有一個全英文的，真的這一定要有一個很大的單位來去推整個國家級的外語政策，然後定位定好，再來去處理。

成大開了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的一個分享會，現在世界已經到第四屆了，上次在香港開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的會議，可見英語作爲一個 international language 的時代已經來了。前陣子我去漢城參加語言測驗的一個會議，大概有一百個人參加，亞洲的測驗，英語測驗的一個會議，然後有德國、俄國、有泰國、有馬來西亞、香港、韓國、日本的與會者，我們都用英文來講話，反而是 native speaker 在角落，他們大概十幾個人，就在角落，然後聽我們用各種腔調的英文在溝通這個英文測驗。所以那樣的一個時代已經來臨了。

那這個時代來臨，教育要怎麼配合？因爲我們還在教那種正統英文，這個教育的政策真的是遠落後於現實，那這個要如何去改善？而且這個新的趨勢不代表它就是沒有危險，這樣的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是有危機的，因爲他會動搖到整個學習的正確性。屬於在 ELF 或者 ELL 這個語言政策能趕快跟教育、跟現實界能去結合，這都是白皮書應該要去做，一個大機關要去做到的。換句話說，要把樹幹做起來；如果樹幹沒起來，我們今天再多的會，這種英語力的會或是英語提升的會都沒有任何意義的，我們都只是來分享一下，所以還是要有一些有魄力的人，在做資源分配的時候，不要只是國立、私立，可能要更大格局來看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管理層次今天要談外語政策就必須要有結構性的思考，因爲 know how 部分太複雜也太多了，那我覺得要談政策一定是政治的問題，政治問題是資源分配的問題，城鄉啦、公私立這些問題；但我

覺得重點是如果你要有一個好的政策你必須要有新的觀點，觀點是這個政策的核心，而不是技術層次的問題，所以有沒有新的觀點才能談新的外語政策。而就 ELL 或跟 ELF 這兩個是不是等同？還是說是很具爭議性的？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跟 as a lingua franca 是兩個概念還是一個概念？

但事實是這個時代已經來臨了，就看第二圈第三圈的人口好了，十三億的人口，事實上就三億七千五百萬是母語，其他都是我們這種第二外語或是 foreign language 的，人口大量而且一直在擴大，所以這個時代已經來了。那這個時代來了有新的觀點，那我倒是覺得如果政策制定，他的技術層面一定要有觀點是新的，而這觀點新的在於應該是說未來的外語政策培養，已經不是語法的正統性或正確性，而是語感，如何從小學，國小教育培養他的語感，不是單字、文法，那個很難，很重要的部分反而是語感，語感來自於語用，所以剛剛才會提到所謂的環境，那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是，語用很務實其實也就有很功利的暗示。

事實上還有一個很核心的東西叫做語情，語言有沒有感情？你跟這個語言有沒有感情？你跟這個語言沒有感情，語用的部分就很侷限，語感就會侷限，然後學的就是技術層次的文法、單字，那一下就忘了，那是背記之學，所以如何培養台灣人民從小或受到各行各業的語情，他跟國際要接軌，跟國際有什麼感情？我跟國際之間沒感情，我幹嘛學那個國際語言、了解他的文化？例如說以色列現在發生什麼干我什麼事？所以說如果你沒有那個國際的那種情感，你事實上不會有國際語言的需求，所以如何讓台灣這個島嶼變成去一個能連接型的，他能跟國際的意識能結合，那具體實踐有很多，比如說科技。或者國小、國中、大學是不是跟別的各世界，不只是英文或英國的，或是歐洲的，甚至亞洲的，是不是可以讓他們可以有國小、國中、大學的交流。就像現在很多歐洲國家都是到別的國家去讀兩年，然後再回來，那你在別的國家讀兩年，你就會培養跟那個國家的文化之間的關係，也就是他們的 way of life，這樣一來才學

的到那個語言底層的 way of life。當有情感以後，你就會自然而然學那個語言。所以語情的營造應該是政策的核心，如何讓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有國際的語情，然後再來談語用，再到語感，這樣才是一個去營造核心的觀念，然後才能談政策。

發言者：劉慶剛教授(國立台北大學語言中心主任)

我覺得在外語政策裡面，核心價值是一個很不容易訂的東西，因爲核心價值本來就不能只從表面化的現象和價值來論定。核心價值還要涵蓋深層的價值層面部分。同時，不管是從縱的角度或從橫的角度來看，核心價值也必須要具備長久性和實質意義，必須能應用到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這樣的價值才能叫核心價值。在此，不論是在外語教學政策，或是在外語政策上面，我們或許可以把核心價值整理成爲幾個「能做」與「不能做」的部分。我先講兩個「能做」的部分。第一、這個價值必須能夠增加一般國民的學習或成長力。誠如剛才陳主任和王院長提到的「提高國民的素質」。核心價值決非表面的加強聽、、讀、寫或只是爲了出國旅遊的淺層目的而已。而是可以透過外語政策能使國民啓動更深一層的多元學習及成長能力。當然，在執行面上，我們得思考用何種方式來讓此政策發揮功效：要用強迫性的方式？用自主性的方式？用鼓勵性的方式？或是用誘導性的方式？重點是：我們在推出這個語言政策的時候，是不是可以提升我們國民的素質還有他的成長力。第二、這個價值必須能增加我們國民的國際觀。增加國際觀是靠透過不同的語言認識不同文化，受到不同文化的薰陶之餘，更進一步的去認識、去關懷國際事務，甚至能主動關懷國際的環境與人民等等。過去大多數人可能是被強迫爲考試而讀這些東西，現在因爲正確的外語政策，人們變成會主動去關懷國際社會。這是我覺得是讓我們改變人民素質之外的另一個層面。從另一角度觀之，以上兩點跟我們的國際競爭力有密切關係。我們常常在談到國家競爭力的時候，大都著重在國家整體的競爭力、即整體與世界各國國生存角力的競爭力。可是我一直覺得國家的競爭力，決不只是國家上層的政治、經濟、教育或外

交的決策即可達成。國際競爭力應該從最底層的個人和地方開始。我覺得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不僅僅止於學習外語是爲取得外語能力證照而已。我希望所有學習外語的人，都能透過外語的學習，順便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靈感(inspirations)，甚至可進一步刺激更多的創造力。 如果全國人民能因此而吸收更多元的知識與應用能力，進而提升國家整體的創造力，這才能真正提升國家的國際競爭力。

打個比方，芬蘭的一個出版「憤怒鳥」的小公司，最近很夯。我就覺得這個具有非常大的國際競爭力的公司，絕不只是靠英文的聽、說、讀、寫的基本能力而已。這些人一定習慣於善用一定程度的外語能力，了解全世界人民的思維(而不只是本土人民的思維)，其產品才會如此受歡迎。所以我認爲外語政策的核心價值，一定不能停在「語言能力的測驗成績」上，而是要顧及全體國民透過外語學習以提升知識吸收、應用能力，多元文化的認知與包容能力，及主動關懷、參與國際社會之各種活動等。國家整體國際競爭力有賴於此。

接下來談兩個「不能做」的部分。第一、外語政策不能影響到本國主要的語言的發展。比如說，我不贊成國小一年級就學英文。Catherine Snow 於 2000 年在台北大學演講時，特別表示一個政府花大把銀子讓國民小學的小朋友提早學習英文是值得深思的。根據她做的研究，小學生提前學習英文，真正進步的只有發音，說起來更像英語母語人士，在閱讀、字彙、寫作上並無顯著進步。他就直接反問我們一個問題：我們值不值得花這麼多成本在「提早學習英文」上面？這當然是一個可以重新再思考的議題。可是現在因爲政策多變，幾乎每個縣市都搶著一年級開始學習英文，幾乎無人關心上述的問題：就是提早學習英文是否會影響本國主要語言的發展。有人可能覺得不會，但依我的觀察，學校只要一年級開始上英文課，家長就讓小朋友在一年級以前開始補習英文。長期以來，不管相關部會如何宣導，只要能力所及，家長絕不會讓小孩輸在起跑點上。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國小英語補習班又開始大發利市，相對的，國語文受到關心的程度，也必然受到影響。另外還有可怕的現象，就是每

各國小都找不到那麼多英文老師去面對新增的英文課。又剛好碰到少子化現象，一般學校的解決辦法是讓對英文有興趣的其他專業老師(如數學老師)去參加所謂的「英語 20 學分班」，上完後開始幫忙教英文課。這實在是教育部「勇敢」之舉。想到我們自己外文系一路讀上來的英文老師，在教英文時還是常常會碰到不是十分有把握的問題，得花相當功夫才能找到解答。讓這些非英語專業而「臨時授命」承接英文課程，實在是對老師、對學生都不利的權宜措施。第二、我覺得政策不能太簡化。我覺得教育部現在的一些語言政策，有些就是過度簡化。大學設定畢業門檻就是過度簡化之例。希望看到每一個技職院校的學生的英文是否每年進步則是另外一例。所謂過度簡化，是指評鑑團隊無法花很多時間確實瞭解學生在就學期間之多元變化，如從不喜歡英文變成喜歡，從怕英文變成不怕英文，從不主動碰英文變成主動學英文，從不讀英文資料變成願意從英文文件中直接搜尋資料等。這些都是外語教育最根本的價值，但是因爲上述之項目難以用客觀的量化方式呈現，自然難以喚起大家的注意。相反的，「英語能力檢測」能提供明確而看起來可靠的成績，也較容易受到大加的青睞。結果是，所有的語言教育評鑑都以語言能力測驗成績爲依歸。大家顯然忘了，老師如果無法奠定上述之外語教育根本價值，考試考得再多，也無法增加或證明學生真正的外語能力。我始終相信任何教育都無法簡化，教育就是要承受麻煩的，而不是閃避麻煩的。今天閃避的麻煩一定會在明天製造更多的麻煩。Education is taking the trouble, not saving the trouble. If we save the trouble today, we will produce more trouble tomorrow.外語政策亦然。如果未來的外語政策只停留在「外語能力檢測」上，那就是過度簡化，不但是對所有英語教學團隊的不相信，同時也讓英語學習者付出更多的社會成本，讓國內、外之英語測驗公司大發其財。最令人難過的是，大家都去考英檢，可是英文好的永遠是那些懂得主動學英文的一群人。總之，我們的外語政策絕對不能走這條過度簡化之路：爲了執行方便，就一切從簡。我覺得任何一項外語政策，

都應該要廣泛、積極地密集討論各層面的問題，等找到一個最好的方法後，先試行一段期間，再研究其立法之必要性與可行性。千萬不要在像以前凡事貿然立法，立了法以後就似乎再也不能改了。

第三、不能把英文能力或外語能力與國家競爭力視爲同一件事。因爲外語能力不一定等於國家競爭力。我看過廖咸浩教授曾經寫過菲律賓跟日本的例子，大家都很清楚這個例子是什麼意思。英文在菲律賓幾乎是全國全面化，甚至已經到了自己本土的文化都可能因此而消失的地步。而日本呢，基本上日本人還是非常的堅持他們某些傳統。不少日本人說英文帶有日本口音並不會覺得不妥，他們認爲只要英文能溝通，不一定要講的跟美國人一樣，日本口音讓他覺得可以凸顯他是日本人的身份(identification)。雖然日本經濟這幾年不像過去那麼興旺，但仍然是韓國想打倒的對象，對國際經濟仍有一定的影響力。

外語可能只是國際競爭力其中的一個充分基礎條件而已，真正的必要條件可能在於培養國民的本國基礎語言、認知能力，培養主動學習的態度，實事求是的精神，堅忍不拔的毅力、開闊的心胸與永不褪色的好學、求知的習慣。惟有這些特質，才能把國民對事物的一絲好奇，轉換成影響世人的創造(如蘋果公司的產品)。總之，外語能力等於國際競爭力是不可仰賴的一種迷思，外語政策絕不可以化成如此簡單的公式。

我認爲上述之幾個「能做」與「不能做」的方向先確立之後，再從政策上面尋求可行的方法與途徑。這樣我們的政策才會有明確的目標。過去的一些政策，要不就是目標搖擺不定，要不就是因爲人的改變而產生改變，而甚至讓先前的很多投資付諸東流。若政策一而再，再而三都如此，對全民與國家的傷害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政策理念能否持續推動，由上而下(top-down)的支持與支援力量是絕對不可缺的。

在外語政策裡面，如果先訂定了一個明確的目標之後，希望一位首

長可以一直留在上面推行非常正確的政策，才真是國家之福。萬一不行的話，政策也不能隨便搖擺，修要修正，也要越修越好。任何政策都需要隨著時間跟成果鑑定(當然不只是表面量化的數字)來加以修訂，才能讓好的策略幫助大家達到上述的核心價值。再來就是我覺得我們的外語政策必須與教育機制完全配合。因爲我們現在訂的是政策或策略，真正能協助完成這些策略或政策的單位，可能與該單位的具教育機制的部門相關。而這些具教育機制的部門又可能與教育部有密切關係。這些都必須有極靈活之跨部會溝通能力的人來領軍，才有可能讓辛苦規劃的政策或策略能夠付諸實現。

大家辛苦規劃的政策或策略能夠實現，絕對需要由上而下(top-down)的政策支持與由下而上的執行力量。。現在我們大學裡常碰到的情形是教育部決定的一個議題，用 top-down 的方式傳達下去之後，接下來所有的人力與花費都要各校之校務基金支付。這個就是等於說命令是 top-down，所有的執行則是 bottom-up。這樣的情形，有些小事作來容易，大事則不易完成。國家的外語政策一定不可如此。由上而下(top-down)的支持與由下而上的支援力量是絕對不可缺的。

另外就是到底要不要成立一個中心？我非常同意剛剛所有先進提到的就是最好有一個中心，而且要盡量快，一定要跨部會。這個中心也許是一個臨時性的，就是在非常迫切需要的時機，臨時先用行政院資源，或直接隸屬總統府，所有決策及其推行方案均需跨部會處理，經費亦然。也許經營了一陣子後，會發現該中心其實可以放在行政院的某一部分、或放在研考會、或放在教育部的某個部門。當然這不能去動到該單位原來的內部結構，因爲長期以來大家已經固守本位，所以要增加一個單位、或要某一個單位來增加這項工作，一定會造成很大的衝擊。所以我覺得成立一個中心是重要的，也很急，但一定要很審慎爲之：以漸進方式，先從非常超脫的地位，按實際、客觀的需求漸漸回歸常態的編制。

英語爲官方語言的部分。這是非常困難，無法在短期完成的事。就我自己親身的體驗，我們一直希望新成立的台北大學，一個以首都

爲名的大學，可以建立一個中英雙語「一對一」對照的網頁，讓想到台灣來進修或讀書的人，可以進入英文網頁以後，就可以找到所有中文網頁最新上載的所有資訊。我們都知道，在國外大家知道台北這兩個字的人可能比知道台灣的人更多，很多人都可能先打 Taipei 去 google 他們要的東西。結果十年過了，這個網頁還沒做出來。想想看，我們全國有多少部會、單位，要通通雙語化，需要多少的財力與物力才能完成，更需要加倍的財力與物力才能「維持」已經既有的成果或繼續創新。這樣做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也不是目前我們能力所能及的。至於我們是否要把英語變成官方語言的問題，需要討論的問題也是一樣複雜的。也一樣需要及龐大的財力與物力才能完成，更需要加倍的財力與物力才能維持的政策。

外語教育與我國多語言社會的關係。我個人認爲在外語政策上，對社會層面上的擔憂可能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複雜。我認爲不論外語政策如何推動，我們的學生或民眾都要面對三大語群：國語、母語(鄉土語言)、外語。不過整體上學生似乎都面臨母語、國語、和外國語三個選擇。最後我們可能發現小朋友都在這三個選擇上面看哪一個最挫敗就最不要去選，通常英文可能就是很挫敗的一個。就學生而言，帶來更多社會層面問題的可能是鄉土語言的部分。比如說，某個國小的校長爲了尊重小朋友對母語學習的選擇，就發生過只有一位原住民選某一門課，結果好不容易請了一位老師來，學生又搬走了，因而造成很大的困擾，請來的那位老師不知道怎麼辦。

David Graddol 在 2006 年寫了一本書叫 *English Next*，他預測在 2040 年的時候，將可能會有三十億人口爲 functional users of English。我個人認爲不論我們用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English (EIL) 或是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FL)，我們談的大概是跟這群人有關。而 functional users of English 的出現或形成，似乎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如果未來一定會出現這樣的一群人(約地球總人口的 40%)，我們今天就得先想好應如何去面對這個現實。同樣的，我們在討論最近很流行的專業英語(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 ESP)時，發現在

公司行號對英文的需求，不會像要求我們外文老師那樣，一切用所謂的 native speakers' norm，他們的概念很簡單，你的英文可以足夠幫我公司賺錢，我就覺得你英文是很好的。如果你的英文不夠好，讓公司在 shipping 上面多花了二十萬台幣，我就覺得你英文是不好的。這個時候你的英文是否 functional 就變成非常重要。然而，如何斷定誰的英文具有「功能性」，則不是簡單的事。除了語言之外，還有更多層面需加以考量，如手勢(gesture)的使用、不同行業的不同需求等。除此之外，今天如果從學習或教學的立場來考量，我們到底要如何教我們的小朋友。過去我們都依循母語人士訂定的規則和標準(the native speakers' norm)來教育我們的小孩，卻自然形成這麼大量的 functional users of English。我們是否保持原樣，就能不斷製造出更多的 functional users of English 呢？還是我們得因應 David Graddol 所談到的趨勢，在教學準則和方法上重新調整？如果是，那新的 functional users of English 的準則在哪裡？用這個新的準則教出來的學生，會不會連 functional users of English 的程度都達不到呢？上述這些問題的答案，有待未來大家共同努力去尋找。我覺得這個 EIL/EFL 真的需要有一個蠻大的一個 research team 來共同努力，以尋求對語言政策最有利的解答。

附錄二 審查意見修正對照表

編號	審查意見	回覆修正情況說明
1.	我國面對全球競爭，外語政策實爲國家發展重要關鍵，外語政策涉及產業發展、國家安全、外交及教育等面向，本研究成果聚焦於教育議題，專家座談會與文獻回顧內容皆以教育政策爲核心，較無就其他向探討我國外語政策，建議可再補充教育議題以外之文獻及政策計畫資料，就制度面、國際面及經濟面等議題進行論述，或於研究限制或研究緣起中說明本研究聚焦於教育議題之理由及相關限制。	新增研究限制於 p. III 及 p. 6
2.	國內政策部分，本研究第二章就我國外語教育相關政策沿革與內容進行整理，第三章第一節我國外語政策則僅列出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計畫等內容。惟外語教育政策僅爲整體外語政策之一環，建議應於第三章第一節說明外語政策所涉及的各類政策，此外亦應明確區分理念宣示性之行動綱	鑑於國際教育白皮書或愛台十二項建設，僅於規劃及執行初階，尚未見具體實踐或有成果報告，因此，尚未列入 至於說明外語政策所涉及的各類政策面，亦於研究限制加以說明，建議爲此一研究後能有長期的接續研究更深入論述。

	領與實際執行之政策，並再廣泛蒐集其他相關政策、計畫，如教育部國際教育白皮書及愛台十二項建設(智慧台灣部分)等。	
3.	本研究業蒐集美國、英國、日本及新加坡等多國政策經驗，並對美國外語政策執行單位有詳盡之剖析，足見研究團隊之用心，惟為深化研究參考價值，建議第三章有關英國及新加坡政策經驗的部分，可再羅列其外語政策之實際內容與內涵；另建議本章可增列一小節比較我國與其他國家之施政經驗之差異，或彙整各國經驗中足供我國參考之部分。	參酌辦理 除已於表 3-1 及表 3-3 整理各國推動外語的核心價值及政策主張，亦於第三章第五節新增各國經驗總結
4.	第四章研究結果與分析部分，涵括多名學者專家所提供之豐富建言，為利參考並掌握重點，建議可在各節末以列點或統整的方式，彙整學者專家意見之菁華或比較各專家意見之差異。在本章末建議以小結或條列方式，就文獻整理及專家座談之資訊進行綜整，以具體呈現研究發現。	參酌辦理 已於各節末以列點或統整的方式，彙整學者專家意見之菁華，並在本章末以條列方式綜整專家座談之資訊

5.	研究報告中有關成立跨部會專責單位之相關論述與建議，如係以教育政策爲重點，建議研究團隊應將「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等既有組織架構納入考量。	參酌辦理 已加入建議之組織架構圖示(請參考圖 5-1 與圖 5-2)
6.	英語在我國外語政策之定位爲本研究重要探討議題，惟對「官方語言」、「第二外語」及「國際語言」等相關概念的定義尚不明確，且非英語國家相關經驗資料蒐集探討亦較爲有限，建議可就專家座談會所蒐集資料，並參考其他國家經驗後，對此議題提出較具體之界定與建議。	本研究以外語政策之定位爲主要議題，然對於其他議題因受限於研究期程，尚無深入探討，如專家座談時提出的觀點，建議外語政策應長期規劃，擬定我國的外語白皮書，建議日後研考會將此一重要議題列入相關計畫中後續研究
7.	考量研究建議應係立基於研究發現所歸納之結論，因此第五章重要建議與第六章結論兩章建議互調，結論的部分可摘錄彙整文獻回顧及專家座談資料，並交互比較增加研究論述的連貫性，另結論中提及參考國外經驗之建議可統整至建議專章，俾對研究建議有通盤理解。	參酌研考會往年研究計畫及政策建議書，此一建議部分屬政策性的建議，而非一般論文的結論後之建議，因此，第五章重要建議與第六章結論兩章不互調
8.	本研究業綜合研究發現整	參酌辦理

	理多項建議供參，惟部分立即可行之建議較爲抽象或僅爲理念宣示，應可再具體化或衡酌納入中長期建議中，如第 4 點、第 5 點及第 8 點等建議，可具體說明立即可行之因應措施或改列入中長期建議。有關具體建議事項應列明相應之主、協辦機關，俾相關機關參考引用。	已於第五章依建議具體說明立即可行之因應措施及中長期建議。並列明相應之主、協辦機關
9.	部分引用之數據資料正確性請再確認，如有關 92 年教育部實際引進外籍教師之數量(第 11 頁)。	參酌辦理 經查證教育部引進英語外籍師資政策目標與執行計畫專案報告(92.04.21)，各縣市外籍英語教師核配人數總計確實爲 400 人，因此不另行修正
10.	報告之錯漏字與格式請再通盤檢視確認，如第 13 頁表 2-1 第 3 列日「文」誤植爲「本」字；第 20 頁第 8 行文字格式應修正爲非斜體字；第 27 頁第 22 行「由」誤植爲「有」字；第 61 頁及 63 頁「劉慶剛」應修正爲非粗體字。	參酌辦理報告之錯漏字與格式已通盤檢視確認 • 第 2 頁第 5 列「種政策」，已修正爲「各項政策」 • 第 4 頁第 10 列「文獻分探究及分析」，已修正爲「文獻探究及分析」 • 第 13 頁表 2-1 第 3 列日「本」語文學系經查證確實爲東吳大學系統名稱，非誤植，因此無另行修正 • 第 20 頁第 8 行文字格式已修正

		爲非斜體字；第 27 頁第 22 行「由」誤植爲「有」字，已修正 • 第 61 頁及 63 頁「劉慶剛」已修正爲非粗體字